

百岁黄埔老人

47 记黄埔百岁老兵毛洪群 / 李平华

黄埔人生

49 朱家璧将军与云南省黄埔军校同学会 / 宋生春

51 我所认识的黄埔老人李颉 / 李石

53 赤子情怀

——黄埔抗战老兵江厚昌在抗洪救灾中 / 顾少俊

我的黄埔前辈

56 投笔从戎热血抗战

——忆黄埔抗战老兵我的父亲田申 / 欧阳维

60 水遥山远谩相思

——忆我的爷爷裴鸿汉 / 裴琦

历史

黄埔研究

62 爱国主义千秋永存

——析黄埔教官方镇中编辑的教材《总理遗教》 / 方西峰

65 神秘的“失业”黄埔生军官团 / 杨灵统

黄埔收藏

71 我珍藏的武冈军分校石印教材 / 单补生

77 黄埔军校 15 期 1 总队中鲜为人知的空军同学 / 于岳

黄埔日历

83 1926 年 4 月 14 日, 恽代英到黄埔军校发表题为《革命之障碍》讲演 / 贾晓明

军史撷英

87 震惊世界的莫斯科保卫战 / 王晓平

黄埔连载

90 你不知道的台湾: 两岸应知道的台湾历史故事(五) / 熊子杰



双月刊 单月 1 日出版
2022 年 第 1 期 总第 202 期



2 黄埔精神之当代阐释



47 记黄埔百岁老兵毛洪群



56 投笔从戎热血抗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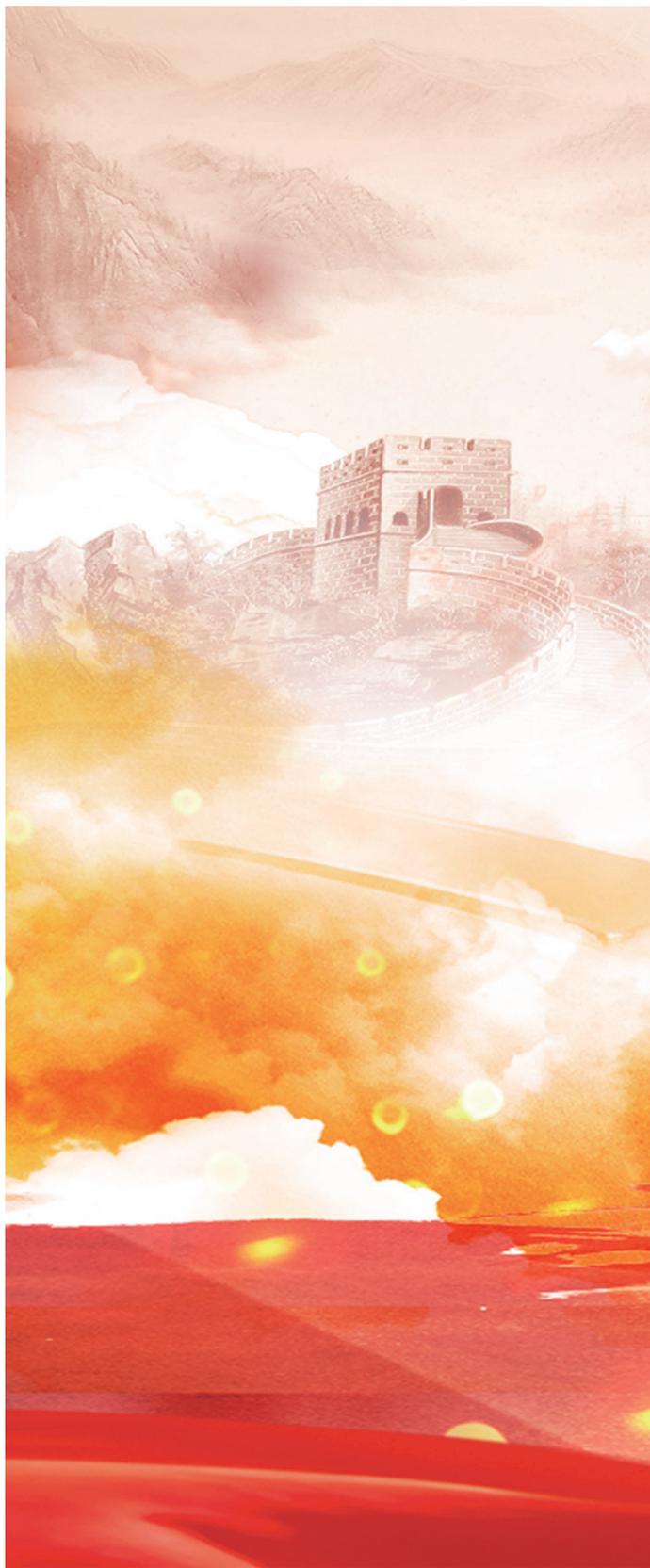
扫码下载
《黄埔》杂志 APP



黄埔精神之 当代阐释

1926年8月19日,黄埔军校第4期学生毕业时,校政治部主任、中国共产党员恽代英在《黄埔日刊》上发表了《本期同学录序》,第一次提出黄埔精神。此后,以爱国革命为核心的黄埔精神,感召激励了一批批、一代代黄埔人舍生取义投入东征北伐,慷慨赴死抵抗日寇入侵,为国家独立、民族解放以及中华民族的统一和复兴而英勇奋斗。

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正处于关键时期。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也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新的形势下,我们应该继续弘扬黄埔精神,使其成为凝聚海内外黄埔人的精神力量,在推动两岸交流合作、推动实现祖国完全统一的进程中,勇担历史使命。■





祖国尚未统一 黄埔人仍需努力

□ 林上元

今年是不平凡的一年，疫情肆虐，国际及两岸政治形势发生很大的变化。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辛亥革命110周年讲话中，深刻总结了辛亥革命以来的历史启示，提出了奋进新征程的大方略，为孙中山先生等革命先驱为振兴中华而矢志不渝的崇高精神以及由他创建的黄埔军校衍生的黄埔精神注入了新的内涵。

回想起上世纪1941年我高中毕业，正值全国抗日战争最激烈最残酷的阶段，满怀为国尽忠为家尽孝的信念，毅然决然报考了黄埔军校。经过严格艰苦的学习训练后，以全校前五名的考核成绩在成都本校毕业。毕业后，我放弃留校任教的机会。时任国民革命军高级将领的父亲林熏南，亲自将我调入其辖制的第七战区主力部队，在华南战场上配合友军有力地粉碎了凶残的日军侵略者南北合流，取我战时陪都重庆的险恶军事图谋。

“国之将亡，家之何存”，这就是我们那一代黄埔军人的家国情怀！

伟大的革命先驱孙中山先生总结了辛亥革命失败的教训，提出建立共和必须要建立属于自己的革命武装力量。在苏俄和共产党的帮助下，黄埔军校由此而诞生，国共两党的军事政治人才从这里一批批走出，在波澜壮阔的革命历程中，为民主革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和建设立下了丰功伟绩。几代黄埔军人用鲜血和生命铸成的黄埔精神历久而弥新。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对黄埔军校及校总理孙中山均予以高度评价。

习近平总书记更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人是孙中山先生革命事业最坚定的支持者，最忠诚的合作



/ 黄埔军校同学会会长林上元。

者，最忠实的继承者。”

中国共产党刚刚走过100年跌宕起伏、艰苦卓绝的历程，领导全中国人民在站起来、富起来直至强起来的伟大民族复兴之路上奋勇前进。

我有幸与黄埔军校同庚，在即将迎来黄埔军校一百周年的光辉时刻，我以当年的黄埔军人及黄埔军校同学会会长的名义，呼吁海内外所有的黄埔同学、后代和亲属：

校总理孙中山的遗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直到今天仍有其现实意义。国内的黄埔老人逐渐远去，传承着黄埔血脉的黄埔后代及亲属要堪当重任。希望你们与两岸的黄埔人一起，和包括海内外所有中华儿女一道，秉承“天下黄埔一家亲”“全球华人一条心”的传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祖国统一尽力，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奋斗终身。相信有了你们的团结奋斗，祖国统一大业必完成！民族复兴之路必实现！黄埔精神永存！

继承黄埔精神,为祖国统一、民族复兴而奋斗

□ 陈知庶

父亲陈赓去世时,我还在上小学,对他早年在黄埔军校的经历知之甚少。在我母亲后来整理父亲的资料和协助撰写他的传记过程中,我才逐步了解到父亲早年在黄埔的一些经历。尤其是我到部队以后,随着对中国革命史的学习,才对父亲在黄埔军校的这段历史有了更为深刻的了解。

当年,父亲是抱着报效国家的目的进入黄埔军校的。1924年,黄埔军校建校时,为培养革命的青年骨干,父亲受中国共产党的委派带领部分进步青年离开广东陆军讲武堂,率先考入黄埔1期。由于父亲曾在湘军服役4年,深感旧式军队的腐败,难有作为,很难担负起振兴国家的重任,而黄埔军校是孙中山先生在中国共产党和苏联帮助下创办的一所新型军校,是大革命背景下培养新型军事人才的摇篮,与父亲那一代革命青年掌握先进的军事知识、更好报效国家的远大志向契合。所以,进入黄埔后,父亲满怀激情刻苦学习,成绩优异,在1期学员中脱颖而出。学习期间,黄埔军校学生几乎是边学习边进行军事斗争。两次东征、北伐以及沙基惨案,作为黄埔骨干的父亲都参与其中,“华阳救蒋”也成了他的传奇经历之一。黄埔军校早期生涯,锻造了父亲他们一代黄埔学生坚毅果敢的品质,使他们后来能够在异常艰难复杂和危险的环境中经受种种考验,成长为优秀的革命者和指挥员。

黄埔军校“亲爱精诚”的校训对父亲和众多黄埔人产生深远的影响。黄埔同学中虽然有党派之分,政治取向各不相同,但并没有影响他们在战场上团结一致共同对敌。东征北伐的骄人成绩,凝聚了所有黄埔师生的奉献和牺牲精神,更是“亲爱



/ 黄埔军校同学会副会长陈知庶。

精诚”校训的最好印证。这种特有的黄埔情谊对父亲的一生影响很大。1997年,我在香港驻军工作期间,见到一些前国民党将领及后代,他们主动向我介绍与我父亲当年的情谊以及对他的怀念,令我十分感动。

父辈的黄埔经历和他们的同学情谊也同样感染着我。离开军队领导岗位后,我有幸加入黄埔军校同学会,与两岸黄埔同学、亲属后代进行联络交往,对自己能够为传承黄埔精神、促进祖国统一做一些有益的事情深感欣慰。

作为黄埔后代,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黄埔军校为何会对一代又一代黄埔人产生如此深远、难以磨灭的影响?归根到底是因为他们的骨子里都融入了黄埔军校赋予的共同精神。简单概括就是爱国革命的崇高精神。

我认为,黄埔军校发展的两个历史阶段对黄埔精神的形成与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第一个历史阶段是黄埔军校创建初期。当时,中国外遭列强割据,内遇军阀混战,国家没有形成真正

的统一。孙中山在中国共产党和苏联帮助下创办军校，就是要培养一支新型的青年骨干军队，并以此为基础，完成统一中国之壮举。黄埔军校成立后，国共两党都为之输送大量优秀人才，以中国共产党党员为骨干的叶挺独立团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们不畏牺牲、英勇作战，所向披靡，立下赫赫战功。黄埔师生边学习边参加作战，建成了一支堪当重任的武装力量，在世界军事史上亦非常罕见。为打倒列强除军阀，实现国家统一，黄埔师生摒弃不同政见，团结一致奋勇战斗，在东征北伐的胜利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辉煌的一页。

第二个历史阶段是抗日战争时期。为维护国家与民族利益，国共两党的黄埔师生不计前嫌，携手抗日。国民党的黄埔师生在正面战场与共产党的黄埔师生在广大敌后战场紧密联合，谱写了一段共同抗日的辉煌历史，留下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

从这两段历史不难看出，黄埔精神的诞生、形成和发展，往往伴随着国家与民族存亡的重大历史抉择。

当前，我们的国家又处于一个新的关键的历史发展时期。面对难得的百年机遇，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海内外和两岸黄埔人更应认清形势，以老一代黄埔先驱为榜样，努力弘扬黄埔精

神，为推动祖国和平统一的进程而不懈努力。

新的形势下，黄埔精神应赋予新的内容。

一是坚决维护国家统一，坚决反对外部干涉势力，与“台独”势力进行更加坚定不移的斗争。

二是继承黄埔爱国革命、亲爱精诚的传统，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通过艰苦细致的工作，不断扩大反“独”促统的统一阵线。以黄埔亲友为骨干，去影响带动周边的人和海内外台港澳亲友，使越来越多的台湾民众增强国家和民族的认同感，共同参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

三是进一步推动和扩大两岸交流，特别是两岸青年一代的交流。青年一代是两岸的未来，要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历史观。通过持续的努力，让台湾的青年逐步了解祖国大陆的发展成就；了解祖国大陆人民希望他们回归祖国大家庭，共享和平发展的红利；不断揭露分裂势力种种险恶用心，不做外部势力干涉和平统一，把台湾推入危险境地的棋子。只有越来越多的台湾人民，尤其是青年一代丢掉不切实际的幻想，真正加入到推动祖国完全统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台湾的前途才有希望。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要依靠所有中国人的共同努力。祖国统一是实现这个目标非常重要的一环。两岸同胞都应继续发扬爱国革命的黄埔精神，我想黄埔先辈这个为之终生奋斗的目标终究会实现。■



中国共产党人与黄埔精神的缔造

□ 陈宇

1924年6月16日，国共合作的黄埔军校在广州正式成立，开辟了中国军事史上的奇迹，一大批有志热血青年汇聚到孙中山先生为首的民主革命大旗下，高呼“打倒列强，除军阀”的口号，为国家统一的历史使命而团结奋斗、牺牲尽责。在孙中山先生“不要钱，不要命，爱国家，爱百姓”的训导下，铸造了“爱国革命、亲爱精诚、团结合作、奋斗牺牲”的黄埔精神。回顾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建立初期风雨如磐的年代，回望黄埔师生激情燃烧的岁月，溯源“黄埔精神”形成的战争实践和概念的提出，都可看到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此有着开创性的重大贡献。



/ 陈宇。

军校初期时的中共党人是黄埔精神的直接缔造者

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在军队中的政治工作，首先从黄埔军校开始，这也是黄埔精神的奠基之魂。众所周知，黄埔军校建校之初的政治工作，均由中共党员和国民党左派分子承担，都以共产党提出的反帝反封建为纲领，而且，基本方针和教育内容大多是由共产党人主持制

定的。

黄埔军校正式成立前夕，中共中央即在1924年5月发布的《农民兵士间的工作问题决议案》中，提出要在军队建立党组织，尤以黄埔军校作为工作重点。经各省党组织选送到黄埔军校的共产党员，约占该校学生总数的10%。黄埔军校引进苏联共产党的先进制度和军事教育，苏联

共产党军队的政治工作制度和精神，还得到苏联在军政专业教育人才以及物资方面的援助。中国共产党人在黄埔军校建立了中共黄埔特别支部，发挥了共产党员的政治核心作用，较快完成了“制度移植下的本土化创新”。军校政治教官、中共党员恽代英、萧楚女、张秋人等编辑了10万余字的《政治问答集》，共分

6篇、228个答案。曾任军校政治部主任、中共党员熊雄主持制定了《政治教育大纲草案》。

通过政治学习，黄埔军校使学生明白了为什么要当兵、为什么要打仗的道理，自觉克服雇佣军队的思想。如1926年《军人周报》第5期发表的《革命军人的精神》一文，就是一个经过政治训练的学生写的。他写道：升官发财不是我们的目的，拿薪饷糊口不是我们当兵的原因。我们做革命军人要有五种精神：一是爱国，二是爱民，三是服从党令，四是为主义而牺牲，五是服从国家命令而不服从私人命令。有了这五种精神，就算是一个合格的革命军人。由这位黄埔同学所说的“五种精神”，可见“黄埔精神”的基本内涵呼之欲出。

1926年8月19日，黄埔军校第4期学生毕业时，校政治部主任、中共党员恽代英在《黄埔日刊》上发表《本期同学录序》，这是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黄埔军校）改组后第1期毕业生之同学录所作的序言。他写道：“切不可有一个人有一个时候，因为私利或义气或其他关系，做了一点玷污革命、玷污黄埔精神的事实。”在此明确提出了“黄埔精神”这个概念。第4期毕业生高声诵读本期《誓词》：“不爱钱，不偷生。统一意志，

亲爱精诚，遵守遗嘱，立定脚跟。为主义而奋斗；为主义而牺牲。继续先烈生命，发扬黄埔精神。以达国民革命之目的；以求世界革命之完成。”

就在这个月，经过东征、北伐等战事和军校生活的积淀、凝练，“黄埔精神”的提法在军校开始流行。军校宣传科长、中共党员安体诚特别撰写了《什么是黄埔精神》一文，这充分说明，“黄埔精神”作为一个名词，此时已经流行于世。安体诚在文中指出：“总结黄埔学校这历史的和客观的特殊性质，我们现在可以说：黄埔精神，是坚信并实行总理所定联俄、联共、拥护农工三大政策的革命军人的精神！”第4期毕业学生代表、中共党员郭俊英（郭化若）在毕业典礼大会上演说，其中讲道：“我们现在所贡献给党国，给民众的，没有别的，只是我们三千同学的铁血，三千同学的头颅，和全副的黄埔精神！什么是黄埔精神？具体说来，就是实行总理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

这一时期，中共党员曹渊、蒋先云等黄埔英烈相继涌现，用生命和鲜血浇灌了以“爱国”“牺牲”为旗帜的黄埔精神核心内涵。

1929年1月，黄埔同学会抚恤死伤同学募捐委员会编辑

出版了《黄埔精神》一书。在这一时期，军校概括黄埔精神内涵主要是“牺牲、团结、负责”的精神，即要“为总理而负责、为主义而团结、为革命而牺牲”的“三为”精神，这里面既有东征时期形成的“不要钱，不要命；爱国家，爱百姓”的“两不两爱”精神，也有北伐时期的“不怕苦、不怕难、不怕死”的“三不怕”精神。

北伐战争时期，以中国共产党为主体的叶挺独立团出征时1800人，北伐阵亡1200人，其中排职以上干部60余人。到1926年底，在北伐军中工作的中国共产党员有1500人，仅在进军河南的作战中牺牲的就有400人。黄埔1期生蒋先云在临颖作战时三次负重伤，仍三次跃起冲锋，直至流尽最后一滴血。北伐战争前期的许多胜利都是共产党人用鲜血换来的。

黄埔军校及各分校在大革命时期培养了大批军政人才。其中，黄埔军校前5期招生7300多人，中共主导的武汉分校在1927年2月开学时有学生3800多人。这些学生经过严格的军事训练和政治教育，对推动国民革命起到了重要作用。许多人后来都成为共产党领导各地武装起义和开辟农村革命根据地的著名将领，叱咤于中国革命斗争的政治和军事舞台上。

中国共产党初建军队的八一南昌起义、秋收起义时期，各支起义队伍中都有一批黄埔军校师生。他们接受过正规的军事政治训练和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其中不少人在校时就已加入中国共产党，又经受过东征、北伐战争炮火的洗礼，成为革命队伍中的军事骨干。据史料考证，参加过南昌起义的黄埔军校师生有148人，参加过井冈山斗争的红军官兵中有黄埔军校师生41人。

经过国共合作办校的数年教学和东征、北伐战争血与火的洗礼后，黄埔精神的核心内涵到此基本形成，这就是：爱国、牺牲、团结、责任。此后，中国共产党人在抗日战争中又为黄埔精神的丰富和发展，有着多方面的重大贡献：如左权、赵一曼、赵尚志等一批中国共产党人的英勇牺牲；如林彪任校长、罗瑞卿任教育长的延安抗大的兴办；更有着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关于黄埔、红埔的论述，等等。

中国人民解放军1955年授衔时，有5位元帅、3位大将、9位上将、9位中将、11位少将曾在黄埔军校任教和学习。1989年，由中央评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36位军事家中，有17人是黄埔军校师生。

中共领导人对黄埔精神的诠释和

发展

抗日战争初期，毛泽东在与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中，给予黄埔军校高度评价，他说：“那时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合作组织新制度的军队，在开始时候不过两个团，便已团结了许多军队在它的周围，取得了第一次战胜陈炯明的胜利。往后扩大成为一个军，影响了更多的军队，于是才有北伐之役。那时军队有一种新气象，官兵之间和军民之间大体上是团结的，奋勇向前的革命精神充满了军队。那时军队设立了党代表和政治部，这种制度是中国历史上没有的，靠了这种制度使军队一新其面目。一九二七年以后的红军以至今日的八路军，是继承了这种制度而加以发展的。”这段谈话中的“新面目”“新气象”指的就是黄埔精神，并特别重点概括出了黄埔精神的基本内涵是官兵团结、军民团结和“奋勇向前的革命精神”，这即是黄埔精神核心内涵的“牺牲、团结”两个主要内容。

说起办学，说起一个学校的精气神，毛泽东在延安时期还说：“从前有个黄埔，那里表现着一种朝气，这种朝气也就代表着一种倾向。黄埔和陕公一样，同学是从各地来的，又分布到各地去。那时的黄埔是要打倒军阀和帝国主义，它是那时中国进步的缩影。”毛泽东在这里所说

的“朝气”，就是黄埔精神。为此引发开来，毛泽东为抗大制定的教育方针是“团结、紧张、严肃、活泼”。抗大的“活泼”两字，就是黄埔军校所呈现的“朝气”的传承和延伸。毛泽东在这里所说的“这种朝气也就代表着一种倾向”中的“倾向”以及前面所说的“新气象”就是蓬勃向上的历史大趋势，充分体现抗日战争时期，黄埔精神在延安抗大和人民军队的延续和发展。

朱德总司令对黄埔军校也有着重要评述，他说：“大革命时期，我们党中央就组织了军委，苏联给中国派来了军事顾问。国民党在我们党的支持下，创办了黄埔军官学校，建立了国民革命军，改造旧军队……因此研究党的军史时，应当从这个老根上研究起。”朱老总的这个“老根”比喻说得太好了，其实已经涉及“军魂”的根本问题，再论证追溯下去，这就是黄埔精神。抗大的教学，即是黄埔军校在抗日战争时期开花散叶的结果。

作为曾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他对亲自缔造黄埔精神更有着独到的见解和理论贡献，他说：“开办黄埔军校应该说是孙中山军事上失败的结果……不断遭到失败。这就教训了孙中山，所以他在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懂得了建立革

命军队的重要，接受了苏联顾问的建议，1923年决策，1924年正式开班黄埔军校……当时黄埔军校有六百学生，大部分是我党从各省秘密活动来的左倾青年，其中党团员五六十人，占学生的十分之一。”周恩来所说中国共产党人在黄埔第1期学生的这个比例，是黄埔1期的精华，是个顶个的黄埔英雄，他们也正是黄埔精神的最初载体。

中共主要领导人都对黄埔军校所呈现出的革命精神表示钦佩，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用“朝气”“新气象”“新面目”“老根”等赞美之词来描述黄埔精神，对今天我们研究黄埔精神具有重大的启迪。

在今天，黄埔精神无疑是被海峡两岸学界、民间共同认可的革命精神。

邓小平在1980年12月《发扬五种革命精神》讲话中指出：“毛泽东同志说过，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在长期革命战争中，我们在正确的政治方向指导下，从分析实际情况出发，发扬革命和拚命精神，严守纪律和自我牺牲精神，大公无私和先人后己精神，压倒一切敌人、压倒一切困难的精神，坚持革命乐观主义、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精神，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文化自信是一个

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继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为人民提供精神指引。”

本文认为，我们在此所论述的“革命精神”应是上自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推翻2000多年封建帝制的辛亥革命时期，下至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在时间段上从1911年到1949年，中国相继处在先后两个阶段的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这一时段所反映出的推进历史进步、民族解放的精神，可以统一称之为革命精神。主要包括两大板块的内容，一是孙中山先生“天下为公”的精神，二是毛泽东主席“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后一种精神，在现代社会又多称为红色精神。

如此分析，可看到众多“革命精神”有一个共同点，其主要内涵与“黄埔精神”叠加，如爱国革命、奋斗牺牲、团结合作、敬业负责等。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在不同时期褒奖黄埔军校，都对黄埔精神的缔造和传播起到了重大推进作用。

在国家统一大业中继续弘扬黄埔

精神

今天，我们谈国家富强和祖国统一，谈黄埔军校师生的历史使命，从制度层面、战略层面、精神层面、文化层面深入研究黄埔军校历史，更加缅怀和铭记孙中山先生建立黄埔军校的初衷，这就是建立黄埔校军的初衷，这就是建立黄埔校军，培养和造就干部骨干，继而完成北伐战争，彻底推翻历代王朝历时2000多年的封建统治，实现国家统一。

黄埔军校师生，是一个特殊的时代精神群体，他们所缔造的黄埔精神是中华民族宝贵遗产。其核心内涵是：爱国、牺牲、团结、责任。这八个大字，在今天的祖国统一大业中，都有着非常贴切和实用的内涵指向。“爱国”是建校宗旨和政治要求；“牺牲”强调的是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敢于抛弃和牺牲个人及小团伙的私利，一切以国家利益和民族大业为重；“团结”是黄埔精神的核心内容；“责任”在今天的统一大业中更具有现实启迪意义。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当年黄埔师生的责任和历史使命是“除军阀”、驱逐日本侵略者出中国；今天我们这代人的历史使命，就是要努力实现国家的完全统一。

“爱国”和“革命”是紧密联系的。爱国是一种对祖国由衷热爱的朴素感情，革命是顺应浩

黄埔精神 我之浅见

□ 周绍英(黄埔 21 期生)

岁月如流水，不知不觉中黄埔建校已近 100 年。在临近母校华诞之际，我心潮澎湃，感慨万千。黄埔军校犹如一座大熔炉，4 年（鲁干班→八分校→七分校→本校西安督训处）的黄埔军校生活，把我锻炼成一个拥有强健的身体、钢铁般的意志、清醒的头脑的坚强战士。故而使我面对人生重大抉择时，能清醒地明辨是非，从未被那些乌烟瘴气所迷惑，始终在思想上沿着孙总理的遗训而阔步前进；在面对生活困境时，总能看清前进的

方向和应走的道路，最终以战斗的姿态度过，从未低头。总之，荆棘没能刺破我前进的雄心，恶魔没能吓退我为国为民的意愿。究其原因，是 4 年的黄埔生活使我通身内外都深受黄埔精神的熏陶。所以，时至今日，我这个黄埔老兵始终相信，有了信仰才有力量，有了力量才能战胜一切错误和困难，仍以黄埔精神作为我的行动指南。

孙中山先生立承前启后救国救民之宏愿大志，领导国民革命，推翻满清建立民国。但而后十几

荡的世界潮流、推动社会发展进步而不断锐意进取的思想和行动。所以，仅爱国还不够，还要革命，富有蓬勃向上的朝气，而不能因循守旧，固步自封，更不能逆历史潮流而反动。“革命”对一个满怀报国之志者来说非常重要，“爱国”和“革命”两者缺一不可。

在黄埔军校历史中，对孙中山倡导的“爱国革命”黄埔精神既有坚持也有背离。坚持了“爱国革命”的黄埔精神，军校就发达兴旺；不爱国，不革命，或爱国而不革命，或革命而不爱国，都会遭到历史的抛弃，军校就会黯然失色。爱国革命，是一种永恒的精神力量，让许多人

找到了源动力，激励着一代代人事业的成功。

台湾回归，祖国统一，是全国人民的心愿，更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中华儿女的重大历史使命。

习近平在《告台湾同胞书》发表 40 周年纪念会讲话中，更加强调指出：“1949 年以来，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中国人民始终把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作为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国家之魂，文以化之，文以铸之。两岸同胞同根同源、同文同种，中华文化是两岸同胞心灵的根脉和归属。”“两岸同胞要共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动其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

性发展。两岸同胞要交流互鉴、对话包容，推己及人、将心比心，加深相互理解，增进互信认同。要秉持同胞情、同理心，以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化育后人，弘扬伟大民族精神。”

当年，黄埔军校为国家统一而生、而战，国家统一是黄埔师生的历史责任。今天，国家尚未统一，我们仍需努力，特别是仍肩负国家和平统一历史使命的黄埔同学、黄埔后人们，仍需进一步发扬和传承黄埔精神，在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坚决反对“台独”及任何分裂势力，为祖国的统一和强盛而努力奋斗。■



/ 周绍英。

年，由于军阀割据各自为政，国家仍处于分裂动荡不安之状态。孙中山先生反复思考，发现苏联十月革命成功晚于辛亥革命，但国家政局十分稳定。便派考察团前去取经，得出的结论是：建国必先建军，建军必先培养军官。有了革命的军官，才有革命的军队；有了革命的军队，才有革命的彻底胜利。于是在苏联的帮助下，经国共两党共同努力，创办了黄埔军校，对革命事业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试观黄埔军校创办以前，各地军阀也曾开办了大小不同的讲武堂，而培养出来的学生，多是争权夺利的旧军人。只有黄埔军校有一种特殊的精神，这就是黄埔精神。“亲爱精诚”校训是典型的说明，再具体一点，就是“不要钱、不要命、爱国家、爱百姓——爱国革命”。这也是黄埔军校政治教育的实质。黄埔军校大门有一副“升官发财请往他处 贪生畏死勿入斯门”的对联，是黄埔精神具体而生动的表达。

黄埔军校的爱国革命精神，在不同的时期有

着不同的内容与表现。在东征时期，国民革命军以黄埔学生为骨干，不到两年时间，即由两个团扩为旅，进而扩展为师。以此劲旅为骨干，消灭了诸多军阀，奠定了国民政府统一中国的基础。由于这支队伍具备黄埔精神，全体官兵英勇顽强，不怕牺牲，纪律严明，从而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为黄埔军校历史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北伐战争是一次武装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战争。从1926年5月到1927年夏天，短短的一年时间，就席卷东南各省，连克武汉、南昌、上海。战斗之激烈，取胜之迅速，军威之旺盛，纪律之严明，实为我国现代史上所罕见。总之，在东征、北伐战争中，黄埔师生用生命和鲜血实践了黄埔精神。有的冲锋陷阵，破敌攻城，葬身青山；有的深入敌后，虎穴立功，历尽艰险；有的以笔作枪，奔走呼号，锐不可敌；有的傲立刑场，视死如归，慷慨就义。

抗日战争中，据统计，一共发生22次大会战，1117次中型战役，28931次小战斗。这些大小战斗中，几乎每一次都有黄埔师生的身影，都留下了黄埔师生的光辉足迹。赴缅作战的远征军中阵亡的黄埔师生就有5700之众。抗日战争中，为国捐躯的将军中有97位毕业于黄埔军校。这些数字的背后，无一不是黄埔精神的具体体现。

孙中山先生曾多次指出：“统一是全国国民的希望。能够统一，全国人民便幸福，不能统一，便要受害。”历史也多次证明，发扬黄埔精神，国共两党密切合作，致力振兴中华，就会给国家民族带来好处。反之，就会损害国家和民族的利益。

今天，“台独”分子妄想把台湾从祖国的怀抱中分裂出去，这是最大的卖国行为。为此，传承和发扬黄埔精神的现实意义，无疑就是要发挥黄埔同学、黄埔后代亲友的特殊作用，牢记祖国统一、民族振兴的历史重任，不遗余力地反对“台独”，推进祖国统一进程。这也是历史赋予黄埔人的神圣使命。愿与各位黄埔人共勉！

论黄埔精神

□ 海泽龙

名扬天下、如雷贯耳的黄埔军校及黄埔精神，长久以来一直为海内外华人及仁人志士津津乐道。回溯历史不难发现，黄埔精神的核心要义是爱国，而肩负着将黄埔精神付诸实施、发扬光大的历史重担，进而将黄埔精神不断充实与丰富的，则是黄埔军校学生。进入新时代，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之下，黄埔精神被赋予了新的现实意义，即包括青年民众在内的海内外中华儿女共同携手，秉承黄埔先辈的宏愿与初心，推进海峡两岸和平统一，助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爱国主义：黄埔精神的核心要素

黄埔军校建立之前，中国各地的军阀和地方机构，也曾开办过多家不同水平和规模的军校及讲武堂。然而，只有黄埔军校真正做到独树一帜。黄埔军校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所培养革命干部的新型军事政治学校，汇华夏之青年英才，肩负起“爱国”“革命”为重要内涵的时代使命与担当，对20世纪中国的军事发展和政治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其中关键所在，是因

为黄埔军校有着特殊的团队精神——黄埔精神。

来自全国各地的黄埔青年以青年民众特有的蓬勃朝气、昂扬斗志，积极投身于国家统一、民族独立、人民富强的历史进程中，用自身的热情、鲜血乃至生命诠释和塑造了黄埔精神。这是为统一中国、振兴中华而矢志不渝、顽强奋斗的“牺牲、负责、不怕死”的爱国主义精神；是面对国家和民族的危亡，不计前嫌共御外侮的“天下黄埔是一家”的团结精神。

黄埔精神发端于每个黄埔学生对国家、对民族的热忱与热爱，归根于对国家、对民族、对社会的奉献与牺牲。可以说，爱国主义是黄埔精神的出发点，也是黄埔精神的外在体现，更是黄埔精神的核心要素。

回溯历史，不难发现，以爱国主义为核心要义的黄埔精神，作为当时那个时代中国社会的重要思想潮流之一，一直伴随着千千万万的黄埔青年及各界仁人志士，为国家和民族求独立、求解放、求富强而前赴后继、奋勇向前，推动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



/ 海泽龙。

热血青年：黄埔精神的缔造者

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内忧外患：军阀割据、战乱频仍；水灾、旱灾、蝗灾等天灾此起彼伏；英法等国在中国领土上划分势力范围，日本占据台湾并驻军东北，租借地遍布中国的城市和港口，“治外法权”四处横行……

为解救积贫积弱、民不聊生的中国，1924年6月，孙中山先生在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创建了黄埔军校。一时间，“到黄埔去”的激昂口号响彻中华大地，成千上万的中华热血青年纷纷涌向革命圣地——广州黄埔长洲岛上的黄埔军校。在黄埔军校，这些热血青年如饥似渴地学习当时进步的革命思想和先进的军事知识，以革命的武装力

情系黄埔, 奉献祖国统一大业

——对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上的讲话和全会精神的认识

□ 边强

在新冠病毒肆虐, 兰州防疫形势严峻, 封足宅家的日子里迎来了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的召开, 并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作为一名退体的党员干部, 20 多年来热心参与省黄埔军校同学会工作活动的黄埔二代、志愿者, 通过认真学习这次全会决定和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 感触很深, 总结出以下三点体会和认识, 与大家共勉。

一、领会重点精神, 增强四个意识

中华千秋伟业, 百年风华正茂。在建党百年之际, 党中央召开十九届六中全会, 全面总结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 习近平总书记对关系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伟大理论和实践问题

进行了科学判断, 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指明了道路和方向, 中国共产党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不忘初心, 方得始终, 党的十八大以来, 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 我们将更加坚定不移地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 攻坚克难、开拓奋进,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以更加昂扬的姿态迈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历史交汇关键节点上召开, 独具意义。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 回顾过去、展望未来, 对党的百年奋

量挽救国家民族于危亡, 为中华之崛起与强盛奉献青春、抛洒热血。

从 1924 年到 1949 年, 黄埔军校共招生 23 期(期间因时局发展校址有多次变动, 也曾在各地开办多所分校), 共培养学生约 18 万, 其中不乏国共两党的著名军事将领。在国家危亡时刻, 这些黄埔的热血健儿义无反顾地奔向战场, 不惜抛头颅、洒热血。东征、北伐、抗日战争中, 大江南北到处都留下了他们的英勇身姿。他们用生命和鲜血践行了入校的报国志, 也缔造了

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黄埔精神。

国家统一: 黄埔精神的时代要求

时代在发展, 黄埔精神也在发展, 它的内容在一代代黄埔人的传承发扬中不断丰富, 同时也对一代代黄埔人提出新的要求。2020 年年初, 在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中, 面对传播速度快、感染范围广、防控难度大的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全国各地的黄埔军校同学会带领黄埔人冒着危险“逆行”而上, 做到“守土有责, 黄埔有担当”“戮力同心共抗疫, 黄埔精

神再生辉”“携手共战疫情, 彰显黄埔作为”, 用实际行动践行了黄埔精神的时代担当。这无疑是黄埔精神传承发扬的重要体现。

今天,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 台湾岛内民进党的“台独”分裂行径花样百出, 对两岸黄埔人继承和弘扬黄埔精神提出了新的挑战。需要两岸黄埔人摒弃分歧, 秉承黄埔先辈的宏愿与初心, 继续发扬爱国主义为核心的黄埔精神, 为实现祖国统一和民族复兴而努力奋斗。■

斗历程进行全面系统总结，“十个坚持”深刻揭示了“过去我们为什么能够成功、未来我们怎样才能继续成功”。纵使现在疫情蔓延，海内外情势较以往复杂，但中国实现高质量发展、推动共同富裕的决心绝不会动摇。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亲历亲见了人民生活得到改善，祖国日益强盛，在现代化建设中不断取得的伟大成就，处处发生的惊人变化。尤其是自去年发生新冠肺炎疫情之后，以习近平为领导核心的党中央决策果断，行动迅速，一声令下，十四亿人民齐心防疫，切断了病毒的传播，使城乡民众免受侵害，充分显示了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令行禁止，群众自觉维护公共利益，彰显了全国一盘棋，大爱连心，同舟共济，团结互助的民族情操和责任意识。这就是党百年实践能取得革命成功的底气，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自信和优势。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党员干部要不断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这也是全会的重点精神所在。如何把“两个确立”真正转化为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的思想自觉、政治自觉、行动自觉，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紧扣甘肃中心工作，发挥联系黄埔同学及亲属后代的特色与优势，围绕促进和平统一的伟大使命，在建言资政和凝聚共识上双向发力，奋力谱写好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篇章，将是我们省黄埔军校同学会的历史使命。

二、明确使命担当，坚定四个自信

明确使命担当，是全会对广大党员干部的普遍要求，也是今后指导我们开展工作的首要问题。只有目的明确，才能在使命感的激励下完成党所交付的各项任务。因此必须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会公报指出，党确立习近平同志

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两个确立”是中华民族复兴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的关键所在，是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根本保障，符合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共同愿望。所以，我们无论在什么岗位上都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提高政治理论水平，将“两个确立”转化为思想自觉、政治自觉、行动自觉，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而不懈努力。

在深刻领会本次会议的核心要义，准确把握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的同时，还要善于从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精神中汲取奋斗的智慧，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践行初心使命，不断提高政治站位，强化责任落实，紧盯责任目标，紧靠人民群众，突出服务中心职能，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全会精神上来。

中共十九大报告强调：“全党要更加自觉地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保持政治定力，坚持实干兴邦，始终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充分说明，只要道路正确、理论正确、制度正确、文化正确，只要坚定不移、坚韧不拔、坚持不懈、艰苦奋斗，朝着伟大目标持之以恒前进，风雨如磐不动摇，我们的目标就能够达到，我们的目标也一定能够达到！

这次六中全会再次强调四个自信，成为党坚定的执政理念，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只有更加自觉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更加清醒地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才能不断开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

省黄埔军校同学会作为联系省内外黄埔同学亲友的纽带，在深入学习领会全会精神，继续在政治上、思想上、行动上更加紧密地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将会更加主动自觉、积极有效地发挥智力密集、

人才荟萃优势，深入调查研究、积极建言献策，在省委省政府的领导下要主动担当、奋力作为，才能弘扬统一战线光荣传统，凝聚人心、汇聚力量、守正创新，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广泛力量支持。

三、坚持统一战线，凝聚爱国力量

此次大会公报中强调，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行径，坚决反对外部势力干涉，牢牢把握两岸关系主导权和主动权，显示出中共中央反“独”促统、实现两岸同胞心灵契合，增进祖国和平统一的信心与决心。我们今后的工作就是要让更多台湾乡亲真正了解大陆，并把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内核清楚明确地传递给岛内民众，共同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然而当前，面临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祖国统一事业遇到了一些新的困难和挑战。如何坚持做好工作，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我认为省黄埔军校同学会也将大有作为。

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统一战线始终是我党的重要法宝。在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中，一直都坚持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在新时期，我们除了要继续做好国内工作，也要更加深入了解国外各地区各种情况，扩大知识面，拓宽工作面，更大范围凝聚人心，扩充爱国统一群体阵容。

抗日战争时期，党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坚持全面抗战，团结一切抗日力量，最终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黄埔军人做为爱国精神的实践者，面对强敌英勇无畏，热血铸就不屈灵魂，成为中华儿女心系家国、同仇敌忾的一面旗帜。在当前国际形势错综复杂，敌对势力千方百计遏制中国继续发展的时刻，大陆黄埔同学虽然大多年迈，但亲属子孙却依然不忘前辈教诲，决心传承家风，矢志不移投身祖国统一大业，成为海内外一支潜力巨大的爱国力量。甘肃省黄埔军校同学会近年来

通过切实有效的组联工作，与港澳台同胞和海外华侨华人等建立了普遍联系和深厚友谊，这些爱国统一的拥护者，通过各种方式关心支持甘肃省经济振兴发展，有的赈灾扶贫助学，捐资赠物；有的兴办实业，助推当地发展；有的发文赐稿，畅谈爱国心声，声讨分裂势力。在建党百年时，台湾黄埔老兵和亲友冲破重重阻挠，辗转寄来了凝聚他们深情的书画作品，参加省黄埔军校同学会举办的纪念展览，随后又为纪念辛亥革命110周年在台湾办展，选用甘肃省近20幅书画作品，其中5幅作品被台湾书画爱好者收藏。两岸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和交流，使那些试图去中国化的“台独”势力枉费心机，没有市场。这些活动和事例，让我们认识到黄埔的旗帜依然具有感召力，也为今后的工作开展拓宽了路径，坚定了我们继续努力信心。

通过学习我认识到，甘肃省黄埔军校同学会在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和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时，要继承擦亮“黄埔”金字招牌，以乡情、亲情、友情为纽带，加强同各地黄埔组织的交流交往，同港澳台相关团体和海外人士的沟通联络，画出海内外同胞共同反“独”促统的最大同心圆。广大黄埔会员和黄埔后代亲属，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把坚定不移推进甘肃省高质量发展等重大问题作为建言献策着力点，为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强省建设献计出力，为构建对台工作大格局、推动祖国完全统一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贡献。作为一名文史工作者，在新的历史阶段，我将利用历史文化在凝聚人心、达成共识中的影响力，继续为海峡两岸的黄埔亲友往来交流建言献策，继续发挥余热，团结海内外中华儿女，为早日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而不懈努力。■

（作者系原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书记、副所长，省古籍保护中心专家委员会委员，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海峡两岸大事记

2021年10—11月

□ 吴亚明

10月

海旅会打造“美丽中华——相约冬奥”主题展区亮相台北夏秋旅展

1日开幕的“2021台北夏季暨秋季旅展”上，海峡两岸旅游交流协会（海旅会）台北办事处设立的展区以“美丽中华——相约冬奥”为主题，面向台湾民众推介大陆特色旅游和最新资讯，吸引了众多观展者。

国台办：民进党当局有何资格和颜面妄谈孙中山先生和辛亥革命

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9日应询指出，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立场，勾连外部势力疯狂进行谋“独”挑衅，损害台湾同胞福祉、危害台湾同胞安全，出卖中华民族利益，其所作所为与孙中山先生的遗愿、气节和精神完全背道而驰，有何资格和颜面妄谈孙中山先生和辛亥革命。

纪念辛亥革命110周年大会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纪念辛亥革命110周年大会9日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今年是辛亥革命110周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中国人民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在这个重要时刻，我们在这里隆重集会，缅怀

孙中山先生等革命先驱的历史功勋，就是要学习和弘扬他们为振兴中华而矢志不渝的崇高精神，激励和团结海内外全体中华儿女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共同奋斗。

国台办评民进党当局领导人所谓“讲话”：鼓吹“台独”、煽动对立

针对民进党当局领导人10月10日发表所谓“讲话”中涉及两岸关系内容，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应询表示，这篇“讲话”鼓吹“台独”、煽动对立，割裂历史、扭曲事实，以所谓“共识、团结”为幌子，图谋绑架台湾民意，勾连外部势力，为其谋“独”挑衅张目。

外交部：坚决反对台湾个别人歪曲联大第2758号决议

针对近段时间台湾个别政治人物多次“投书”外国媒体，刻意歪曲联大第2758号决议，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12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联大第2758号决议体现了国际公认的法律事实，白纸黑字，不容台湾当局和任何人肆意抵赖和歪曲，任何形式的“台独”之路都不可能得逞。

国台办：所谓两岸“互不隶属”是赤裸裸地贩卖“两国论”

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13日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应询表示，两岸同属一个中国，两岸关系绝不是“国与国”关系，所谓“互不隶属”就是赤裸裸地贩卖“两国论”。

大陆方面对台湾高雄火灾伤亡事故表达关切

据台湾媒体报道，14日高雄市盐埕区“城中城”发生大火，造成数十人死亡，多人受伤。事故发生后，大陆有关方面高度关切，国务院台

办、海峡两岸关系协会向此次事故罹难的同胞表达深切哀悼，向受伤同胞和有关人员家属表达诚挚的慰问。

台湾桃园机场受疫情冲击 1 至 8 月出入境仅约 60 万人次

受新冠疫情持续影响，台湾地区最大的航空港——桃园机场出入境人数严重下滑，今年 1 至 8 月仅约 60 万人次，而 2019 年全年则超过 4000 万人次，1979 年开航时也有 404 万人次。

两岸人士齐聚浙江金华纪念台湾光复 76 周年

为纪念台湾光复 76 周年，“反殖民与台湾光复——日据时期台湾历史图文展”暨全国台联“海峡两岸民间交流基地”授牌仪式 20 日举办，来自两岸的专家学者及台湾义勇队后人相聚浙江金华，纪念 76 年前那段激动人心的峥嵘岁月。

中国驻欧盟使团就欧洲议会通过涉台报告提出严正交涉

欧洲议会 21 日宣布通过所谓《欧盟—台湾政治关系与合作》报告。中国驻欧盟使团发言人就此发表谈话说，中方对此表示坚决反对，并已向欧方提出严正交涉。

国台办：台湾不是一个国家，中国在联合国代表权当然包括台湾

针对美国官员妄称中国“错误使用”联合国大会 2758 号决议，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 27 日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应询指出，联合国是由主权国家组成的政府间国际组织。台湾不是一个国家，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当然包括台湾在内的全中国的代表权。

2021 海峡两岸（苏州）青年文化月开幕

27 日，以“赓续一脉 汇融两岸”为主题的 2021 海峡两岸（苏州）青年文化月正式开幕，吸引了长三角地区台湾青年和大陆青年共 300 余人参加。

2021 广州台博会举办

2021 广州台湾商品博览会 27 日开幕。作为第 29 届广州博览会的主题展之一，本届台博会将持续 4 天，采取线上线下融合办展的形式举办。其中线下展览面积 0.8 万平方米，参展台资企业近 300 家。

11 月

2021 “美丽中华”线上系列推广活动跨两岸举行

海峡两岸旅游交流协会主办的 2021 “美丽中华”线上系列推广活动 2 日举行。活动连接两岸 9 个会场，面向台湾业界重点推介“黄河之旅”“长江之旅”两大经典旅游主题产品，同时共叙两岸同根同源的血脉之亲，共谋两岸文化和旅游交流合作新篇。

美方一些人炒作“台湾参与联合国系统”，国台办：无视国际公理和国家信誉

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 5 日应询表示，联合国是由主权国家组成的政府间国际组织。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不是主权国家，理所当然不能成为联合国成员，也不能成为包括世界卫生组织等在内的联合国下属专门机构的成员。这是国际社会共识，不是美国有些人想否认就能否认的。

台湾 10 月 CPI 为 2.58%，今年第五度突破通胀警戒

台湾当局行政主管机构“主计总处”5 日公布数据显示，台湾 10 月消费者物价指数（CPI）年增率达 2.58%，是今年第五度突破 2% 的通胀

警戒线。

今年前十月台湾对大陆出口额为历年同期最高

台湾当局财政事务主管部门8日公布数据显示，今年1至10月，台湾对大陆（含香港）出口额达1546.8亿美元，为历年同期最高，同比增长26.5%；自大陆进口684.2亿美元，同比增长32.3%；贸易顺差达862.6亿美元。

国台办：依法对“台独”顽固分子实施惩戒是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应有之义

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10日表示，对公然挑衅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行径，我们绝不容忍，将依法对“台独”顽固分子实施惩戒。这是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应有之义，也是保障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应有举措。凡是胆敢以身试法者，必将依法受到惩戒。

外交部：美方应停止向“台独”势力发出任何错误信号

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11日指出，中国统一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美方应以实际行动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谨言慎行，停止向“台独”势力发出任何错误信号。

纪念台盟成立74周年暨谢雪红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在京举行

纪念台盟成立74周年暨纪念谢雪红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12日在京举行。全国政协副主席、台盟中央主席苏辉出席并讲话。

陆生人数骤降，台湾高教界批评民进党当局两岸政策作为

台湾媒体日前报道，受疫情与政治因素影响，来台求学的大陆学生人数骤降。对此情况，

台湾高等教育界人士感到忧虑与无奈，认为与民进党执政以来造成两岸关系紧张脱不开关系。

大陆台胞热议十九届六中全会公报

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公报11日发布，大陆台胞高度关注。一些台胞受访时表示，中共建党百年历经风风雨雨，非凡成就令世界刮目相看；公报展现大陆反“独”促统的坚强决心、坚定意志，传递出强烈信号：台湾的前途系于国家统一，祖国完全统一一定能实现。

沪粤台三地学术界在上海研讨孙中山与中国现代化

由上海、广东、台湾三地专家学者共同参与的“孙中山·辛亥革命·中国现代化”学术研讨会13日至14日在上海举办。

国台办：关于中美元首视频会晤涉台内容的情况十分清楚

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17日应询表示，关于中美元首视频会晤涉台内容的情况十分清楚。美方不支持“台独”是美国政府长期以来一再重申的立场。正告民进党当局和“台独”势力，试图靠外部势力谋“独”是不可能得逞的。对一切挑衅逼迫甚至突破红线的行径，我们将采取断然措施。

第七届两岸学子论坛聚焦传承与希望

20日，第七届两岸学子论坛在福建厦门开幕。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台湾大学、台湾政治大学、台湾师范大学、香港中文大学、澳门科技大学等海峡两岸和港澳地区60余所知名高校的290余位青年学子和台湾研究学者与会。

台湾远东集团在大陆投资企业因违法违规被依

法查处

上海、江苏等省市执法部门对台湾远东集团在当地投资企业存在违法违规行为进行了查处。远东集团涉事企业承认存在违法违规事实，已缴纳或正按程序缴纳罚款及税款。

国台办：绝不允许支持“台独”、破坏两岸关系的人在大陆赚钱

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 22 日应询指出，我们欢迎支持广大台胞台企来大陆投资发展，将继续依法保障台胞台企的合法权益，但绝不允许支持“台独”、破坏两岸关系的人在大陆赚钱，干“吃饭砸锅”的事。广大台商台企要明辨是非，站稳立场，与“台独”分裂势力划清界限，以实际行动维护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台湾 1 至 10 月接大陆订单金额同比增长逾三成

台湾当局经济事务主管部门发布最新统计显示，今年 10 月台湾接大陆（含香港）订单金额 143.4 亿美元，环比减少 10.5%，同比增加 21.7%；1 至 10 月累计金额 1422.1 亿美元，同比增长 30.7%，在全部外销订单中占比为 26.3%，仅次于美国的 29.4%。

国台办：坚决贯彻落实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

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 24 日应询表示，我们要认真学习宣传贯彻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切实把全会精神转化为推进对台工作的强大力量，从党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中汲取智慧和力量，坚决贯彻落实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毫不动摇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行径和外部势力干涉，团结广大台湾同胞共担民族大义，

共同致力民族复兴、祖国统一。

国台办：“台独”顽固分子清单上绝不止苏贞昌、游锡堃、吴钊燮三人

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 24 日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苏贞昌、游锡堃、吴钊燮等极少数“台独”顽固分子挑动两岸对立、破坏两岸关系、图谋分裂国家、危害台海和平，我们依法对其实施惩戒。可以明确的是，“台独”顽固分子清单上绝不止这三人。

外交部：坚决反对美方邀请台湾当局参加所谓“领导人民主峰会”

针对美国国务院公布的“领导人民主峰会”受邀名单包括台湾一事，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 24 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中方坚决反对美方邀请台湾当局参加所谓“领导人民主峰会”，严正敦促美方停止向“台独”势力提供任何讲台，停止为“台独”势力张目。

福建平潭开通直航台湾集装箱班轮航线

第一条以平潭为母港直航台湾岛的集装箱班轮航线 25 日正式开通。“鲁丰”轮作为这条“平潭—台北—台中”航线的首艘集装箱船，已于当天凌晨装载货物直运台湾。

“弘扬辛亥精神 共创复兴伟业”——第八届两岸智库学术论坛在京举行

以“弘扬辛亥精神 共创复兴伟业”为主题的第八届两岸智库学术论坛 26 日在北京举行。本届论坛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全国台湾研究会、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台湾二十一世纪基金会、台湾中国文化大学社会科学院共同举办，90 余位两岸专家学者和台商台青等通过视频连线共同参与。■

解码俄罗斯“库兹涅佐夫”号航空母舰

□ 石稼

“库兹涅佐夫”号航空母舰是目前俄罗斯唯一一艘在役常规动力航母，是苏联第三代 1143.5 型航空母舰首舰，也是苏联和俄罗斯海军史上第一艘真正意义上的航空母舰。

该舰于 1982 年开工建设，1991 年正式服役，舷号 063，当时造价约 30 亿美元，部署在俄罗斯海军北方舰队。“库兹涅佐夫”号航空母舰是苏联海上作战思想的典型代表，作为航空母舰与巡洋舰的混合体，该舰的舰载机主要任务是防空和反潜，而反舰任务则是由超音速反舰导弹负责。“库兹涅佐夫”号是目前世界上现役的唯一装备远程反舰导弹和大量舰载武器的航空母舰，是俄罗斯海军主力舰艇。



/ “库兹涅佐夫”号航空母舰。

一、舰船结构

（一）整体结构设计

“库兹涅佐夫”号航空母舰延续了“基辅”级的船体设计，长 306.3 米，宽 38.5 米，斜角飞行甲板最宽 73 米，标准排水量 5.3 万吨，满载排水量 6.5 万吨。主舰体从飞行甲板往下共有 10 层甲板。舰艏滑跃甲板部分采用外飘设计，舰艏水下部分采用球

鼻艏设计，舰艏采用方形设计，水上部分舰体基本采用“钢 + 玻璃纤维 + 钢”的夹层结构。岛式上层建筑位于飞行甲板右侧，长 64 米，宽 8.5 米，高 32 米，主要由舰桥指挥部位、飞行管制站、高级住舱、电子设备、烟囱和工作舱室等组成。该舰舰体分为 11 个防水舱，采用双重底

结构的防雷隔舱，内部为空腔、燃料舱或淡水舱，能够吸收鱼雷、水雷和导弹的爆炸能量，即使 5 个防水舱进水，也能保证全舰所需浮力，具备优秀的抗沉性。全舰共划分为 3857 个区域，拥有 387 个居住舱、2500 个床位、50 个洗浴室、6 个食堂以及医院等配套舱室。

（二）飞行甲板设计

“库兹涅佐夫”号航空母舰采用全通式斜角飞行甲板和滑跃起飞甲板设计，斜角甲板向舰体中轴线左侧偏离 7° ，滑跃起飞甲板上翘 12° ，飞行甲板全长305米，最宽处73米，总面积约14800平方米，分为起飞区、降落区、待机区、补给区等多个板块，飞行甲板上的固定停机位可停放10架舰载战斗机，其余临时停机位需要统一调度使用。该舰的起飞跑道分为“2短1长”共3个固定起飞点，每个起飞点分别安装有1台偏流板，没有安装弹射器。其中，短起飞点跑道长度约105米，长起飞点跑道长度约195米，滑跃甲板端头采用圆弧形设计，以减少航母在迎风加速时产生的甲板乱流，滑跃甲板后部设有2列共12个重型超音速反舰导弹发射舱盖。该舰的斜角甲板长约205米，宽23米，尾端横向设置了4道相互间隔14米的阻拦索，左舷侧设有光学助降系统和半埋式的降落引导室。“库兹涅佐夫”号航空母舰开创了“滑跃起飞+拦阻降落”的新型起降模式，使得常规起降方式的重型舰载机在没有弹射器辅助下，仍能以放弃一部分战斗载荷的代价从航母上腾空作战，这也成为该舰最显著的特征之一。

（三）机库区域设计

“库兹涅佐夫”号航空母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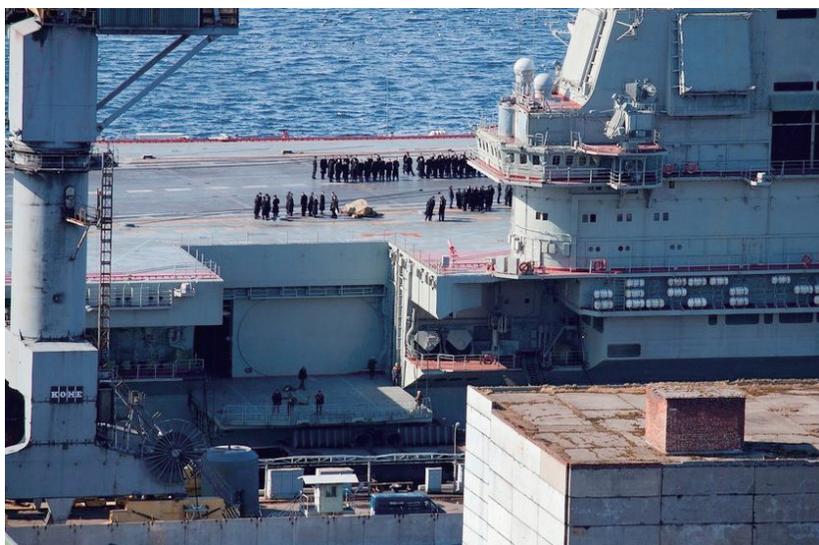
／ “库兹涅佐夫”号航空母舰滑跃甲板。

的典型配置方案为20架苏-33舰载战斗机，4架苏-25UGT舰载攻击机，15架卡-27反潜直升机和2架卡-31预警直升机。舰载机数量少的原因，主要是滑跃甲板下的反舰导弹发射装置占用了部分内部空间。该舰机库长180米，宽30米，高7.5米，

最多仅可容纳18架舰载机。该舰共有2台舷侧式大型升降机，分别位于舰岛的前后两侧。升降机平台长20米，宽15米，载重35吨。机库前端设有1台大型弹药升降机，长13米，宽4米，必要时可以运输舰载直升机和拖车，还有2台小型弹药升降机



/ 苏-33 舰载机拦阻着舰。



/ “库兹涅佐夫”号航空母舰后侧的大型升降平台。

分别设置在斜角甲板尾部左舷侧和舰岛靠飞行甲板一侧。目前正在船厂改装的“库兹涅佐夫”号航空母舰计划拆除反舰导弹发射装置以扩大机库空间，并且用尺寸更小的新型米格-29K 中型舰载机替代老旧的苏-33 重型舰载机，从而进一步提升舰载

机搭载数量，有效提升本舰的综合作战能力。

二、动力系统

“库兹涅佐夫”号航空母舰的动力系统延续了 1143.3 型“巴库”号航空母舰的“四轴四桨两舵”设计，搭载了 8 台 KVG-4

增压型重油锅炉和 4 台 TB-12 型蒸汽轮机，总功率达 20 万马力，最大航速 30 节，海上自持力 25 天，最大续航力为 8500 海里 /18 节。该舰在底层甲板前后交错布置了相互独立的 2 个动力舱和 4 个轮机舱，每个动力舱安装了 4 台锅炉和 2 台蒸汽轮机，每 2 台锅炉对应 1 部蒸汽轮机，每 1 部蒸汽轮机通过 1 根传动主轴将动力传递到 1 个大型螺旋桨，螺旋桨直径 4.26 米，采用低噪声的 5 叶定距式桨叶结构。其中，乌克兰生产的 TB-12 型蒸汽轮机虽然问世时间较早，但至今仍属于世界燃机型号中动力最强的一种，并在不断改进之中，具备输出功率强、可靠性高、工作噪声低等优点，但启动时间长、油耗量较大，需要大型补给船提供贴身式保障。

三、船电装备

(一) 指控系统

“库兹涅佐夫”号航空母舰装备了苏联的“伐木工”编队指挥系统，该系统属于苏联第三代编队指挥系统，采用基于以太网的分布式体系结构，能够分别接收舰上各类雷达、声呐探测系统的处理结果形成战场综合态势，能够融合处理编队、本舰和各级作战部位的指挥控制信息，对编队舰艇、飞机、舰载武器进行实时指挥控制和目标



/"库兹涅佐夫"号航空母舰升降机正在运输苏-33舰载机。



/"库兹涅佐夫"号航空母舰“四轴四桨两舵”设计。

指示。该系统最多能够同时支持9艘作战舰艇和35个空中平台组成的海空任务编队进行作战行动，能够同时筛选跟踪256个海上和空中目标，并同时显示和处理其中60个目标。总的来说，“库兹涅佐夫”号航空母舰的各类信息系统和电子设备仅代表上世纪80年代末的苏联最高水平，随着信息化技术的飞速发

展，该舰信息系统与世界先进水平差距不断加大，已难以适应信息化战争的基本需要。

(二) 雷达系统

“库兹涅佐夫”号航空母舰的雷达系统由多型雷达组合而成，主要包括1部G/H频段的“天空哨兵”多功能相控阵雷达，1部D/E频段MR-710“顶板”三坐标对空/对海雷达，2

部F频段的MR-320M“双撑面”对海雷达，3部“棕榈叶”导航雷达，1部I频段的“蛋糕台”战术空中导航雷达，4部I波段的MR-360“十字剑”火控雷达(用于SA-N-9舰空导弹)，8部3P37“热闪”火控雷达(用于SA-N-11舰空导弹)，4部H/I波段“低音帐篷”火控雷达(用于近防炮系统)。其中，“天空哨兵”多功能相控阵雷达，采用4个矩形的相控阵天线阵列覆盖本舰360°区域。该雷达与美国“宙斯盾”系统类似，能对数十批次的空中目标进行探测、识别和跟踪。“顶板”三坐标对空/对海雷达位于舰岛最顶端，用于对海空目标进行全方位的远程预警探测。“蛋糕台”战术空中导航雷达，主要为本舰飞机提供全天候的归舰导航信号，其圆柱状天线整流罩位于“顶板”雷达下方，成为该舰最明显的外形特征之一。另外，该舰搭载的卡-31预警直升机配有E801M无源相控阵雷达，能够在主要威胁方向上为航母编队提供更大的预警探测范围，并引导远程超音速反舰导弹对海攻击。

(三) 武器系统

“库兹涅佐夫”号航空母舰主要的武器系统包括12枚SS-N-19“花岗岩”超音速反舰导弹，4座SA-N-9防空导弹系统，8座“卡什坦”弹炮合一近



/ “库兹涅佐夫”号航空母舰的信息系统。



/ 舰岛上装备了各种雷达、通信和传感器设备。

防系统，4座AK-630型6管30毫米近防炮系统，2座RBU-12000型10联装火箭深弹发射器以及UDAV-Z型深水炸弹发射装置等。其中，SS-N-19“花岗岩”超音速反舰导弹采用卫星

定位制导和主动末制导方式，飞行速度1.6马赫，射程达550公里。SA-N-9防空导弹系统每座含有6个发射单元，每个发射单元备弹8枚，全舰共计搭载192枚，射程15公里。每套“卡什

坦”近防系统由2座30毫米6管近防炮和8枚SA-N-11防空导弹组成，火炮射程2500米，导弹射程8公里。AK-630型近防炮是苏联海军水面舰艇的通用装备，火炮射程2500米。RBU-12000型火箭深弹发射器分别布置在舰艏两侧，可打击12公里范围内的水下目标。“库兹涅佐夫”号作为世界上唯一装备超音速反舰导弹和深水炸弹的航空母舰，全舰武器系统已远远超过一艘重型巡洋舰的标准，具备独立的对空、对海、反潜作战能力。

（四）配套系统

“库兹涅佐夫”号航空母舰的配套系统主要包括电子战系统、通信系统、声呐系统、光学助降系统和着舰拦阻系统等。其中，电子战系统主要包括2部PK-2和10部PK-10干扰箔条发射器，4部“锡人”光电指示系统，“酒瓶”和“跟踪板”电子干扰机等设备。通信系统主要包括2套“击球”卫通数据链，2套“低球”卫星导航系统以及各种无线电通信设备。声呐系统主要包括MGK-345型舰壳声呐、“马尾”拖曳声呐、UDAV-1M鱼雷对抗系统等。该舰没有装备自动化着舰辅助系统，仅装备老式的“月亮”-3光学助降设备，飞行员需要在甲板着舰引导人员的语音指挥下，通过观察



/ 位于滑跃甲板下方的 SS-N-19“花岗岩”超音速反舰导弹发射井。



/ SA-N-9 防空导弹发射系统。

信号灯的颜色变化判断飞机的着舰姿态和实时位置，因此该舰舰载机行动受海上能见度的影响较大。着舰拦阻系统是由1套“斯维特兰娜-2”型拦阻索装置和1个飞机拦阻网组成。“斯维特兰娜-2”型拦阻索装置的4根钢索分别连接甲板下层的4台液压制动机，能够在3秒内

将30吨重的舰载机从240公里/小时的速度减速至零。由于该拦阻索装置年久失修，“库兹涅佐夫”号在叙利亚参加第一次实战时连续出现故障，先后损失2架舰载机。

1991年苏联解体，使得曾经前后拥有7艘航空母舰的红色舰队大部分彻底消失，唯独剩

下的“库兹涅佐夫”号被编入俄罗斯北方舰队，苦苦支撑着俄罗斯作为世界军事大国的颜面。2016年11月，“库兹涅佐夫”号航母编队不远万里，奔赴叙利亚进行了服役以来的第一次实战部署，但作战行动期间各种问题频发，表明苏联航母的设计思路已不能满足信息化战争的作战强度需求和多用途需求，特别是实战中暴露出的作战半径短、载弹量少、出动效率低等，使其仅能完成低强度的空中火力支援任务，对海、对空、对地进攻能力明显不足。美国《国家利益》杂志博主罗伯特法利曾评价说，“库兹涅佐夫”号航母虽然在舰艇吨位、载机数量、外形特征等方面与美国同类型航母差不多，但作战效果相差悬殊。

“库兹涅佐夫”号航母完成叙利亚作战任务后不久，就返回船坞维修，其后即进入灾难和事故频发期，先是遭遇浮船坞沉没，塔吊砸在飞行甲板上的重大事故，后又发生火灾，舰上约500平方米的面积被烧，事故导致2人死亡、14人受伤。尽管“库兹涅佐夫”号航母长期以来一直事故频出，但受俄罗斯综合国力、技术和资金等条件限制无法造出新的航母情况下，未来该航母仍将作为俄罗斯海军最大吨位的作战舰船继续服役。■

大爱无疆

——忆与郭汝瑰将军交往的二三事

□李北兰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从1997年10月23日郭汝瑰将军离世算起，迄今已有24年。尽管作为同时居住在小城北碕的黄埔二代，我与郭老有近10年的温馨交集，但不知是否记忆力减退的缘故，如今，我从脑海里打捞出来的，却几乎全是家长里短、寻常小事。不过仔细想想，这些细碎虽细虽碎，但从中却可以寻觅到郭老无疆的大爱，即爱国、爱党、爱人民……于是，我终于在停笔数年之后又拿起了“笔”，正所谓“家长里短无小事，一枝一叶总关情”！

—

与郭老相识，是上世纪80年代末，在重庆黄埔军校同学会北碕联络组的抗战胜利纪念会上，他作为前辈和“长官”莅临参加（他当时是黄埔军校同学会副会长及四川省黄埔军校同学会会长），我作为黄埔后代受邀参加，于是，便有了后面近10年的交集。

这次活动是“文革”后难得的一次全员聚会，又逢抗战胜

利纪念日，老兵们纷纷打开话匣子畅所欲言，既讲过去、也讲现在，既“忆苦”也“思甜”……印象深刻的是一位在某中学任教的远征军老兵，当他讲到他和同班战友过人迹罕至的野人山后减员一半的际遇时，竟忍不住大哭起来。

整个纪念会，郭老都安安静静地听着，从不打岔、也不指点，用“波澜不惊”来形容，还真是恰如其分。聚会结束时，郭老只言简意赅地谈了两点，即“向前看”和“向后看”：“向前看，即要看到改革开放之后，党和政府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故而珍惜当下、放眼未来……向后看，即把对民族复兴、祖国统一有用的经历记录或口述出来，让后人知史而图强……”

郭老如是说也如是做，堪称黄埔军人和黄埔后代的标杆和楷模！

尽管郭老曾历经坎坷，但在与他交往的那一段日子里，我却从没听到他口出怨言，反倒是认认真真、踏踏实实为党和人民做自己该做的事情、能做的事情，可以说是鞠躬尽瘁、竭尽心力。

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郭老耄耋之年在北碕完成了几部巨著，即《中国军事史》《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史》《郭汝瑰回忆录》和《郭汝瑰回忆录（续集）》……用他的话来说，就是“想给后人留下一点东西”。

除著书立说之外，他还“放眼未来”、亲力亲为——义务给重庆警备区干部教授英语，以提高军队素养；重庆警备区组织民兵演习，他不顾年事已高，亲自教民兵爬山。同时，他还在多种场合发表讲话、做专题报告，以期将红色基因传承下去。

1995年初秋，北碕图书馆举办“庆祝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报告会”，邀请郭老去给青少年们作一场相关报告。其时，他正在赶写《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史》，忙得不可开交，但他得到邀请后，仍毫不犹豫地表示：“要去，要去，再忙也要去！”

报告的当日，他提前半小时步行到达座无虚席的会场，用自己的亲身经历讲述了中国军民英勇杀敌、浴血奋战的抗战故事……整整三个半小时，88岁高龄的郭老激情澎湃、精神抖

撮、讲述生动、事例鲜活，听众无不动容，掌声此起彼伏。记得报告会结束时，有人问他：“假如现在有敌来犯，你会怎样？”忘龄的他竟豪气地回答：“我会请求再次上战场！”闻者莫不肃然起敬。之后，他还特地向图书馆赠送了234册自己多年收藏的图书，希望更多的青少年了解那段我们民族不能忘记的历史。

二

而对于有着黄埔“血缘”的老兵和后代，郭老更是关爱有加、悉心指导。

尽管他著书繁忙，但每次市、区黄埔军校同学会开会，除了生病和去外地公差之外，郭老是有请必到；而会议快结束时，他必说上几句点睛之语，或是“关注祖国统一”、或是“联络感情”、或是“表扬先进”、或是“展望前景”……话语虽少，但这“睛”就像一盏明灯，刹那间照亮大家的心。一位在大学任教的黄埔二代曾多次赞叹：“郭老有一种非凡的人格魅力，能把大家拧成一股绳，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

因受我父的黄埔同学、市黄埔军校同学会副会长梁明泉的委托，“常去郭老家拜访，看看能否为他写书提供帮助……”，加之郭老又认识我父亲的远房大伯李蔚如，故那些年，我常去郭



1997年9月16日，郭汝瑰将军90岁生日，重庆北碚的黄埔后代为其庆生。

老家打卡，对郭老的人格魅力和新疆大爱自然是感同身受、受益匪浅。

记得他在赶写《郭汝瑰回忆录》续集时，突发疾病被送往西南医院抢救。得知消息后，我和梁老等人一道去医院看望他。尽管住院期间，医院曾几次下病危通知书，当我们见到他时，他仍虚弱无力、满面病容，然而问候的话语尚未落地，他便说想要尽快出院：“……我的书还没写完呢！”没几天，他便如愿以偿从医院回家。本该好好休息的他却不顾自己尚未痊愈的病体，将时间和精力全部投入到撰写这本倾注自己心血的大书中：“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得抓紧时间……”未几，这本书得以出版。

郭老的“革命加拼命”深深地打动了，我为此反思：“我

这晚辈没有‘向后看’的经历，但我有‘笔’，是否也为郭老‘想给后人留下一点东西’的心愿出点小力？”

于是，我这个只会写家长里短、锅碗瓢盆等小文章的女人居然也拿起笔来写军人、写战争、写金戈铁马、写万里征程……“近水楼台先得月”，除了写郭老的《呕心沥血御强敌——记郭老在武汉会战中的一段往事》《永不衰老的爱国心》等四五篇文章之外，还采访了我所认识的抗战老兵，陆陆续续写了《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爬雪山、过草地及其它——滇西战干团生涯二三事》《我为抗战扛起枪——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六十九周年》《台湾来的东洋军刀》等多篇文章（多为老兵口述史）……而多少有些遗憾的是，

当我欲采访当年那位在抗战胜利纪念会上大哭的远征军老兵时，他已经驾鹤西去！

三

在日常生活中，郭老对我们这些后代的关爱则更是处处可见、时时能感——他送我陈立夫先生“乐善不倦”书法条幅的复印件，殷殷嘱咐：“陈立夫先生晚年竭力推动海峡两岸的交流、提出‘中国文化统一论’，值得肯定……”他赠我蒋纬国先生的戎装照片，谆谆教导：“我和纬国先生很可能看不到两岸统一的那一天了，希望在你们二三代身上……”至于那些年，我在他家“蹭”吃“蹭”喝“蹭”书看，则更是家常便饭。

不过，我却没想到他竟“爱屋及乌”——某日，我随他去市委有关部门开会，回来的路上，他竟提出去我家看看。想着他年老体弱，爬五层楼吃力，于是便竭力劝阻：“那么陡的楼梯，你爬不上去的！”并保证：“哪天下班后，我叫我家先生专程上门来看你。”但平时为人随和的郭老却坚持着一定要去，他的警卫员兼司机最了解他，当即帮腔道：“没关系，我扶他上去。”于是，我只好默认。但毕竟年岁不饶人，曾经金戈铁马的老将军，此刻爬楼竟也艰难如斯，可以说，他不是“爬”上楼的，而是



/ 1997年9月16日，郭汝瑰将军90岁生日，与黄埔后代李北兰合影。

被警卫员“拽”上楼的……我家先生怎么也没想到郭老会来家看他这个平头百姓，当即感动得不知说什么好。

为郭老的人格魅力所折服，原本就支持我与郭老、梁老等交往的先生从此更是上心，有时甚至帮我查阅资料、看稿子、出主意，为祖国统一工作出力献策。千禧年的后半叶，北碚黄埔老兵减员、老病增多，急需二代“接班”。尽管我家先生当时已身患沉疴，但他听说我欲去区黄埔办公室做义工，仍举双手赞成。我做义工期间，对他的照顾显然没有以前周到和细致，但他从无半句怨言：“郭老的‘心底无私天地宽’，值得我们学习一辈子甚至两辈子！”

这份义工工作，我一做就是5年，直到2013年先生的病情加重，我要陪他到上海治病，才把工作交给另一个热心肠的黄埔二代。

人生总是会有遗憾的，而我的最大遗憾就是没有亲临现场为骤然辞世的郭老送行。

1997年9月底，我要到澳大利亚悉尼探亲，临行前特地去郭老家告辞。郭老也没多说什么，一句“梁园虽好，不是久留之地”便把不尽之言道尽。然而没想到的是，我向他辞行还不到一个月，竟然天人永隔——10月23日晚，我正伏案写作，电话铃响起，接过话筒一听，竟是那位在大学任教的黄埔二代的越洋电话：“郭老今晨因车祸去世，享年90岁……”朋友言语间几度哽咽，我也不禁泪流满面。

回到电脑桌前，我连夜赶写了一篇纪念郭老的文章《永远的郭老》：这个“永远”既是对他“惊险曲折、丰富深刻”的过去时的追忆，也是向他“胸怀坦荡、爱国爱民”的现在时的致敬——老兵不死，只是凋零！

胡为真西昌寻父足迹

□ 林开伦

1950年3月26日晚，西南军政长官公署长官、国民党陆军上将、黄埔1期毕业生胡宗南从西昌小庙飞机场乘飞机离开大陆去台湾。近70年后，胡宗南之子胡为真为了寻找父亲生前足迹，前来大陆寻访胡宗南曾经的驻防之地，先后走访了西安、延安、汉中、成都等地。我有幸参与了他在西昌的行程。

为弘扬抗战精神，我曾先后采写过十多名抗战老兵的英雄事迹并得以见报。特别是经过10年努力，把1939年秋31集团军从抗战前线送来西昌的烈士眷属和伤残军人，在西昌设“31眷属筹备处”的来龙去脉整理报道后，在成都远征军后代浦寒老师的帮助支持下，集资在高草乡湛堡村龙王寺建起了“龙王寺抗战纪念碑”。2018年12月20日举行纪念碑揭幕仪式时，台湾黄埔四海同心会会长石齐（原31集团军13军军长、黄埔3期石觉之子）前来参加。次日座谈时，石齐告诉我，胡宗南之子胡为真要来西昌追寻其父的足迹。我知道当年胡宗南是从西昌小庙飞机场乘机离开大陆去台湾的，就告诉石齐，我家的位置就在小庙



胡为真（前排左五）夫妇一行与州台办人员在作者家门前合影。

飞机场边上，胡公子若来西昌看小庙飞机场，可以住在我家。石齐会长见我很是诚恳，返台湾后便告知胡为真。2019年3月12日，胡为真的随从郑期霖与宁波赵培英（汤恩伯儿媳之侄）通话。赵培英转告我，胡为真一行将于13日从台湾出发飞往南京。13日，郑期霖与我取得联系。

3月23日，胡为真下榻西昌邛海宾馆。午饭后，我接到凉山州台办侨联科科长从宾馆打来的电话：“胡为真先生一行已到西昌，住在邛海宾馆。下午行程安排是2点至4点走邛海湿地，4点至6点参观原小庙飞机场。”不到3点，又接到电话说胡为真

一行不走湿地了，要提前来小庙飞机场。我与尔布什哈（彝族，黄埔10期岭光电之子）马上赶到小庙路口等待。

大约4点钟，胡为真一行在省、州台办工作人员及西昌市侨联黄主席的陪同下，来到小庙飞机场原飞机跑道西面，早已等候在机场的尔布什哈和我上前与胡为真握手相见，真有一见如故的感觉。我说：“胡先生，我家离这儿不远，是不是顺便去我家看看？”他高兴地接受了我的邀请。我和尔布什哈在前面引导，几分钟后来到我家的。下车后，大家看到坝子上的宣传栏内有我与台湾国民党前主席洪秀柱的合影和报道文章，纷纷举起

手机拍照。

经过两个多月的等待，我终于见到从台湾来的胡为真，心情不免有些兴奋。我们在坝子上边走边谈，我忘记了看路，不小心一脚踩空，摔倒在坝子边的小沟里。几个人把我拉上来后，胡为真担心我摔伤，马上将随身携带的备用药给我涂上。我活动了一下，没有大碍。胡为真说：“好人一生平安。”他还是不放心，便用手挽着我的胳膊一路走到我家门口。我说大家有缘相会，不如在此合影留个纪念吧。胡为真极为赞成。于是，台办罗常科长举起相机为我们在大门前拍了照。

大家进到堂屋后，开始参观四壁悬挂的书法作品。我与胡为真进到我的小客厅。我把尔布什哈介绍给胡为真，说他曾是凉山奴隶社会博物馆馆长，其父岭光电是黄埔10期生，曾任国军第27军副军长，这个军职是胡宗南亲自任命的。胡为真听到是父亲委任的副军长之子，感到格外亲切，马上与尔布什哈来了一个热烈的拥抱。

叙谈半小时后，我们从屋内走出，胡为真看到堂屋门上挂的牌匾和木雕挂联，得知是黄埔18期学生、凉山黄埔军校同学会会长饶绪镇所赠，联想自己父亲是黄埔第1期学生，黄埔之情油然而生，招呼我们在堂屋门前



胡为真(左)与作者在作者家小客厅合影。



胡为真(右二)与作者(左二)、尔布什哈(右一)、郑期霖(左一)合影。

合了影。

由于行程安排时间较紧，胡为真不能久留，依依不舍地离开我家。我将他们送到停车坝子上，说好第二天(24日)上午9点半一同参观彝族奴隶社会博物馆。

24日早上，尔布什哈开车来接我，提前来到彝族奴隶社会博物馆。当时胡为真还未到，我们两人就先到博物馆办公室，与馆长邓海春一起等候。胡为真到后，一行人由讲解员引入展

厅参观，胡为真对馆内展出的实物和图片饶有兴趣，非常认真地听讲解员介绍。从展馆出来，胡为真又和尔布交流往事，共有的黄埔情缘让他们有说不完的话、道不完的情。当天，尔布把他在监狱当管教的儿子也带来了，他们父子与胡为真夫妇合了影。尔布的儿子身高1.8米，胡为真说他的儿子个子也高，下次再来西昌时，把儿子也带来。他还说下次再来，就不以公务身份，而以私人身份来，这样可多逗留几



穆文富(左二)与胡为真(左三)互赠礼品。



作者(左)与胡为真夫妇合影。

天。

就餐时，想起我曾将胡宗南之子要来西昌的消息告诉过穆文富（原州人大副主任，1950年前西昌靖边部彝务大队长）。他说胡宗南在西昌任西南长官公署长官时，曾去找过胡长官要枪、要钱。当时胡宗南虽没给枪和钱，但请他吃了饭，记忆非常深刻。胡为真一行午饭后要返成都，次日一早将飞台湾，时间很

紧。我赶紧联系穆文富。穆文富赶到后，我向胡为真讲了胡宗南曾经请穆文富吃饭的经历，于是两人亲切地交谈起来。穆文富向胡为真献上了一条洁白的哈达，胡为真也将带来的书赠送给穆文富。

与穆文富相比，黄埔22期生罗家修错过了这次相聚，有些遗憾。

罗家修是西康靖边部彝务

团团团长罗大英（西昌解放时率部起义，后任西昌专区副专员）之子，1950年前曾任靖边部尉级军官，虽是彝族，但懂得汉语。我参加黄埔军校同学会活动时，说起过胡宗南之子要来西昌的事。93岁的罗家修回忆说，胡宗南在1950年元月来西昌召开军事会议时，他被派去当彝语翻译。罗老说，如果有机会见胡宗南的儿子，是很高兴的事，并让我留下了他的手机号码，说胡公子来时，一定要通知他。

胡为真一行到达后，我一时没能打通罗老电话，便托尔布什哈通知他。当时，罗老已93岁高龄，又住在西昌郊区北山，从北山到泸山要转两次公交，胡为真又只在博物馆停留10多分钟，无论如何也赶不上了。罗老没能去彝族奴隶社会博物馆，为没有和胡为真见上一面而深感遗憾。

胡为真回台湾后，将他所著《国运与天涯》一书，邮寄到省台办转州台办，分赠尔布什哈和我各一本。他在书中提到了其父在大陆的最后一段时间是在西昌度过，面对当时局势和蒋介石的命令，思想和感情上的矛盾和纠结。这一切使胡为真对“西昌”二字有了深刻印象。读毕《国运与天涯》，我深受感动和启发，从而执笔记录胡为真访西昌追寻父亲足迹之经过。■

抗日战争与抗美援朝战争中的宋时轮

(下)

□ 蒲元

鏖战长津湖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9月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司令员陈毅来到由宋时轮担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第9兵团，指示“第9兵团开到江北继续练兵三个月，随时应付帝国主义挑衅，准备与‘天字第一号’的美国军队作战”。

一周后，第9兵团组织召开了“军事教育会议”，宋时轮重点分析了美军的战术基本特点：“战术思想上强调钢铁的作用，步兵战斗顽强性较弱；强调各兵种协同动作，认为单一兵种不能达成战斗任务；善于从困难的地形进行奇袭；提倡集结兵力积极进攻，防御能力差；步兵多采用疏散队形；部队在运动中与火力配合紧密；注重指挥位置的选择……”继而强调，“我们必须以作战对手的战术思想及装备为对象，来组织部队的军事教育训练，研究战法和对策，绝不可闭门造车。”

那么，应当采取怎样的对敌战法呢？宋时轮指出：“制海、制空权在对方手中，我们必须出奇制胜，战场选择要力争减



/ 醴陵八中的宋时轮半身像。

弱敌海军的作用；时间选择在夜间，减弱敌空军的作用；部队要求精干，利于机动；战术动作应割裂对手，各个歼灭；以运动战为主，阵地战为辅；正规战与游击战相结合，从敌侧后出击。”从志愿军后来的实战情况看，宋时轮在开战之前对美军作战特点的判断及我军的战法选择，都是很有见地的。

10月初，第9兵团所辖第20军、第26军、第27军开始向山东集结。兵团原先主要部署在江南地区，战士们所着冬衣

是按南方标准缝制。宋时轮曾在雁北战斗过，对北方的寒冬有过亲身感受，知道战士所着冬衣根本无法抵御北方的严寒，十分焦急。为此，他随先头部队一同北上，要求山东省委省政府帮助解决部队赴寒区作战的服装问题。这年秋，宋时轮还特地率领兵团一批军、师职干部到北京，向在解放战争中曾在东北战场转战的总政治部副主任萧华学习防冻经验。学习中，宋时轮一边记录、一边询问。

就在这期间，朝鲜战局迅

速恶化，美军大举越过“三八线”并疯狂进攻。10月19日，毛泽东下令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兵朝鲜，保家卫国。10月24日，毛泽东、周恩来在北京接见宋时轮。毛泽东开门见山地指出：“为何劳师远征把你的兵团调入朝鲜而不就近调动部队，这一点不用说你是清楚的，军委要用人所长，要用部队所长。解放战争你兵团练就了一身硬骨头，是善打阻击、勇战恶敌的部队之一，现在用你兵团目的就在于此……第9兵团的任务就是占领（长津湖）有利地区，割裂敌东西联系，以消灭美军两个团为主要目标，特别是以打美陆战第1师为主。”

10月28日，解放军总司令朱德赶赴兖州，慰问第9兵团官兵并做战前动员。然而就在同一天，中央军委又下达了新的指示，要求第9兵团速由泰安派一个军直奔朝鲜。鉴于战局变化，3天后，中央军委再次调整部署，命第9兵团3个军全部出发北上。随着第27军的率先开动，11月4日，宋时轮指挥第20军、第26军出发，风驰电掣驶向战场。次日，中央军委决定第9兵团立即入朝，担负江界、长津方向作战任务。第9兵团副司令员陶勇领导的后方指挥所，在沈阳火车站直接向路过的列车下达开进命令。

从10月初北上山东，到11



朱德(左)在第9兵团作抗美援朝动员报告时与宋时轮(右)合影。

月中下旬参战，第9兵团原定的“练兵三个月”根本没有实现。更糟糕的是，瞬息万变的战局导致部队任务不断调整，这给第9兵团的后勤保障带来巨大困难，也为他们后来的伤亡埋下了隐患。山东方面和华东军区负责解决的防寒装备都还没来得

及提供，第9兵团却已经到达东北。最后，在东北紧张而短暂停留的几天里，宋时轮才终于设法得到了一批冬装。东北军区副司令员贺晋年回忆：“时轮同志十分爽直，向我谈了由于行动匆忙，准备不足，部队冬衣严重缺乏的情况。我立即下令将军区仓

库中存放的原日军大衣、棉鞋悉数调给第9兵团使用。”但这批棉大衣只有5万件，与第9兵团15万人所需差距甚大，其中还有一部分虽领出了仓库却尚未发放，部队已于11月7日跨入朝鲜境内。

与同时期入朝的其他志愿军部队一样，宋时轮率领的第9兵团，炮兵、工程兵、装甲兵、陆军航空兵等兵种都不健全，甚至有些根本没有。第9兵团幸存者后来深有感触地回忆：“我们与其说是陆军，不如说是步兵更准确些。就是这样一支还在使用解放战争时的武器，后勤保障全靠人力搬运，以炒面、土豆和雪为主要食物的部队，所面对的却是全机械化装备、陆海空三军联合立体作战的‘联合国军’第10军。该军下辖美陆战第1师，步兵第7师、第3师，此外还配属了南朝鲜第1军团，总兵力达10万之众。为了配合地面部队，美国空军发动了‘空袭战役’，平均每天出动各种飞机达1000余架次，共投弹4万多吨，而此时的朝鲜上空连一架志愿军的飞机都没有。”

在这种情况下，宋时轮认为，要想达到重创东线美军的战役目的，就必须要做到隐蔽企图、出其不意。兵团根据友邻部队的经验和敌人空袭的特点，制定了详细周密的保密制度和伪

装措施。从11月7日开始，部队夜行昼宿，21日，兵团15万人全部秘密抵达指定集结位置，而美军每天在中朝边境上空侦察的飞机对此毫无察觉。第9兵团秘密集结的这一行动，被美国舆论界叹为“当代战争史上的奇迹之一”。

入朝前两日，毛泽东曾致电提醒彭德怀、邓华、宋时轮、陶勇，如果东线打得不好或不及时，美军将从东面威胁志愿军西线部队，西线志愿军完全可能处于敌东西两线部队的合围之中，造成在全局上的不利态势。出其不意地进入预定位置只是第一步，怎样实现歼敌并保障西线友军安全的战略目的是重中之重。经过深入研究，宋时轮决定采取诱敌深入、各个歼灭的策略。

具体部署是：第27军担任长津湖两侧正面进攻，以一个师攻击柳潭里美陆战第1师主力，以一个师包围新兴里、内洞峙美第7师一部，另两个师分别作为机动部队和预备队；第20军担任从侧后攻击美军的任务，所属4个师分别向下碣隅里、死鹰岭、黄草岭、古土里、社仓里等地的美陆战第1师及陆军第3师一部实施攻击；第26军担任兵团预备队。宋时轮在部署中，注重攻、防、阻、堵、歼、迂回、包围等作战样式同时使用，



在朝鲜前线的宋时轮。

意图初战即打乱敌军阵脚，使其首尾不能相顾。

1950年11月27日16时，宋时轮下达总攻命令，呼啸的北风中响起了嘹亮的军号声，一场激烈的厮杀在朝鲜半岛东北部盖马高原上的长津湖地区展开。次日清晨，第27军和第20军完成了对长津湖地区柳潭里、下碣隅里、新兴里等地美军的分割包围，被围者包括美第10军的1个师部、4个团、1个坦克营和3个炮兵营，共约1万余人。突遭袭击的美军并不甘于被歼，在航空兵、坦克和炮兵的优势火力支援下，对第9兵团发起猛烈反击。最后，敌之反扑虽然大部被瓦解，但在激烈攻防和严寒天气下，志愿军也遭受严重损失。仅一个晚上，担任主攻的第27

军第80师减员三分之一，第79师减员近一半，主力部队的主力师仅10余小时折损近半。不到两天时间，第20军第80师全师万余人损失了6000多！

2018年，笔者作为关爱老兵志愿者结识了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的栾绍本老兵。抗美援朝战争期间，栾绍本任第9兵团第27军第79师政治部警卫通信班长，亲历了惨烈的长津湖柳潭里战斗。栾绍本回忆：“战斗异常激烈，全师伤亡人数不断攀升，师部直属人员全部补充到一线。我临危受命担任排长增援第235团，奉命抢占一个小山包。由于进行了详细的地形勘察，加之守军疏于防备，我们只一个冲锋就抢占了山包。然而，全排官兵立足未稳，美军的炮火就打了过来，这种反击速度和炮火覆盖密集度，是我在孟良崮、济南、淮海等战役中从来没有遇到过的，顿时有十几人伤亡，火炮声刚停，美军的反攻就开始了……战斗结束后，全排连我在内仅剩7个人。而我们79师，则因伤亡巨大缩编为7个连。”虽已时隔多年，老兵回首那一刻，仍是沉默良久。

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在血火中不断进步，古今中外的军队莫不如此，中国的军人们也不例外。经过数天接触，宋时轮发现，美军的兵力和火力均远超



作者蒲元（中）带领学生拜访栾绍本（左）。

之前的判断，他果断修正作战计划，首先集中绝对优势兵力歼灭新兴里之敌，再转移兵力诸次歼灭柳潭里、下碣隅里之敌。11月30日晚，新兴里战斗开始，至12月2日凌晨，第27军以两个师部5个主力团的兵力全歼新兴里美第7师第31团级战斗队3191人，击毙团指挥官麦克里安上校和继任者费斯上校。第31团历史悠久、战功显赫，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该团成功攻入俄国西伯利亚，被时任美国总统威尔逊授予“北极熊团”荣誉称号，并亲自授予“北极熊旗”。

这一重大胜利，既有赖于参战将士三军用命，也是宋时轮深思熟虑指挥有方的结果。最初，宋时轮的作战重心并不在新兴里，但随着战局的演进，他将目光逐渐聚焦在新兴里。他认为：

“毛泽东打仗的原则中有一条是先弱后强，陆战第1师是美军中的强中之强，对比第7师则弱。”先打较弱之敌，便于部队深入了解美军特点，得手后还能够动摇敌军的防守意志。宋时轮没有想到，他的这一决策，创造了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以劣势装备全歼现代化美军一个加强团的模范战例，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有史以来唯一一次歼灭成建制美军一个加强团。由于物资缺乏，被志愿军缴获的第31团“北极熊”团旗，曾被战士用来当包袱皮，还做过蒸笼布，最终被发现上交，如今保存在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内，列为国家一级文物。

美军在长津湖地区的遭遇，震惊了美国朝野，参谋长联席会议罕见地对其朝鲜前线的作战

指挥进行了直接干预。第31团级战斗队被歼后，美第10军全线动摇，第10军军长阿尔蒙德命令实施总退却。而第9兵团也在调整部署，以围追堵截的战术全力以赴围歼长津湖地区的美军部队。在志愿军的猛烈进攻下，美军付出重大代价，至12月15日战役结束，共有1.3万多美军被歼。在撤退过程中，美军王牌部队，曾在二战太平洋战场登陆作战中屡次担负开路任务，令日军闻风丧胆的陆战第1师，甚至喊出了“陆战队，向南进攻”的口号，用以振作失落的官兵士气。根据其官方战史披露，仅在11月27日至12月15日，该师即减员达7321人。长津湖之战也被美国人称为“陆战队历史上最艰辛的磨难”。后来，美国军方为长津湖作战颁发了17枚荣誉勋章、70枚海军十字勋章，是其战史上为单次作战行动颁发勋章最多的一次，可见长津湖为美军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志愿军第9兵团的长津湖之战，是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进行的。除了武器装备远逊于敌外，战役期间，战区连降大雪，平均气温在零下27度左右，最低达零下30多度。严寒导致70%的迫击炮无法使用，很多步枪机枪的枪栓被冻得无法拉开。战士们衣着单薄，粮弹缺乏，加上后勤补给困难，有的部队一两天



/ 抗美援朝第二次战役作战经过要图(东线为长津湖战役)。

只能吃上一顿结冰的高粱米，因冻伤亡的减员严重。在新兴里战斗中，第27军第80师第240团5连冲锋时受到敌火力压制，全连呈战斗队形卧倒在雪地，最后全部冻死。据统计，全兵团战斗减员1.9万人，非战斗减员近2.9万人（主要为受冻伤亡），减员总数占兵团总数的32.1%。历史学者李峰在其著作《决战朝鲜》中这样评价道：“太难为宋时轮，太难为战士们……”

就在这种作战条件下，第9兵团将士们以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战斗精神艰苦奋斗10余日，予美军以沉重打击，圆满完成了中央军委赋予的打开东线局面，

保障西线友军侧后并歼敌一部的任务。长津湖之战从此永远镌刻在中国人民军队的光辉战史中。

1951年1月至2月，在兵团高级干部会议及向志愿军党委和中央军委上报的总结报告中，宋时轮深刻总结了战役经验教训，特别是对于第26军没有及时南调增援的问题，主动承担了领导责任。

转战三千里

长津湖战役后，宋时轮率第9兵团在朝鲜元山、咸兴一带休整。不久，兵团第26军参加了第四次战役。其余部队休

整结束后负责东海岸防御。1951年4月6日，彭德怀主持召开志愿军党委扩大会议，决定发起第五次战役。

这次战役，宋时轮除指挥第9兵团外，还一并指挥第39军、第40军和配属的部分炮兵部队。战役第二阶段，根据志愿军总部首先消灭南朝鲜军队的作战计划，宋时轮周密部署，指挥志愿军第9兵团、第12军、朝鲜人民军第5军团等部，歼灭了南朝鲜第3师、第9师大部及美军2个营和法国营大部。

5月20日，宋时轮、王近山（第3兵团副司令员）、陶勇等致电志愿军总部：“据当面情况，美军已东调，伪军溃散后缩，特别是我部队粮食将尽，个别单位已开始饿饭。因此，我们认为，如整个战线不继续发动大攻势，而只东边一隅作战，再歼敌一部有生力量，我们亦必须付相当代价，但不能搅出一个大结局，则不如就此收兵，调整部署，进行整理，准备以后再斗。”彭德怀非常赞同，表示完全同意并电示中央军委，毛泽东复电指出：“收兵休整，准备再战，这个处置是正确的。”

但是，“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打探到志愿军进攻能力只能维持7至10天，便于5月20日乘志愿军和人民军向北转移之际，集中14个师又1个旅和2

个团的兵力，以摩托化步兵、坦克、炮兵组成“特遣队”，在大批空军、远程炮兵和空降兵配合下，寻找志愿军和人民军防线的空隙，多路突击，快速推进，对转移部队实施猛烈反扑。这让志愿军和人民军原本胜利回师的主动行动，顿时陷入十分被动的局面。

为指导部队最大限度脱离险境，宋时轮及时向所属各军提出具体要求。例如：严守移动意图秘密；派出小部队积极向敌佯动；后尾部队有组织掩护；加强侦察警戒；渡昭阳江及北汉江时，必须有负责干部专门指挥等。5月27日，志愿军司令部通报宋时轮：敌坦克60余辆、汽车100余辆，由华川向山阳里进犯，长驱直入，金化、金城即将失守，东线志愿军和人民军及医院伤员、兵站均无法转移，将影响全局。为阻止敌军行动，宋时轮等指挥各军当天全部进入阵地，其中第20军在阻击作战中主动出击，创造了3小时内击毁敌人18辆坦克的战绩。在昭阳江南北地区的阻击作战中，第27军沉着应战，顾全大局，灵活机动，交替掩护，英勇抗击敌之疯狂进攻，将敌军牢牢钳阻于昭阳江以南地区，为第9兵团主力转移和伤员转运赢得了宝贵时间。

不久，第9兵团又接到志

愿军总部电，要求第20军、第26军在华川、水上里、金城地区坚持阻敌作战20天至1个月。宋时轮立即做出安排，并要求各军务必根据实际地形周密研究部署。11月30日，宋时轮复电彭德怀：“即切实遵照执行，请勿念。”来犯之敌中有美第7师主力，这是两军在长津湖之后的又一次较量。第20军第58师在极度疲劳、粮弹缺乏的情况下，同敌人反复争夺阵地，迫使美军在7天时间里只前进了4公里。

志愿军总部在综合第五次战役各部队情况时认为：“第9兵团此次作战穿插成功，转移时阻击任务完成得也很好。”6月15日，志愿军总部再次指出：“（第五次战役中）许多部队如第20军第58师、第27军第81师、第60军第181师等部，在敌人疯狂冒进之下，表现了镇定、机动、顽强的优良品质，虽然部队饥饿疲惫，仍能主动组织力量，回头进行阻击作战，阻滞敌人前进，稳定了当时的战局。”7月，因任务调整，彭德怀拟将第9兵团的部分防务交由第20兵团负责。为此，毛泽东专门电示指出：“第20兵团替换第9兵团一个军或两个军的部署甚好，但第9兵团主力仍然作9月战役的第二线兵力，不宜远调。”9月，先期参加抗美援朝的志愿军部队开始轮换回国，本在轮换之

列的第9兵团却临时被指派担负朝鲜东海岸防御，聂荣臻在向毛泽东报告时指出：“第9兵团虽然比较疲劳，本应抽调回东北整训，但因该兵团对元山、咸兴地区地形较为熟悉，在作战经验上比第3兵团多一些，所以将该兵团放在东线担负防御，可以减少顾虑。”不难看出，从中央军委到志愿军总部，各级对于第9兵团的作战能力，都非常认可。

也就在这一阶段，经彭德怀提议，中央军委任命宋时轮为志愿军第三副司令员，仍兼第9兵团司令员、政治委员。1951年9月起，宋时轮又兼任了东海岸防御司令部司令员。在任期间，他还组织编写了《步炮兵协同作战的基本原则》《防御作战的战术原则》两本材料，为部队提高协同作战能力发挥了积极作用。

1952年初，宋时轮离开第9兵团，到志愿军总部协助彭德怀工作。根据彭德怀的指示，他和陈赓主持志愿军对美军攻、防作战的战术经验总结工作。工作期间，他们抽调志愿军司令部和作战部队的参谋人员，编写了《朝鲜战场对美军作战的几个战术问题》教材，内容包括朝鲜战场概况、敌我编制装备比较、历次战役敌我力量变化、朝鲜作战经过概述、对敌人战术的研究、进攻战（运动战）实施要点、防



/ 萧克为《宋时轮纪念文集》题词。

御战组织原则、炮兵战术与步炮协同、通讯联络、对空问题、反战车与扫雷、后勤保证等。7月，这本40余万字的作战指挥和军事训练的重要参阅教材下发到志愿军师以上机关，对志愿军初、中级指挥员全面学习入朝作战以来的成功经验起到了重要作用。

1952年4月7日，彭德怀回国，志愿军的全面工作由陈赓主持。宋时轮积极协助陈赓，负责作战、教育训练和特种兵工作，参与了反“绞杀战”、挤占阵地活动等的指挥。6月中旬，陈赓奉命回国，志愿军的全面工作由邓华主持。敌人为摆脱被动局面，开始对志愿军挤占阵地活动开展报复行动，以配合谈判向中

朝方面施压。为此，志愿军第一线各部队与人民军一起展开了反击作战，共毙伤俘敌2万余人。宋时轮协助邓华指挥的这次反击作战，不仅粉碎了敌人的进攻，守住了阵地，而且大量歼灭敌军有生力量，并首次创造了志愿军依托坑道进行坚守作战的经验（坑道战术雏形）。

7月11日，中央军委命令：免去宋时轮志愿军第三副司令员、第9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职务，调任中央军委总高级步兵学校校长。8月下旬，宋时轮离开战斗了1年又10个月、为之耗费了无数心力的朝鲜。在中朝边境，宋时轮回望这片战斗过的土地，面向长津湖方向深深地三鞠躬，和长眠于此的战友们告别，起身时，已是泪满衣襟。

临行前，金日成授予宋时轮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一级国旗勋章、一级自由独立勋章。

离开朝鲜的宋时轮，先后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高级步兵学校校长，军事科学院第一副院长、院长，国防委员会委员，中央军委委员，中央军委教育训练委员会主任，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常务委员等职务。1955年，这位黄埔毕业生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军衔。1991年9月17日，宋时轮在上海病逝，走完了他为中华民族出生入死、无私奉献的一生。

《黄埔校歌》词作者的创作心路与人生路

□ 陈宇

黄埔军校建校初期，是一个将星璀璨的年代，也是一个文化达人辈出的时期。茅盾、郭沫若、成仿吾等著名文人都曾在黄埔军校做过教官，大文豪鲁迅在黄埔军校做过“革命时代的文学”的演讲，被誉为我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女兵作家的谢冰莹是黄埔6期毕业生。传唱近一个世纪的《黄埔校歌》词作者、军校政治教官陈祖康，在当时即是一位才华横溢的文艺青年，其亢奋的创作心路和曲折的人生之路耐人寻味，同时值得人们深思。

开学典礼“唱校歌”现场的心灵触动

1926年11月15日，广州黄埔军校大操场上，第5期学生举行升学（开学）典礼。大会上除了几位显赫的党政军领导人致训词外，军校还特别安排了几位深受学生爱戴的教官演说，其中就有少校政治教官陈祖康，他在典礼大会上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半年前，陈祖康刚应军校政治部副主任熊雄的邀请，到黄埔军校任教，主讲帝国主义课程。



陈祖康。

陈祖康在两年前获得法国乌灵大学（有说马赛大学）理科硕士学位，后又毕业于法国西方工学院力学系获土木工程师证书，并被聘为该院的助理教授。这位典型的“理科男”还擅长写诗。他的演说令青年学生们激情澎湃、热血沸腾。他讲道：“同志们：你们来了！六个月的兵营生活，已经锻炼了你们的精神，增益了你们的健康，校门的旗帜含笑着看你们进来受革命的训练。”“你们不仅是自身去革命，还要引导民众去革命。这个引导的责任将使你们越显其伟大。但是这伟大的精神须于训练时期预备充足。要不然，将来你

们无论做了营长、团长、主任、党代表，尽是可羞的头衔。”“你们须完成以前同学的事业，你们的使命是何等雄伟！”

陈祖康，字绍文，号宜安，福建漳平菁城人。1901年出生于一个殷富的书香世家。1916年入龙岩九中读书，1919年秋由陈炯明推荐赴法国朗得城乌灵大学工学院勤工俭学，同时在巴黎西郊圣日耳曼公学补习法语。这时，熊雄也在法国勤工俭学，与陈祖康同校补习法语时相互认识。1923年，熊雄介绍陈祖康加入中国少年共产党（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1924年6月，由周恩来推荐转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

1925年9月，熊雄回国到黄埔军校任政治大队副队长，在第二次东征中任东征军指挥部政治部秘书长，协助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工作。后来，经周恩来推荐，熊雄调任黄埔军校政治部副主任，主持政治部工作。熊雄多次联系还在法国巴黎西方工学院任教的陈祖康，邀请他回国参加国民革命。陈祖康遂辞去教职，于1926年春离法回国，到黄埔军校任教。陈祖康的激

情和多才多艺，让他很快在军校名声大振，所以在第5期开学典礼上被推荐作为“本校长官”之一“致训词”作演说。

第5期开学典礼大会程序共有18项内容，陈祖康的演说在第9项，此后还有“来宾演说”“学生演说”“主席答词”等，第13项内容是“唱校歌”。大会是上午11时开始，在结束了各位嘉宾讲话、训词、演说、答词等各种项目后，大会接近尾声，时间已近下午2时，有学生已经在吃装在衣袋里的饭团，这是军校事先通知让各学生队携带的午饭。因此，在这个时间段唱歌，学生们的体力和精神显然都不如平时状态。

当时的黄埔军校校歌，是1924年由时任军校政治部主任戴季陶作词的“莘莘学子，亲爱精诚，三民主义，是我革命先声”。后面还有三段歌词：“革命英雄，国民先锋，再接再厉，继续先烈成功。同学同道，乐遵教道，始终生死，毋忘今日本校。以血洒花，以校作家，卧薪尝胆，努力建设中华。”歌词中的“乐遵教道”后改为“以学以教”。四段歌词长达72字，很多同学记不住歌词，还常常唱串了段落。加之歌谱是2/4拍，唱起来慢悠悠的，没有军队的行进气势，韵律不流畅，唱起来词也不合曲调。虽然校长蒋介石

平等的；反自然之；他現在；他人（別）；大要之；自然要；自由；之犧牲；行上會表；階級性；專以；仰；百世瞻；山爲目的；熱中去；五日；陸祖康；生活，已；康，校門；命不僅是；革命是變；命是要求；命是要求；你們以破；志們的力量。

你們以前曾做過，已看做了才少，這，對，倒孫吳，擴張革命勢力至長江流域。却是幽燕未，搗，關東猖狂，帝國主義依舊虎視眈眈。這些革

了兵的編制，未聞，現在，種當取新的，兵器同時，又兵器，結果，將，於破壞。歐，一軍艦，這，前途是很有，但是兵，一是物質的，因爲巧妙，來，也須有，飛感，她的，能修理，就，的問題，就，的一個條件，分的理解，現在我，還沒有解決，我們應該其，各種科學之，近地，考究。

革命先聲

黃埔是陶，是革命武裝

一九二六，十一，十二于海關樓

《黄埔日刊》上戴季陶作词的黄埔校歌。

石几次在全校大会上带头唱，但军校教官和学生普遍不喜欢唱这首难以上口的校歌。因此，此校歌在校内和社会上都难以广泛流传。这天的典礼大会，在师生们比往常吃午饭已经晚了两个多小时、少气无力的情况下再唱这“催眠”歌曲，现场的低沉状况可想而知。

“唱校歌”这个环节，显然成了整个大会的“低音符”，与大会始终高昂的气氛形成明显反差。作为负责军校政治工作的主官，熊雄耳闻目睹了眼前的一幕，他一方面为军校师生们的高涨激情而兴奋，也为军校缺少一首好的校歌而感到遗憾，特别是在举行全校集会和大型活动时，没有好的校歌很难调动起青年学生们的情绪。于是，熊雄有了重新创作《校歌》的想法

和决心，包括陈祖康在内的军校师生也都有这个想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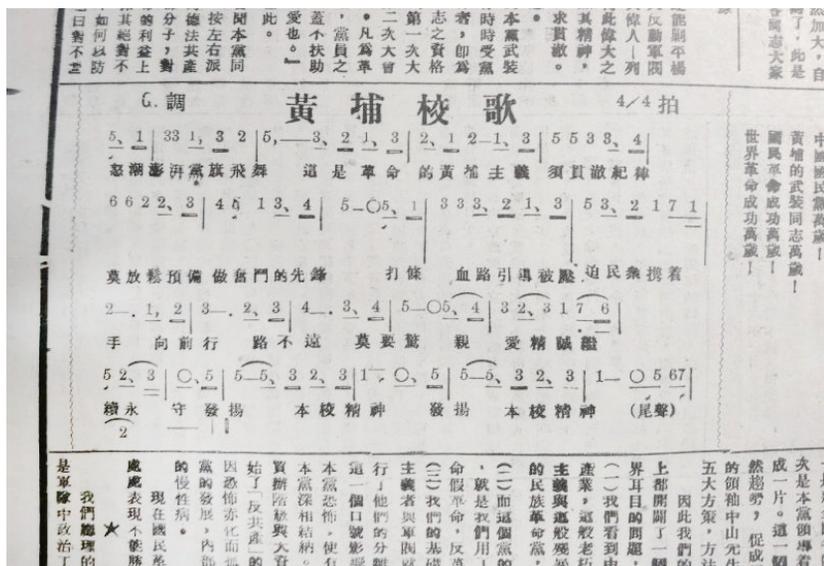
《黄埔校歌》歌词由文章“关键词”到入歌

第5期学生开学典礼的同一天，军校主要出版物《黄埔日刊》出版了专刊《本校第五期开学纪念号》（总第190号，1926年11月15日）。仅有的四页版面，报头、通令、通知、口号等占了约一页半多，剩下的不足两页半共登载了教育长方鼎英、训练部主任吴思豫、政治教官萧楚女、成仿吾和陈祖康5个人的文章。其中竟然刊登了陈祖康的两篇长文，占了大半页，从第三版转至第四版，除了典礼大会上的发言稿《告第五期同志》，还有他近日所写《革命的教育与教育的革命》，文末标明11月写作

于黄埔岛上的海关楼。同一天的《黄埔日刊》登载同一个作者的两篇文章，这还是极其少见的。

在《革命的教育与教育的革命》一文中，陈祖康写道：“黄埔是国民革命的中心点，因为黄埔是陶铸革命人才的大火炉，是革命武装势力的大本营。所以黄埔的教育，根本是革命的教育。”他详细阐述了“以革命教育的精神，不断的来做教育的革命，而教育革命越显出革命教育的精神”的道理。还特别阐述了“军政并重”的教育方针，强调指出：“军事与政治是不能分开的，军事行动与政治工作便是革命的全部势力。”这也正是军校倡导的教育指导思想，无疑深刻影响着黄埔精神“爱国革命”内涵的形成。

陈祖康在文章中身临其境地讲述了青年们考入黄埔军校前后的心境：“青年遂彷徨道侧，大有茫茫何之之慨，加以饥寒交迫，而憎恶现社会之心遂日甚一日。突然革命的旗帜飘扬天际，他们就如怒潮的汹涌到黄埔来。这整千整万的青年来历大半如此，当然，除此之外还有别样的分子：或是抱升官发财的思想而来者，或是因浪荡放纵为旧社会所不能容而来者，或是专凭情感受友人的鼓吹而来者。但总说一句，无论他们的怀抱如何，他们到了黄埔，便入了革命之



《黄埔日刊》上陈祖康作词的黄埔校歌。

门。”

看到陈祖康本文中的“革命的旗帜飘扬”“怒潮的汹涌到黄埔来”字句，熟悉《黄埔校歌》的黄埔同学乃至今日熟悉黄埔历史的人，都肯定会情不自禁地哼唱起：“怒潮澎湃，党旗飞舞，这是革命的黄埔……”

这首由陈祖康作词的校歌，首发在1927年1月19日《黄埔日刊》上，这是军校2.0版新“校歌”。1926年11月15日《黄埔日刊》上，也就是之前所提的刊登陈祖康那两篇文章的同一个版面上，还登载了由戴季陶作词的“莘莘学子，亲爱精诚，三民主义是我革命先声”的《校歌》(全称《陆军军官学校校歌》，简称《校歌》)。两首不同的“校歌”都登载在《黄埔日刊》第三版中间位置，时间仅相隔65天。

这肯定不仅是巧合，也就是说，陈祖康的《黄埔校歌》歌词即是在这段时间内创作完成的。

可以想象11月15日的场景，当陈祖康双手拿着报纸欣喜地看着自己的两篇文章时，同时也看到了戴季陶作词的《校歌》。他亲临了典礼大会现场，那“唱校歌”的场景深深刺痛了他的内心，脑海中顿时涌满了创作新“校歌”的冲动。他知道，前几期学生都反映不喜欢这《校歌》的歌词和曲调，所以此《校歌》也难以在军校流行。

创作新《校歌》的时机在日渐成熟。第5期学生开学典礼大会召开一个月后的12月14日，军校任命政治部副主任熊雄为军校代政治部主任，全面主持本校政治教育工作。这时，前线北伐军捷报频传，全校师生情

绪高涨，熊雄特别邀请老朋友陈祖康创作新的校歌。

陈祖康受书香门第的家庭影响，从小爱好文学，曾受业于名师陈步韩和刘岑仲，打下深厚的国文基础。他很快写出了这首脍炙人口的军歌，最后定稿的《黄埔校歌》歌词是：“怒潮澎湃，党旗飞舞，这是革命的黄埔！主义须贯彻，纪律莫放松，预备做奋斗的先锋！打条血路，引导被压迫民众。携着手，向前行；路不远，莫要惊。亲爱精诚，继续永守，发扬本校精神，发扬本校精神。”

《黄埔校歌》的问世和传世

有文章说，陈祖康萌发“怒潮”“党旗”“革命黄埔”几个关键词的灵感，来自他接受熊雄的工作任务后，接连几天冥思苦想，写了多稿却始终不满意。有一天早晨，他信步江边，望着眼前奔腾而过的珠江，犹如革命洪流滚滚向前，一发不可阻挡。回过头来，军校的练兵场上红旗招展，与刀枪交相辉映，军号声和喊杀声此起彼伏。看到这一派生机勃勃的革命气氛，陈祖康不禁思潮汹涌，豪气顿生，回到宿舍后，挥笔写下了这段歌词。这种说法，显然是没有看到陈祖康1926年11月15日发表在《黄埔日刊》上的那篇文章。

对《黄埔校歌》有重大思

想影响的应该还有与陈祖康同日、同台演讲的军校政治教官萧楚女，他的发言题目是《做黄埔学生所要的根本素质》。他依据马克思生产力的观点，从生产工具讲到经济关系、社会形态变革。会上，萧楚女高声宣讲：“溯金沙江、怒江而上，循哈喇昆仑而发见江河南北，分流之源，则人类社会所以演成今日之一幕者，一生活上所用的工具之变化为其关键而已。因工具变而生产出来的物品生产量亦变。因工具之性质变而技术之程度亦变，而分配生产品质方法——即社会上一切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亦变；人类共同生活的范围亦变。这就是‘社会’的定性分析。”这个发言稿也登载在那一天的《黄埔日刊》上。

与陈祖康同日、同台演讲的还有军校兵器处代处长成仿吾，他的发言题目是《兵器的进步与我们》。他从兵器史的角度展望世界军事，极有远见地预测：“现在军队的编制与从前变异，而且新的兵种当取代新的编制，所以将来的军队的组织必定与兵器同时变迁。”成仿吾的发言，从世界科学的角度为陈祖康的创作展现了另外一个新的思维角度。

1926年下半年的《黄埔日刊》，几乎每期都有《本校本周口号》，其中登载最多的就

是“发扬黄埔精神，严守学校纪律”等口号。陈祖康作词的《黄埔校歌》无疑也从本报中吸取了高昂的精神和词语精华。

陈祖康的歌词创作完成后，熊雄很满意，立即把它交付本校音乐教官林庆梧少校谱曲，林教官也很快高质量地完成了这一历史使命。林庆梧毕业于广东大学音乐系，与陈祖康同岁。1927年1月19日，《黄埔日刊》刊登了这首《黄埔校歌》。歌词76个字，不分段，一气呵成，朗朗上口，意境高远；歌谱4/4拍，雄壮激昂而铿锵有力，适合于队列行进中高歌，很有气势，“前奏一响就振奋人心”。

新校歌充满着革命的激情，很快在军校内外传唱开来。半年后校庆时，在校园内树立了刻有《黄埔校歌》的石碑，并署名词曲作者。新校歌激励着黄埔军校的将士们在北伐和抗日战争中抛头颅、洒热血。

主持黄埔军校政治部工作的熊雄，参与和指导了《黄埔校歌》的创作，功不可没。当时他是中国共产党在军校的主要负责人，还是中共广东区委军委的负责人。为此，当时就有人别样理解《黄埔校歌》中的“党旗飞舞”，是中共党员熊雄、陈祖康共同有意为之，建议把有政治歧义的“党旗”二字改为“军旗”“国旗”“红旗”等，熊雄

19日的《黄埔日刊》上登载了陈祖康作词的《黄埔校歌》，而他对创作的校歌歌词被采用并不知情)，陈祖康在创作校歌歌词后不久离粤赴闽参加北伐战争，时间大约在1926年12月底。1927年春，有军校学生自黄埔来见陈祖康，告诉他黄埔军校有了新校歌，并唱了原词，这时他才知道他创作的那首歌词已被采用。

陈祖康作词的《黄埔校歌》一直沿用了下来，传唱至今。今日不仅仍是台湾黄埔官校的校歌，还是广州市第六中学（黄埔军校纪念中学）的校歌，许多企业在团建活动中也将此歌作为激励团队士气的必唱歌曲。

陈祖康的曲折人生路

1927年1月，陈祖康到北伐军中任总司令部交际处外交参赞官、北伐东路军总指挥部高级参议、独立第4师总参议兼漳州警备司令部参谋长。后来，他到闽南从事军事活动，参

加了国民革命军东路军政治部的工作，先后任东路军政治部宣传科长、福建陆军干部学校政治教官。8月中旬，当选为中共闽南特委宣传委员兼军事委员、福建临委委员。9月，回闽西传达“八七”会议精神。10月，任中共闽西特派员。12月4日，当选为中共福建临时省委执行委员。

1928年初，陈祖康以教书为掩护，活动于龙溪程溪的南坑一带，曾组织农民进城请愿以减交鸦片捐，赢得群众的好感。2月10日，当选为中共福建临时省委常委，分管组织和漳州党务工作。本月还当选为中共闽南临委常委兼省临委组织部部长。4月，中共福建临委书记罗明去莫斯科参加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指定陈祖康代理临委书记，这是陈祖康在中共党组织内的最高职务，时年仅27岁。

4月下旬，驻漳州国民革命军独立第4师师长张贞，派黄澄渊和郑墨西劝说陈祖康与其

合作。在多方影响下，陈祖康的革命意志开始动摇，投靠国民党张贞部任上校参议。6月16日，陈祖康以子侃署名在《漳州日报》上发表《中国革命的前途》一文，公开声明脱离共产党，宣布正式加入国民党。6月24日，中共福建临时省委决定开除陈祖康的党籍，并对他所写的《中国革命的前途》一文进行批判。8月，中共中央派郑超麟为巡视员到福建整顿省委党组织。陈祖康得知郑超麟到达厦门，派人跟踪，伺机捉拿未遂。这年冬，陈祖康与陈卓凡一起到上海找谭平山介绍他们加入中华革命党（即“第三党”），并被委任为闽南地区中华革命党党务筹备员，在漳州、厦门一带发展“第三党”组织。

1929年8月8日，红四军解放漳平城。12日，群众到陈祖康家杀猪出谷，放火烧毁其房屋。8月19日，红四军挺进闽中，陈祖康即以国民党“岩平宁剿抚特派员”身份与张贞派来



的张汝勤旅乘虚进占漳平县城。他推荐心腹陈应标为漳平县县长，并让其进行疯狂报复，捕杀革命人士陈福庆、苏振源、苏金等。此后，陈祖康与共产党分道扬镳，越走越远。

1930年秋，陈祖康到上海向“第三党”的邓演达汇报工作后，10月回漳州创办《回风报》。1932年6月，报刊因资金不济而停刊。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第三党”的抗日要求和行动得不到蒋介石政府的支持，与蒋介石的矛盾日益激化。1931年冬，陈祖康参与“第三党”在漳州筹办《漳州日报》，因受第19路军影响，宣传反蒋抗日。

1933年11月20日，李济深、蔡廷锴等人以第19路军为主力，在福州发动抗日反蒋事变，史称福建事变，建立了反蒋政权，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12月13日，陈祖康被委任为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漳浦县县长。

1934年1月，蒋介石国民党军闽南自治军司令胡捷进攻漳浦时，陈祖康率部与之酣战，后得第19路军驰援，反守为攻。陈祖康将胡捷枭首示众。1月15日，蒋介石的军队攻陷福州。1月21日，福建事变失败，陈祖康避居长沙。几经打击，此时的陈祖康完全悲观失望，对革命甚至对人生失去了信心，整天以喝酒、

打麻将虚度时光。后来，长沙警备司令部的军统特务范裕厚由于在军校曾经听过陈祖康的政治课，对他倍加欣赏，以师生名义将其拉入军统组织。

1936年，两广事变爆发后，陈祖康到湖南醴陵收集广西方面的军事动态，“成绩良好”，为军统头目戴笠所赏识，旋被派回福建家乡工作，主要负责收集日本方面的情报，为对日作战做准备。陈祖康先后担任福建警官训练所政训主任，驻闽绥靖公署情报处上校秘书兼第一所所长，省保安处谍报股上校股长。在担任军统闽北站长期间，他曾查到一封日本驻台湾总督中岛满从香港寄给福建省政府主席陈仪的信，并上报蒋介石，吓得陈仪赶快把他的日籍太太送到长沙，并表示对中央的忠诚。因为此事，陈祖康与陈仪产生尖锐矛盾，结怨也越来越深，以致陈祖康后来在台湾受到时任台湾省主席陈仪的奚落和报复。

陈祖康后来得戴笠之助，调任蒋介石成都行辕调查处第二股上校股长。1939年夏，陈祖康奉戴笠令赴上海部署抗日敌后组织，负责搜集日、汪、共情报。这年秋冬，他从陈公博那里获得了美国需要的日本剩余海军舰只位置的情报，从而帮助美军飞机彻底解决了日海军舰队。他多次征集到的日伪机密情报，

使中方军队掌握了先机，这也算是他对抗战的一些贡献。

抗战即将胜利时，为了保证国民党军队顺利进入上海，陈祖康与日军高级军官勾结，破坏了共产党在上海日军下级官兵中的策反工作。抗战胜利后，陈祖康获得国民党当局的忠勤勋章。1947年，陈祖康任华安“中美合作所”少将督察组长。11月，陈祖康返乡竞选所谓“第一届国民大会”代表，与刘子明同时当选，参与制宪工作。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陈祖康携妻子随国民党去了台湾。1960年，受命赴香港进行反共的情报工作，部署香港情报机构并担任香港情报局少将局长。1962年，由于陈祖康的特务活动过于猖獗，引起了国际纠纷，被香港当局拘捕。在狱中，他多受酷刑，晚年才得以放归台湾。回台后，他仅靠“国大代表”薪俸及补贴维持生计，晚景凄凉。晚年著有《花落去斋诗词集》存世。

1979年2月25日，陈祖康因旧伤发作在台北病故，终年78岁。

陈祖康是那个时代颇具传奇色彩的多面人物。所写《黄埔校歌》无疑是一首优秀作品，但他在后半生走上了人生歧路，枉费了满腹才华，令史家唏嘘和叹息。

记黄埔百岁老兵毛洪群

□ 李平华

2022年1月1日，是荔浦市龙怀乡庆云村油榨屯黄埔老兵毛洪群百岁生日。由于年事已高，他已经无法准确流畅地诉说他的经历，笔者只能试着记录其中的某些片段，以展示他“善良而顽强的”一生。

从戎报国

1922年1月1日，毛洪群出生在广西荔浦县（现在是县级市）偏僻的龙怀乡庆云村油榨屯一个贫穷的农民家庭。他排行老二，有一个哥哥、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年少的毛洪群喜欢读书，由于父亲是一个有点文化和远见的农民，便让他读到了初小毕业。在偏僻的油榨屯，毛洪群也算是一个有文化的年轻人。

年轻的毛洪群不愿待在大山里度过自己的一生，要走出去闯荡一个属于自己的天地。他只身来到柳州，接受了许多进步思想，也知道中国正在遭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他耳闻目睹广西当时征兵的热潮，也时时被那些“男儿为国沙场死，马革裹尸骨也香”的抗日英雄事迹所激励。1943年，毛洪群毅然响应国民政府“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



/ 毛洪群。

年十万兵”的号召报名参军，被分配到第四战区张发奎的军需运输第1团第3营当军需，负责管理服装和钱物。

1944年，毛洪群考取了设

在桂林的重庆军需学校二分校。1940年左右，军需学校在桂林城东建干路屏风山下设立第二分校。分校设办公室、政治部、军训部、教务处、总务部、军医

室，辖两个学员大队。分校实行短期训练，主要轮训营以上军需经理人员。课程主要是政治课、业务课和军事课。政治课包括国父遗教、政治学概论、国际政治、民族战史等内容，业务课包括军需经理学、粮秣被服管理、会计学、统计学、珠算、数学、军械管理等内容，军事课包括军事管理和制式教练。学生大队的课程增加代数、几何、中国近代史、英语、日语，以及班排连的战斗教练和野外演习。1944年，二分校迁往重庆。毛洪群他们200多人一路从桂林柳州撤退到重庆，编入第2期第7队。1945年3月，毛洪群毕业分配到郑州国民党第一兵站学部经理处第一科（处长潘适俊，科长赵世勋），后又到洛阳、开封、新乡等地担任中尉军需官，内战结束后回到家乡。

艰难岁月

1949年，毛洪群回到了他的家乡油榨屯。十多年后，毛洪群的小学同学看到他为人善良又有些文化，便把自己的妹妹介绍给了毛洪群，与毛洪群组建了家庭。1965年，他们的女儿毛秀球出生。两年后，受“文革”影响，毛洪群有时挨批斗，家里也常常穷得揭不开锅，妻子无法忍受贫穷又担惊受怕的日子，离开了他。毛洪群不但没有责怪妻

子，反倒对她当初嫁给自己心存感恩。毛洪群认为：既然他不能给妻子带来安定和幸福，又何必拖累妻子呢。自己的问题就让自己来承担吧。

毛洪群的女儿毛秀球回忆，父亲的善良是出了名的。战争年代，部队里有一个士兵要出国需要钱，父亲就把自己仅有的钱全给了他。这个士兵后来在国外发达了，还专门回来找到父亲，并赠予父亲钱财。在村里，由于毛洪群写得一手好毛笔字，每逢举办红白喜事，左邻右舍就上门请他帮助书写条幅之类，他总是有求必应。毛秀球还回忆道：“父亲非常坚强，无论生活多苦多累，从没见过他唉声叹气。”毛洪群的善良，使他在生活中得到了家人和乡亲的帮助。为此，他和女儿熬过了艰难岁月。

幸福晚年

2013年，毛洪群加入了当地的黄埔军校同学会，得到了有关部门的关心和帮助。此后，每逢佳节，当地有关部门以及黄埔军校同学会都上门对他进行慰问。2015年，毛洪群开始享受老兵待遇。同年，他还收到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这让毛洪群非常激动，连着几天几夜都睡不着觉，感慨祖国没有忘记他，人民没有忘记他。

2017年，毛洪群的眼睛患了白内障，需要做手术。广东一个慈善组织听说后，主动承担了老人的全部医疗费用。毛洪群出院那天，荔浦市人民医院院长卢保忠带领医院班子成员看望他，并送上了慰问金。

如今，毛洪群在大家的帮助下，把以前的土坯房换成了两层楼的混凝土砖房。面对现在的幸福生活，毛洪群常说，感恩政府，感恩社会！感恩一切关心他的人，祝福我们的国家繁荣、富强、昌盛。

如果一个民族没有敢为这个民族献身的英雄，这个民族就是一个孱弱的民族。毛洪群虽然没有在炮火连天的战场出生入死，但在国家危亡之际，毛洪群能够义无反顾地挺身而出保家卫国，本身就是一个英雄之举，这就是我们常说的黄埔精神的体现，也是我们民族精神的体现。

“老兵不死，只有凋零。”如今，这些黄埔英雄正在一个个凋零，但他们谱写的历史、留下的精神需要让更多的人看见和传承。我们应该尽己所能，用文字记录下他们的历史，让他们的精神代代传承。

衷心祝愿毛洪群健康快乐，福如东海，寿比南山！并感谢所有为本文写作提供帮助的朋友。



朱家璧将军与云南省黄埔军校同学会

□ 宋生春

开国少将朱家璧曾经担任过云南省黄埔军校同学会名誉会长，广大黄埔同学和后代亲属对这位毕业于黄埔第8期的革命前辈有太多的追思和怀念。

1910年11月，朱家璧出生在云南省龙陵县象达乡。他早年参加滇军，1930年考入黄埔军校第8期。1938年2月，朱家璧毅然离开滇军，经八路军高级参议周素园介绍，不畏艰险，辗转到达延安，在抗日军政大学学习。1940年9月，陈云指派他回云南开展工作，到重庆时，周恩来就他回到滇军中开展工作作了具体指示。后来，他一直在云南从事革命工作直到云南解放。

1957年，云南省军区成立，朱家璧任副司令员，分管民兵和边防工作。他结合云南边疆多民族的特点，深入实际调查研究，训练民兵队伍，巩固党政军民的团结，为稳定边疆，巩固国防做了不少工作。1984年，在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亲切关怀下，黄埔军校同学会在北京成立。同年，四川省黄埔军校同学会成立，朱家璧担任云南联络组组长。他积极组建云南联络组领导班子，争取办公



/ 朱家璧(前排右二)参加云南省黄埔军校同学会的会议。

条件，开展各项工作。工作中，他注意教育引导黄埔同学向前看，在新的历史时期为社会主义建设发展做贡献，为随后云南省黄埔军校同学会的成立打下了坚实的工作基础。

1988年，经中共云南省委批准，云南省黄埔军校同学会成立。朱家璧多次找同学谈话，表明自己工作太忙，不再适合当会长，并推荐了第8期同学、原云南地下党工委书记费炳为会长。后经省黄埔军校同学会研究，鉴于朱家璧在广大黄埔同学中的崇高声望和为云南省黄埔军校同学会成立所作的大量工作，决定推选他担任名誉会

长。在云南省黄埔军校同学会成立大会上，他亲切地勉励广大黄埔会员要珍惜荣誉，艰苦奋斗，发扬黄埔精神，好好做好云南省黄埔军校同学会的工作，为促进祖国统一、建设社会主义而不懈努力。据后来担任云南省黄埔军校同学会副会长的马继武回忆：“在云南省黄埔军校同学会成立之初，朱家璧不顾自己在政府部门工作劳累，多次找同学会领导班子和同学谈话，指导省黄埔军校同学会工作，并希望省黄埔军校同学会勤俭节约，把有限的资金用好。”在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上，朱家璧动情地说：“黄埔军



/ 1989年，朱家璧（主席台左四）出席云南省黄埔军校同学会颁发会员证大会。



/ 朱家璧（右二）参加云南省黄埔军校同学会举办的“纪念黄埔军校建校66周年诗画展”。

校成立时，孙中山先生教导我们黄埔学生，要革命，要爱国，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黄埔学生一直受到这种精神的鼓舞

和教育，努力革命。在东征北伐，八年抗战中，广大黄埔师生和全国人民一道，英勇奋战，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孙

中山先生还教导我们，要振兴中华。由于种种原因，我们未达到这个目标。现在我们成立黄埔军校同学会，这是很好的条件，很好的机会。我们黄埔同学要珍惜这个条件和机会，在党的领导下，为促进祖国统一、振兴中华而努力工作。”在平时的工作中，他和省黄埔军校同学会领导谈话时，总是交待：要黄埔同学顾全大局，彼此之间都要坦诚相见，互相多帮助，多做自我批评，教育引导他们不要闹意见，个人的事小，国家的事大。个人的有些事与统一祖国相比，都是小事。要正确对待自己，正确对待历史，正确对待海内外广大同学，包括台湾同学。只有团结海内外的黄埔同学，集中力量，才能不断为实现祖国统一的目标做出新贡献。他还亲自为云南黄埔军校同学会会员颁发会员证，让广大黄埔同学非常感动。云南省黄埔军校同学会的各届会领导都认为，云南省黄埔军校同学会之所以有今天的成就，与朱家璧早期对云南省黄埔军校同学会热情真诚的关心帮助是密不可分的。

朱家璧对云南省黄埔军校同学会工作的付出和支持，对广大云南省黄埔同学的关心和爱护，至今令大家难忘和感激！



我所认识的黄埔老人李甦

□ 李石

1993年，在中山公园由北京黄埔军校同学会举办的报告会上，我认识了黄埔老人李甦，那年他已经90岁。他说他认识我父亲（我父亲是黄埔军校18期2总队炮兵1队毕业），他们常常一起参加北京黄埔军校同

学会召开的会议，还常常住在一个房间。

就这样，我和李甦的接触越来越多，也渐渐了解到他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他历经磨难，但始终热爱祖国，坚持为黄埔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尤其是在



/ 李甦在陕西黄埔军校七分校门前留影。



/ 李甦。

改革开放以后，他在湖南、海南出资办学，提议在北京开办黄埔大学，主张开展民办教育，在北京成立黄埔敬老院……他是我尊敬的黄埔老前辈之一。

李甦，原名李宝钧，祖籍河南南阳。15岁那年，为了上前线杀日寇，他参了军，但因年龄小，只能在孙连仲部当勤务兵。1938年春，他随孙连仲部参加了台儿庄战役。后来，他被保送到黄埔军校第七分校21期炮兵科学习。

黄埔军校毕业后，正逢解放战争打响，他被分入胡宗南部炮兵部队任炮兵连长。随着国民党军队退向西南腹地，国民政

府计划在中国西南部利用山区打游击战，原来部队配备的重武器（火炮）不能带入山区，只得丢弃。为适应未来的山地游击战，美国向蒋介石部队提供了一批新研制的无后坐力炮，交付到重庆兵工厂。李甦奉命在重庆参与接收工作，谁知这批无后坐力炮还没有来得及下发部队，解放军即占领重庆。李甦随部队退往成都，最后在成都附近随部队起义。

起义后，他被编入解放军部队，分配到西南军区司令部任参谋职务。这时，他将名字李宝钧改为李甦。

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志愿军决定起用这批缴获的美国制造的无后坐力炮对付美军的战车部队，即要在国内训练会使用无后坐力炮的炮兵，但这需要有专业知识的教官。军区有关人员查阅相关资料，发现李宝钧是当年国民政府接收这批美式装备的负责人，便下令四处寻访。经过一年多时间，军区参谋终于在重庆复兴关下找到了李甦，当即把他带到西南军区司令部。

李甦来到西南军区司令部，看到军区首长的办公室内，东西各放着一张办公桌，分别坐着贺龙和邓小平。他被带到贺龙的桌前，参谋向贺龙报告：“这就是首长要找的那个李宝钧。”贺



/ 1951年由邓小平、贺龙签署的李甦革命军人家属的证明。

龙很随和，首先问到：“你好端端的，为什么改名字？”李甦回

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我也起义了，所以改名以示重新做人。”贺龙又问道：“你会使用那无后坐力炮？”李甦回答：“是的。”贺龙命令：“你下去准备个无后坐力炮训练方案，明天报给我，并给我做个实弹射击表演。”随后，李甦被分配到军区作战训练处任参谋。

第二天，在重庆歌乐山附近的山地上，军区人员放置好



/ 李甦在他建造的北京黄埔敬老院门前留影。

赤子情怀

——黄埔抗战老兵江厚昌在抗洪救灾中

□ 顾少俊

江厚昌，扬州人，黄埔16期生。1985年2月，江厚昌从扬州无线电元件三厂退休，广陵区委请他担任钞关居委会主任一职。1991年抗洪救灾，他舍小家，保大家，日夜工作在一

线。

1991年，扬州的梅雨天气一下子延长了一个多月。雷声在云层间轰鸣，震得人耳朵嗡嗡作响。暴雨、大雨、中雨、小雨循环不停。6月29日以后，总降水

量超过常年6倍。

“奇怪，这雨怎么就停不下来呢？”中午，江厚昌看着玻璃窗一行行往下淌的雨水自言自语地说。江厚昌已经连续10天每天工作16个小时以上了。这些

几辆残损战车，李甦肩扛无后坐力炮，在距目标战车二三百米外对目标射击，战车被击中后纷纷爆炸起火。贺龙看了非常高兴。回到办公室后，他看到李甦递交上来的无后坐力炮训练方案，立马皱起眉头，问李甦：“每批人员你定了3个月的训练周期，太长了！等你的培训做完了，美国人早就打到华北了，不行，能不能缩短训练周期。”李甦回答：“司令员的意思是多少天满意？您希望作战人员培训后能达到什么样的作战水平？”贺龙说：“3天吧，他们能像你一样，能装弹、瞄准、发射、击毁坦克就可以了！”

李甦考虑片刻，笑着回答：“我明白了，司令员的意思就是学员受训后能打坦克就行，炮兵的基础知识等文化理论就不用

耽误时间教了，学员直接扛炮训练，那我3个小时就能教会他们。”贺龙听了很高兴：“那好，就这么办，明天就开始训练。”李甦先后对西南军区的炮兵干部进行专业训练。训练期间，贺龙经常到场视察。

后来，由于李甦对美军装备、作战等方面有经验，被调往志愿军总部任助理参谋，继续负责军械的培训工作。退伍后，李甦到基层参加劳动，随后来到军区国营工厂当了一名普通工人。

改革开放后，李甦回到北京。面对改革开放大潮，李甦从容下海，与黄埔校友一起开办了黄埔外语教育学院、海南中医药大学，还在东北经营过建材，在北京搞过长途运输、开过餐厅。

上世纪90年代初，在北京

南三环东路分钟寺附近的居民小区里，李甦用早年攒下的资金建起了黄埔敬老院。人们走过它的大门时，往往会被大门上面和两侧的匾额吸引住，大门左边是“昔日东征北伐抗战”，右边是“当今安度幸福晚年”，上面写的是“北京黄埔敬老院”。

2011年11月20日晚，我和李甦一起观看中央电视台播出的《黄埔军校》纪录片。他坐在沙发上看着昔日军校大门的对联：“升官发财请往他处，贪生畏死勿入斯门”，说道：“当年黄埔军校承载着几代人的光荣与梦想，感召着一批又一批的中华儿女为了国家统一自强和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他还说，黄埔的爱国精神铸就了我和他的黄埔情缘。多年以后，我一直记得当时的场景和他说的话。



/ 江厚昌的黄埔军校毕业证书。

天，中午饭都是副主任费三梅从家里带给他。吃完午饭，江厚昌感到一阵疲惫。他一直以为这样的工作对他来说不算什么。想当年，重庆大轰炸期间，他和战友们到现场救人，一整天不吃、不喝水是常事。扒废墟，抬伤员，也没有感到怎么疲劳。现在，他才意识到，自己的体力不如从前了。

江厚昌靠着椅子一边打盹，一边想着这些天抗灾的情况。前天，社区东边那条街进水了，江厚昌动员居民们搬家。张奶奶的房子是木质结构，连续大雨，屋顶已坍塌见天。屋里的煤炭被漫进屋里的水浸湿，张奶奶无法生火做饭，只好吃干粮充饥。

张奶奶很想离开这所随时会倒塌的房子，无奈她没有别的地方可去。江厚昌对张奶奶说：“您年龄比我大得多，算是长辈了。我把您当我妈。我搭房子让您搬家。”江厚昌出钱，请来木工和瓦工忙了一天，在张奶奶屋后的高地上搭了一个遮风避雨的简易房。

这天上午，江厚昌冒雨来到张奶奶家，对张奶奶说：“房子搭好了，您搬过去后，我让周围邻居照顾您。我每天来看您。”张奶奶望着浑身是水，不时打着冷颤的江厚昌，眼泪流下来了。她张了张嘴，想说感激的话。可是，喉咙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似的，说不出来。江厚昌以为老人

还有什么要求，上前一步，问：“还有什么事，您尽管说！能办到的，我一定尽力。”张奶奶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带着哭腔，脱口而出：“江主任，您是个好人啊！”

下午1点，外面的雨下得更大了。江厚昌坐不住了，他想起福远门后街的季奶奶，准备去看一下。这时，女儿来了，告诉他：“家里天井进水了……”“知道了，你回去搬家吧！”江厚昌打断女儿的话，往外走。“你就不能回家看一看吗？”女儿在他身后说。江厚昌也感到对不起女儿，这么多年，好多方面自己都没能尽到一个父亲的责任。他回头看看瘦矮的女儿：“咱家的天井才进水，后街季奶奶家的水已进卧室了。你回去吧！我的东西你别管了！”江厚昌的语音虽轻，但态度坚决。女儿看着江厚昌越走越远的背影，流下了眼泪，泪水中有不解、委屈……

1949年后，江厚昌的妻子去了四川。此后，江厚昌一直和女儿江安娜生活。有一次，江厚昌出差，因为走得匆忙，没有给江安娜留生活费，碰巧家里没有米了，江安娜饿了两三天。受江厚昌身份的影响，江安娜的上学、工作和婚姻都不如意。直到江厚昌退休，江安娜以为能过上安稳的日子了。可是没想到，父亲又干起社区主任的工作。父亲干工

作不“和稀泥”做老好人，而是雷厉风行，疾恶如仇，得罪了不少人。为这，江安娜没少替他担惊受怕。

这些天，天天下雨，江安娜一个人在家，她多么希望父亲在家的时间能多一点。可父亲每晚12点才回来，天不亮就出门。有一天晚上，家里爬进一条长蛇，江安娜提心吊胆地抓住蛇尾把它扔到屋外。“如果那蛇回过头咬我一口，我就没命了。”江安娜事后想想，依然后怕。

江厚昌来到季奶奶家，水已经漫到季奶奶的床下了。江厚昌三步并作两步跑到派出所，拉着所长一起把老人安顿在季奶奶侄孙家借住。第二天，季奶奶的床浮到房门口。大水退后，季奶奶被江厚昌安排去了养老院。

抗灾期间，江厚昌每天一大早先巡视一遍辖区水情，9点回居委会布置工作。晚上，他要总结一天抗灾工作，拟出第二天的工作方案，12点才回家睡觉。有时深夜下大雨，江厚昌刚上床躺下，就又从床上起来，一家一户地敲门，提醒居民注意安全。那些天，江厚昌的睡眠时间很少，有时只有四五个小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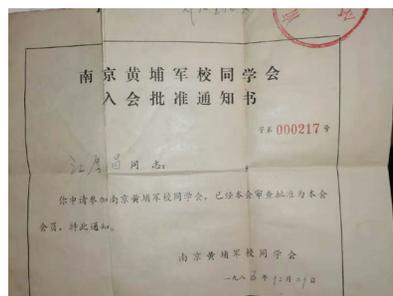
这次抗灾，社区没伤一人，没发生一起治安事件。全区290间房屋受淹，315间房屋进水，

受淹的775人全部得到妥善安置。这一切，与江厚昌的细心工作分不开。

江安娜和父亲一起生活了几十年。在她的印象中，父亲是一个不愿回忆往事的老人。

2015年的一天，江厚昌接到从台湾寄来的一本书，书名是《从士兵到将军》，作者是江厚昌的同学欧阳礼。那些天，江厚昌目不转睛、如饥似渴地一页页读着。

一天晚上，江安娜从外面回来，推开门，屋里静悄悄的，没有开灯，也没有开电视。江安娜借着外面路灯的光，看见父亲一个人坐在沙发上，抬起头，看着窗外的天空，像一尊塑像。江安娜不知父亲保持这样的姿势有多久了，她担心父亲病了，关切地问：“爸，您怎么啦？”“这本书我刚看完，写得很好！”江厚昌答非所问，“刘刚是我的同学，毕业后一直不知道他的下落。今天看了欧阳礼的书，才知道刘刚在抗战中牺牲了。长沙会战期间，刘刚深入敌占区侦察，不幸被俘。日军要他供出中国军队的装备及布防情报。汉奸对他说，只要讲了，立即放他回去，没有人知道他被俘这事儿。刘刚坚贞不屈。后来，日军用大刑把刘刚活活折磨死。当时，刘刚的军衔已经是少校了。刘刚是农家子弟，没有任何政治背景，他的



江厚昌加入南京黄埔军校同学会的入会通知书。

晋升完全是凭着一次次战功上去的。”“抗战期间，我的同学大都去了前线。我在重庆，相对安全，侥幸活了下来，和他们相比我是幸运的。”

江厚昌把目光从深邃的夜空收回，看着女儿一字一顿地说：“落后就要挨打，富强才能保国。如果当年我不从军，也许能给你留下很多物质上的财富，但我肯定不会像现在活得这样心安理得，无怨无悔，因为我把个人的命运与国家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了。爱国是最美好的品德。每个人都应把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

江安娜心中怦然一动，她现在才明白，为什么父亲一投入到工作中，就把家忘了，把她忘了。原来在父亲心中永远固守着这样的信念：国为重，家为轻；集体为重，个人为轻。今生有这样的父亲，夫复何求？江安娜多年来对父亲的不解和怨恨，此刻全部雪融冰消。■

投笔从戎热血抗战

——忆黄埔抗战老兵我的父亲田申

□ 欧阳维

1943年，祖父田汉在桂林《文学创刊》上发表了《孩子的行路难》一文，讲他的长子——我的父亲田海男（又名田申）在中国远征军中服役，赴印缅战场与日军作战的事。

父亲田海男（田申）1923年1月25日在上海出生，因祖母怀胎于日本，由海上返回中国，故取名“海男”。一年后，祖母因病离世，是曾祖母把他带大。长大后的父亲经常参与祖父组织的宣传活动。1934年，他在祖父编剧、聂耳作曲的歌剧《扬子江暴风雨》中饰演小栓子，与扮演爷爷的聂耳同台演出。

1937年上海八一三抗战后，父亲协助祖父和廖沫沙、张曙编辑《抗战日报》，负责主编该报的儿童周刊《抗战儿童》，受到长沙八路军办事处主任徐特立的关怀和教育。1938年4月，父亲组建儿童剧团并担任团长，组织小朋友们以歌咏、讲演、戏剧为形式，到街头、学校向市民进行抗日宣传，还将自己创作的《中华儿童血》一剧的演出收入全部捐献给宋庆龄妇女儿童福

抗战儿童

二分月



儿童剧团纪念集

/ 1938年4月，《抗战儿童》封面。

区。在中央军校，父亲学炮兵，黄仁宇学步兵。

利会，受到时任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郭沫若的表扬。

祖父在军委会三厅任处长时，父亲和在《抗战日报》当编辑的好友黄仁宇一同到武汉向他汇报工作，恰逢黄埔军校招生，父亲和黄仁宇商量要一起去报名从戎，征得祖父同意。黄仁宇是大学生，父亲刚上高中，才15岁，年龄不够，但考试成绩不错，当年夏天都被黄埔军校16期第1总队录取。受战时交通管制，他们乘江轮赴宜昌待命，在一所破庙内住了3个月，后来徒步步行军直到年底才到达成都校

区。在中央军校，父亲学炮兵，黄仁宇学步兵。

1940年5月下旬，祖父由桂林赴重庆工作。年底，父亲和黄仁宇正好从中央军校毕业来到重庆。祖父说，父亲“已经是一个很英挺的少年军人了”。毕业生的分配有留校当教官还是到一线部队的选项，父亲和黄仁宇都想参加抗战，最怕留校。早在毕业前，他们就托祖父找人帮忙给学校打招呼，祖父找了时任54军军长的陈烈，陈烈说欢迎他们到部队去。祖父说：“海男们报国的志愿总算有了发挥的机会了。”

不巧，父亲他们还未毕业，陈烈就因病去世。祖父为父亲的事又找了在粤和桂南战场认识的该军14师师长、黄埔4期的阙汉骞将军。父亲和黄仁宇最后分到了54军的14师。送行时，祖父送了一首诗给父亲：“风云天地合，送汝越南行，莫负平生志，田家父子兵。”到滇越边境防区后，阙师长见他们抗战决心大，就把他们分在驻麻栗坡的42团和驻马关的41团当排长。

二

1940年9月，日军占领越南。为巩固防御态势，日军没有立即向云南进攻，因此中越边境老街至勐康一线地区处于双方对峙状态。见无仗可打，父亲和黄仁宇商量后向师长建议组织刚到部队报道的黄埔16期毕业的现任排长入越南侦察，做到知己知彼。师长批准后，父亲他们换上云南老乡的衣服，把手枪插在裤带上，从外交部专员公署领取商民出境证开始侦察。半个月的时间，他们出八寨深入敌境，经半厂、古林箐、马革，到河口、谷柳、老街；又由桥头、新甸到勐康；由老街子到花龙。经过侦查，他们认为日军关注的重点在泰国方向，尚无向我军进攻的企图；如我军出境作战，应注意做好与卢汉部结合部的防卫，以防止日军渗透。他们的越境侦察受到了师长的表扬。

祖父虽然毫不犹豫地把他送到了前线，但他的心却一直揪着。他在文章《孩子的行路难》中写道：

今日神圣的民族战争不能不要求每一个做父母的贡献他们最爱的儿女……我们知道青年人决不怕打仗，也决不怕死，怕的倒是没有真和敌人拼命的机会，或是没有看到敌人以前倒在一些可能补救的困难或无谓的折磨之下。我看了孩子的记录曾经流泪，看



1940年冬，田汉（后排左）在重庆送田申（后排中）、黄仁宇（后排右）赴远征军前合影。

到他在泥泞的峭壁上一步一步地膝盖与胸脯抵在尖石上爬着，尖石头刺着他那已经伤痛脚板。饥饿使他的肚子几乎瘪的合拢来，眼睛发着晕眩，躺在地上一动也不能走动的时候，我仿佛听到他在叫‘父亲’，叫‘祖母’的声音……我真是那样的难过，我恨不得那时候在他身旁抱他起来，设法给他一杯开水喝，这也是天下做父母的心，况且他又是一个没有母亲的孩子！但海男所受的痛苦比起广大抗战官兵最不幸的一层来是几乎微不足道的……痛苦的生活常常对他们有着半宿命的支配，他们也根本没有自己变更工作和地区的自由……那些拖着沉重脚步的落伍者或倒在路边张着无力的嘴等着一口水喝的

人们，不都是人家的儿女吗？我虽然每每也尽过我一点可能的力，但是，啊，这样的现象是太多了啊！我真不能不要求我们每一中国人对于这样的在艰难的旅途中挣扎的军人以父母兄弟的心给他们应有的迫切的扶持，那将不仅救了他们，也救了我们主要的战斗力，救了抗战，救了中国。

三

1942年秋，父亲到贵州接收新兵时请假到桂林看望老祖母并到重庆看祖父，黄仁宇也正好在重庆看望他的母亲。两人觉得滇越边境无仗可打，还是要去一线参战。这时，时任新1军军长的郑洞国正在组织新1军准备出征印缅，急需参谋人员。父亲和黄仁宇听了这个消息后，表示同去，祖父非常支持。为此，父亲还征求了也在重庆的周恩来的意见。周恩来对父亲说，郑洞国是黄埔1期生，也是他的学生，既然是赴印缅抗日，他同意父亲和黄仁宇的想法。经郑洞国面试通过，父亲和黄仁宇加入先遣部队。1943年1月，他们乘美军飞机越过“驼峰”至印度兰溪，到达兰姆伽训练基地，建立新1军指挥部。飞越“驼峰”时，父亲写道：“万里高飞越驼峰，故国回眸云海中。远征印缅为雪耻，生当人杰死鬼雄。”

父亲在新1军任作战参谋，

经常随郑洞国到前线师团，因此他和孙立人、廖耀湘两位师长都很熟悉。父亲有文字和外语特长，所以兼任了翻译和秘书。黄仁宇是南开大学学生，外语很好，担任情报参谋，经常搜集和翻译战报，并与美英军事情报军官交流，成绩突出。

后来，父亲参加了战车（即坦克）和炮兵训练班。当时，蒋纬国在随同蒋介石参加开罗会议后，也调新1军任参谋，并参加了战车训练班。日后，蒋纬国和赵振宇、赵志华等人在印缅编组了战车营，首先使用坦克向日军攻击，由此发展了装甲兵。

1943年开始，父亲即随同新1军由印度反攻缅甸，转战缅北。在胡康河谷，新38师和新22师连克于邦、太洛和孟关，越过杰布山，进至孟拱河谷，扫荡了胡康河谷的敌军。1944年6月，在加迈、孟拱战役中，当郑洞国军长离开廖耀湘的师部行至一处高地观察敌情时，突然山下枪声大作，敌人约一个排正向山上冲来。父亲和新22师的项参谋带领4名卫兵随即占领有利地形，以冲锋枪和卡宾枪还击敌人以掩护郑洞国，直至小股日军被增援部队歼灭。父亲在随郑洞国慰问攻占加迈的勇士时，发现不少士兵连续两个月在泥浆水潭内作战，没有脱过鞋袜，当再脱下鞋袜时，脚上的皮

肤连同袜子被整个撕下来。

在迂回孟关后方追击战中，父亲担任战车营联络官随车出击。这是驻印军首次使用坦克，该营的连排长和一些车长不少都是父亲的同学，他们在3个月的时间内就学习掌握了美式M3A3轻型坦克的驾驶、保养和维修技术。当天清晨5时50分，战车营的坦克发动机开始轰鸣，以战斗队形向南冲击。坦克兵们在十分复杂的丛林和沼泽地驾驶和射击，把日军18师团的指挥所冲得七零八落，击毙18师团作战课长石川中佐和56联队的联队长山崎大佐，缴获了18师团的关防大印，获得迂回攻击孟关后方的重要胜利。战车营先遣组长戴慎澜少尉被授予“抗日英雄”称号，瓦鲁班血战也载入战争史册。

在密支那战役中，父亲和黄仁宇辅佐郑洞国到前线指挥。因日军顽强抵抗，密支那久攻不下，黄仁宇还在随同33师进攻时中弹负伤。在攻下密支那后，驻印军进行了改编，组建了新1军和新6军，郑洞国升任驻印军副总指挥，父亲也调任总指挥部直属炮兵团任连长。黄仁宇伤愈后则任郑洞国的随从参谋。

1945年4月，国内日军集中兵力准备进攻湖南芷江的中国空军基地，情况十分紧急。新6

军奉命空运至芷江增援，父亲指挥的直属重炮连也奉命配属新6军，由陆路行军经贵阳至芷江参战。后来，中国军队获得了胜利，日寇在芷江签署了投降书。

四

父亲非常珍视参加抗日战争这段历史，在战争年代曾创作过《边塞风云》《中华儿童血》等剧本和《滇南苦旅》《空袭使我们团结得更紧》等散文和回忆文章。离休后，又写下了《潇湘犹忆战旗红》《忆黄仁宇》《缅北之战》《反攻缅甸忆将军》《不破孟关不剃须》等文章并编入《行路难》一书。

父亲和黄仁宇的感情很深。他们一起当《抗战日报》的记者，同去武汉共进黄埔，一起潜入越南侦察敌情，同赴印缅参加远征。1941年军校毕业分配之前，黄仁宇还和父亲一起，在南岳的田家搭地铺住过一段时间，近距离观察过祖父田汉的工作和生活。后来黄仁宇成为著名历史学家，在国内出版了代表作《万历十五年》，他们又再续友情。祖父平反后，父亲送给黄仁宇一套十六卷本的《田汉文集》，黄仁宇不知翻阅过多少次，1988年写下了《忆田汉》一文。黄仁宇去世后，父亲很心痛，写了一首挽诗：“隔洋闻耗痛失君，梦魂萦绕泪沾巾。新年甫接兄贺

卡，何期永别隔死生。潇湘弱冠同抗敌，印缅歼倭献青春。两地相思盼聚首，留待来生续知音。”

郑洞国的形象深深印入父亲的脑际，从重庆面试，到印缅战场，父亲一直跟随他。十年浩劫中，父亲以莫须有之罪身陷囹圄，有人不惜卖友求荣歪曲历史得以自保，唯有郑洞国虽身处逆境，在威逼之下仍能凛然尊重历史事实，写下“陈惟楚（父亲在军中的名字）曾在我的部下参加了反攻缅甸的抗日战争”。当专案组人员向父亲出示外调材料，他亲眼看到郑洞国熟悉的笔迹时，眼泪簌簌地掉下来。他说：“可以想象桂公（即郑洞国）在受威胁逼供的情况下，要写出那样的证词将会受到何等的侮辱和委曲。桂公是黄埔1期身经东征北伐抗日战争的名将，部下的袍泽僚属众多，而我仅是在他帐下供职数年的小参谋，又非亲故，在经数十年的政治风云变幻之后，他还记得陈惟楚其人，并如实地证明了陈惟楚其事，乱世之中，这种品德是何等高尚。”

父亲视周恩来、邓颖超为自己的指路明灯。1945年2月，父亲接到祖父由昆明的来信请假回到重庆，与祖母和家人重逢，又见到了“阔别3年的周恩来伯伯和邓妈妈”。经邓颖超介绍，



/ 1949年1月的田申。



/ 田申。

父亲进入军事调处执行部工作。1946年4月15日，父亲在重庆天官府街家中接到郭沫若夫人于立群的通知，让他在当天下午到中共办事处见“邓妈妈”。在办事处周恩来的办公室，父亲见到了“周恩来伯伯和邓妈妈”，聆听了周恩来的嘱托，放弃了战后继续读书的打算。周恩来当即在桌上铺开信笺，用毛笔给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写了一

封信，详细介绍了父亲的家庭背景、抗战经历及所具备的条件，还在信后写上对聂司令员夫人张瑞华的问候。事后，父亲把谈话情况和准备北上的消息告诉了祖父和阳翰笙。父亲最舍不得离开的是抚养他长大的祖母，临行前只告诉她老人家是到北方上学。4月19日，父亲和一同北上的朋友住到了红岩村，一夜无眠。第二天一早，父亲登上一架美军运输机，向送行的妹妹玛丽（田野）和阳翰笙的女儿欧阳小华挥手告别，充满期待地飞往张家口。

聂荣臻看到周恩来的介绍信，听了父亲转述阳翰笙对他的问候非常高兴，勉励父亲好好学习，有所作为。父亲先在军区秘书处当秘书，并担任聂荣臻的外事翻译。后来即奉调军区炮兵旅，在高存信旅长指挥下的炮1团任副团长。此后，父亲陆续参加了清风店、石家庄、元氏战役、太原战役和新保安战役。在太原战役中，按高存信的指示，父亲带领榴弹营配属18兵团，在司令员徐向前指挥下直接支援步兵进攻。1949年10月1日，父亲以华北军区战车团代团长身份，在祖父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新中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乐声中，带领官兵开着缴获的日本坦克隆隆驶过天安门，接受毛主席的检阅。

水遥山远漫相思

——忆我的爷爷裴鸿汉

□裴琦

时光荏苒，日月穿梭，又是一年清明日，让我想起如仍健在已达百余岁的您——我的爷爷裴鸿汉。1919年9月，您出生于河南省延津县。您有三个哥哥，两个姐姐。那时候，家道中落，为了能够有所发展，您只能走出家乡。裴氏家族有“耕读传家”的家风，您就准备传承读书这一方面了。

长兄如父，您的大哥在陇海铁路工作，是陇海铁路调度股长，可以说手握实权，为您的发展奠定了一定基础，也深刻影响了您的人生之路。与之同行，开阔了您的视野，也注定了您漂泊的一生，因为您不甘于平凡的生活，想成为更好的自己。

十几岁时，喜欢美术的您到开封艺校学习。幸运的是，还有一个同村同姓的小伙伴与您朝夕相处，共同学习和生活。想来那段时光应该是您最怀念和珍惜的吧！恰同学少年，呼朋引伴，学您所好，无忧无虑！

只可惜好景不长。不久，日寇便发动了侵华战争，偌大的中国，已经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于是，您投笔从戎，考入了



/ 1939年，裴鸿汉入黄埔军校的学籍照。

黄埔军校第二分校第17期步科学习。本来用来写字画画的手，端起了步枪，练起了劈刺，扔起了手榴弹，一介书生成为武夫。黄埔军校学习期间，您交游广泛，与不少同学、同乡和老师结下了深情厚谊，为您今后的事业发展打下了根基。能文能武让您在各类社会活动中如鱼得水，游刃有余。1939年11月至1941年6月，湖南武冈一年半严格的军事学习和训练改变了您，不仅使您成为了合格的初级军官，也改变了您的思想，影响了您此后的人生。

黄埔军校毕业后，您参加过

一段时间的对日作战，由于有美术特长，您做过前线侦查，绘制战场地图。其间见证了战争的残酷与无情，右耳还曾负过枪伤。数年后，家人亲友们曾问及此事，也见过那个荣光的疤痕。后来，您到了徐州，担任徐州铁路警务处稽查队长，由军界进入了警界。在任时，因为私放被捕的进步学生，被当时的军统通缉，您只好跑路去了南方。当时，学生们被铁丝捆绑并且串起来等待天亮后处置，是您趁着夜色深沉，不畏艰险，剪断铁丝，放走了他们。您为了躲避通缉，东奔西走，流落香港。在香港，为了生存，您做过苦力，挖沟挑泥；也当过司机，为老板开车。回忆往事，您还开玩笑说，您可以教工人怎样更快更好地挖沟。是啊，那是因为你可是接受过如何挖战壕的专业训练的。后来，为了改变生活境况，您还做过船员，远渡重洋，遨游世界。但是漂泊四海不是您的理想，于是您又重新上岸，在香港新华珐琅厂工作谋生。

上世纪50年代，您已是而立之年，仍勤于学习，考入台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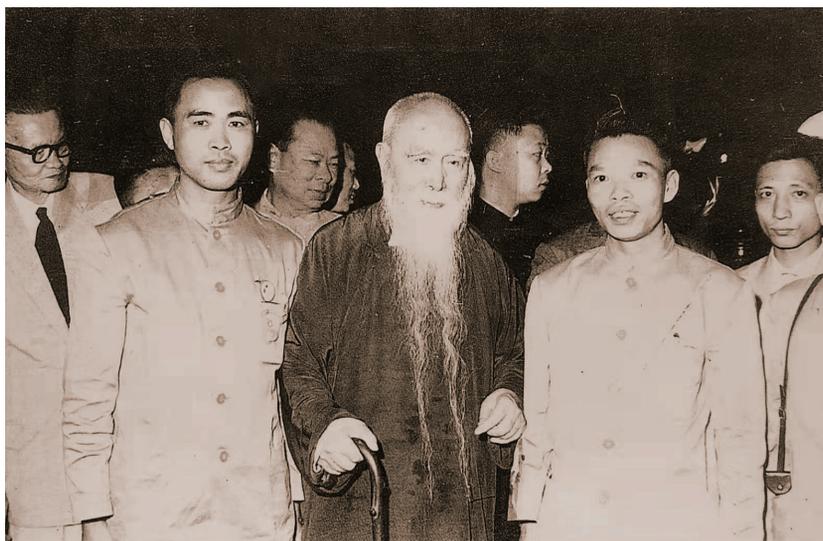
的大学学习金融专业。从毕业时的照片看，您是那么年轻，对未来充满憧憬，对生活充满热情。

大学学业完成，回到香港，您考入香港汇丰银行，从此职业和生活进一步稳定下来。这期间，您还曾兼任“香港道德促进委员会”的组织部长和经济部长。就这样，您在汇丰银行做到了高级职员，直到退休。

退休后，您最喜欢抽时间到台湾去，因为可以与数十年情谊的朋友和同乡相聚。延津县旅台同乡会是您的常去之处，在那里您可以和同乡们用乡音交流过往的峥嵘岁月，互述衷肠。

身在异乡越久，思乡之情愈深。早在1958年，您克服重重困难和家乡亲人取得了联系，家里甚至每个月都能收到您的书信。在当时，大陆的家人生活困难，您坚持给哥哥姐姐和孩子们寄钱送物以克时艰，衣物、粮油每家都有份。当时，您可谓是以一己之力，担负起大家族的生活重任。这是您对兄姐们的感恩和回报，也是对后辈的抚育与关爱。可以说您继承发扬了“兄友弟恭”的优良民族传统，为我们家族树立了一个典范，让家族成员紧密团结在一起，互帮互助，相互关爱。

大陆改革开放，您第一时间返乡探亲，看到家里儿孙满堂，您也享受到了期望已久的天



／ 裴鸿汉(前排左一)和于右任(前排左二)等合影。

伦之乐。在家乡的时光，对待家人好友，您总是慷慨解囊，送钱赠物。您总是说：“钱就是用的，只要亲人朋友高兴，我就十分快乐！”

对待孙辈，您也是亲爱有加，注重教育。您多次写信要我的哥哥努力学习，到香港考大学、读博士，可惜最后没能成行，留下了些许遗憾；您也曾经写信勉励我，要我好好学习，将来才会有更大的发展。后来，我也像您一样，工作多年以后重返校园，读了研究生，也算是遂了您的心愿。

至今，我还珍藏着您送我的一块瑞士手表，虽然价值不高，我却视若珍宝。每次拿出来看一看，摸一摸，就想起了您的音容笑貌。给我印象极深的还有您的坐姿，端端正正、挺拔笔

直，稳如磐石。那时，我还不知道您读过黄埔军校。近年来才明白，这是严格的军事训练留给您的一生印记。

如今，斯人已去20余年，我也40有余。去年，我有了一些空余时间，从家人口中了解到您的一些事情，也查询到了您的一些资料，但也是支离破碎。可是通过这些片段，我对您有了新的认识，也更理解了您的思想。

在今后的人生旅途中，有了您不甘平庸、努力奋斗的精神鼓舞，我会拼尽全力，更好地工作和生活，为自己、为家人、为理想！期望您的在天之灵，为我加油！为之愉悦！

（欢迎祖父的亲朋好友或其后人联系作者，再续前缘。电子邮箱：pq3155@163.com）

爱国主义千秋永存

——析黄埔教官方镇中编辑的教材《总理遗教》

□方西峰

我的父亲方镇中1908年进入私塾学习。1918年毕业于南阳市唐河县高等小学。1919年应表兄郭须静之邀进京，入北京师范大学附中学习。1923年毕业于。方镇中的革命思想启蒙于表兄郭须静与革命先烈李大钊，他参加了五四运动，是学长赵世炎在师大附中创办的“少年学会”成员。1923年考入国立北京法政大学（三年肄业）。1926—1932年在李大钊帮助下留学法国，在巴黎学习政治学。1935年留学日本，在东亚日语学校学习日语。他在《自传》中写道：“1936年日本‘二二六’政变发生，我感到日本侵我战争迫在眉睫，即于是年三月返国。”1936年，方镇中终止留学，毅然决然地归国，脱掉长衫、扔掉西服，投笔从戎，参加了抗日救亡的队伍。（以上内容来自现存河南大学档案馆的方镇中《自传》）

方镇中1938年2月进入中央陆军军官学校，1939年3月调任国民政府军委会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第4团（即战干四团），该机构1941年改称中央战时工



方镇中。

作训练团，是黄埔军校培养政治科员生的机构。

从1938年2月担任第14期中校政治教官，到中央战时工作训练团少将政治总教官，1945年抗战胜利后，带领中战团最后一期学员（即21期）到陕西省训练团改学会计、俄语，于1946年5月结业之后离任，方镇中在黄埔政治科执教8年余，共主持培训了8期（14—21期）约4万名黄埔员生。

上个世纪50年代初笔者上小学时，有一次放学到父亲教书的学校校园玩耍，和父亲一起回家的路上，父亲若有所思地对我说：“共产党伟大的地方，就是把‘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

歌。”那时的我似懂非懂。接着，父亲问：“你还会唱吗？”我当然会唱。我出生于1942年年初，记得我家住在西安南郊何家村的一座农家小院，大概3岁时，哑哑学语的我就能和父亲一起唱“义勇军进行曲”“满江红”“苏武牧羊”了……

我想每一个人的思想都会有一个来处，当“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父亲穿上军装奔赴疆场，对于我的影响可想而知。这些年来，我作为黄埔二代一直追寻着父亲的足迹。

据查，当时在西安的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七分校授课的内容是七分军事三分政治，而同在西安毗邻的中央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授课内容是七分政治三分军事。这些年，我一直好奇方镇中作为黄埔系政治科总教官，8年来究竟在课上给员生讲了什么内容，才使得这些年轻的战士抱定为国捐躯的钢铁意志，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浴血奋战，枪林弹雨中冲锋陷阵。笔者曾在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查阅到中央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1940年8月12日公布的《政工队教育计划大

纲》，其中排在政治科目重要地位的课程是“总理遗教”。在方镇中《自传》中记载他的授课科目有总理遗教、国际政治、各国政府、三民主义等课程。

有幸的是，有一位研究抗日战争的朋友，给我提供了一些有关方镇中编写的教材的档案资料。

其中，一本《总理遗教》教程封面上标明：“编辑者：方镇中；印行者：陕西省训练团；中华民国三十五年十月出版。”这是中央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第21期在陕西省训练团结业后所印，全一册，共70页，约3万字。由于这份资料字迹模糊且缺页，现将较完整的“目录”与第四讲“世界民族问题与中国”内容收录于下，以飨读者。

第一讲 民族主义与中国

一、民族主义总说

(一) 民族主义定义

(二) 民族与国家之区别

(三) 民族构成的要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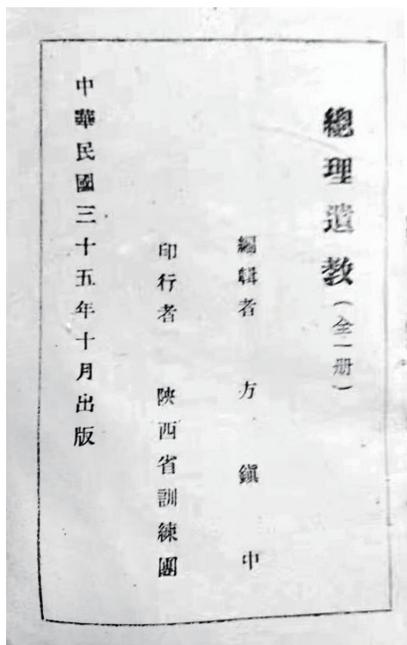
(四) 要救中国必须提倡与了解民族主义

二、中华民族的危机

第二讲 中国民族所受天然力政治力及经济力的压迫(附表解)

一、中国民族所受政治力的压迫

二、中国民族所受经济力的



方镇中编辑的教材《总理遗教》。

压迫

第三讲 中国民族主义的消失(附表解)

一、受异族征服的影响

二、国人妄谈世界主义

第四讲 世界民族问题与中国(附表解)

一、世界民族的分析

二、世界大战与民族问题

三、民族主义是世界主义的基础

四、中国爱好和平正是文明进步的表现

第五讲 怎样恢复民族主义(附表解)

一、要恢复民族主义须使国人明了我国所处的地位

(一) 就政治压迫说

(二) 就经济压迫说

(三) 再就人口增加的压迫说

二、要恢复民族主义须利用宗族与地方观念来团结国人

第六讲 怎样恢复我们民族地位(附表解)

一、就文化方面言

二、就道德方面言

第四讲 世界民族问题与中国

一、世界民族的分析：

全世界人口，大约十五万万，中国人约占四分之一，欧洲的白种人共计约占四分之一。

白种人中，又分四个民族，(1) 条顿族(北欧)建立的国家有德国、奥国、瑞典、挪威、荷兰、丹麦等。(2) 斯拉夫族(东欧)建立的国家有俄国、捷克斯拉夫、巨哥斯拉夫，及波罗的海岸与巴尔干诸小国。(3) 盎格鲁撒克逊族(西欧)建立的国家有英国、北美合众国及加拿大等。(4) 拉丁族(南欧)建立的国家有法国，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及南美诸国。

因为白种人的民族主义发达，在欧洲住满了，扩充到西半球的南北美及东半球的澳洲与非洲的强国，占了地球上的大部。

二、世界大战与民族问题：

欧洲各民族都染了帝国主义之毒，是以常常发生战争，几乎十年一小战，百年一大战，其最

大的战争，即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动员五千万人，经过四年余之久，参加国家二十余，其构成的原因有二：（1）盎格鲁撒克逊人与条顿人互争海上霸权。（2）各国争夺土耳其的领土。

在这次战争打了三年之后，美国总统威尔逊在“民族自决”口号下参加战争打击德国，待德国败后，举行和议，其所定条约却极不公平，弱小民族，对其分制所受的压迫，比前更甚，英法等国想永远维持他垄断世界的地位，再不准弱小民族复兴，所以天天鼓吹世界主义，谓民族主义的范围太狭，其实他们主张的世界主义，就是变相的帝国主义，由此可见，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果仍是一个帝国主义打倒别一个帝国主义，留下来的，还是帝国主义。

三、民族主义是世界主义的基础：

第一次大战中，发生了俄国的革命，先推翻了本国的帝国主义，来为世界上被压迫人民打不平，换言之，即是俄国一万万五千万人，脱离了四万万白人的集团，来参加十一万万被压迫的非白种人，与二万万五千人的白人对抗，这确是世界民族政治思想进步到光明地位的现象，我们应先把失去的民族主义恢复起来，完成国家的独立，并为世界上被压迫者打不平，世界主义

理想固很高，但绝不是受屈民族所应该讲的，要知世界主义的基点，是民族主义，否则一个民族本身，尚不能取得与其他民族自由平等的地位，世界主义，将无从讲起。由此可知，世界主义实藏在民族主义之内。

四、中国爱好和平，正是文明进步的表现：

中国文明比欧洲进步了二千余年，我们希望欧洲人进前跟上我们，不可退后让欧洲人拖下去，因为我们在二千年以前，已经丢去了帝国主义，主张和平。欧洲人现在还是脱不了讲打的野蛮习惯，专讲强权，不讲公理，只有革命后的俄国，主张和平，算是跟上了我们的文明。

再讲到主义的政治哲学：近世欧洲盛倡的无政府主义，及共产主义，一般青年，认为是世界上顶新的学说，其实，都是我们几千年前的旧东西，如列子所说华胥氏之国，其人无君长，无法律，自然而已，是否即是无政府主义。再如目前俄国所行制度，一般人认为是共产制度，其实不是真（“真”字迹模糊）共产制度，而是马克思主张的集产制度，更进一步研究，则其所行者，也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列宁主张的新经济政策，反而中国在数十年前，洪秀全曾经实行了共产制度。

总之，目前欧洲驾于我们之

上的，不是政治哲学，而是科学，我们要学欧洲的，应是中国没有的科学，希望中国四万万先恢复我们的民族思想，然后进而促进世界大同，正所谓，欲平天下者，先治其国也。

以上是1939年至1946年间方镇中教官所编写教材的片断。从中可以看出当时的他对中华民族的自信心和自豪感——“中国文明比欧洲进步了二千余年……”。他提出“俄国的革命，先推翻了本国的帝国主义，来为世界上被压迫人民打不平……”说明他坚定不移地站在人民的立场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他以满腔的热情宣扬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并“希望中国四万万先恢复我们的民族思想，然后进而促进世界大同”，胸怀理想，站在世界的高度，教导着抗战时期一批又一批优秀的爱国青年。

在第二次国共合作中，方镇中以无党派人士身份加入抗日阵营，抗战胜利后两袖清风，谢绝一切提拔犒赏，自谋出路，成为国立河南大学法学院院长、政治系主任。纵观方镇中一生的作为，他始终忠诚于祖国和人民，兢兢业业于祖国的教育事业。在方镇中逝世后的2015年，他的遗属代他领取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发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

神秘的“失业”黄埔生军官团

□ 杨灵统

他们是黄埔生，参加北伐，有经验、有劳绩，北伐胜利，却背负“失业”的名声，被“收容”进国民革命军军官团。

有人说军官团收容了近千名黄埔军校1到6期的失业生。

而蒋介石视军官团为宝贝，军官团设立的一年里，在日记里提到了十余次。

比如说某日“六时起床后往军官团讲演毕后回寓会客”，某日“晚宴客后往军官团训诫”，某日“上午点军官团名”……蒋介石常不定时地去巡视、讲演和点名，如同看顾爱子。

这是一个神秘的军官团。

军官团的开办

1928年3月6日，国民革命军军官团和南京中央军校6期一起开学，蒋介石主持开学典礼。当年10月，军官团附设于南京中央军校。

军官团编制庞大，不惜经费，受各方瞩目、媒体关注。当时《图画京报》曾多次报道军官团的开学典礼、训练和野外演习。

蒋介石亲任军官团团长，教育长何应钦，中将副团长黄慕松，团附冯轶裴。1928年10月，



/ 军官团大门。



/ 蒋介石在军官团和中央军校6期开学典礼上讲话。

军官团附设于中央军校后，改团长为主任，以冯轶裴为主任。

军官团主官还包括曾养甫、徐国镇、汪镐基、王文英、程天放、蓝腾蛟、廖士翘、章鸿春等人。

军官团主官和教官以陆军大

学、保定军校和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生为主，营长和主要教官皆在少将以上。比如，第2营少将营长周址，毕业于保定军校1期和陆军大学3期，1927年曾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办公厅中将主任。

军官团以团为建制，下设两个营和骑兵队，共10个连队，分作28个教授班。两个营共8个连是黄埔1到5期的毕业学生，骑兵队两个连是中央军校6期的骑兵科学生及一部分招考的学生。

北伐之时，蒋介石以中原作战需要骑兵，故而命令由第6期入伍生中挑选300人，组织骑兵营，浙江余姚籍陆军少将沈振亚任营长。1928年初，骑兵营始往南京，与军官团同驻马标，并

入军官团。故而骑兵营亦较6期其他科提前毕业。学员的食宿、服装、书籍等由团供给，还有津贴，黄埔1期生40元，2期生35元，3期生30元，4期生25元，5期生20元。骑兵队部分学生按照上士待遇。

军官团教职人数既众，职级也高。仅有衔的教职人员——上至上将团长，下至准尉司书，就有395人，其中少将以上者25人，上校54人。

军官团成立时学员共计900余人，内有骑兵队学生255人，最终准予毕业者897人。开办之初，学员们进进出出的调动是相当多的，有陆陆续续进团的，有因找到工作离团的，或被开革的，故而前前后后同学总人数远超千人，据同学录登记人数达1285人。

如此看来，军官团差不多十来个学生配一个高级教官。如果加上无衔的勤杂人员，那么为这帮“失业生”服务的教职人员真是太多了，师生比怕是一比二都不到！每两个学员就有一个人服务。

试问，除了蒋校长，还有谁有如此大手笔？还有哪个班科能超越军官团？

1936年，军校毕业生调查处开始甄别学生学籍，军官团独立设为班科，字别“军团字”，不过选择登记军官团学历的学生



/ 军官团分列式。



/ 军官团剑术教练。



/ 军官团学员俱乐部。



/ 军官团科长以上主官。



/ 军官团讲堂。



/ 军官团诸兵联合演习。

数量才 15 人，这说明军官团学员应皆有其他学历。

笔者故乡浙东宁海县当时有 13 位青年在军官团中学习工作，学员中有黄埔 4 期毕业生秦友庸、陈维镛、王巨卿、马江春；5 期的郑育英、郑纲；6 期的赵光烈、陈英、童葆昭。杨植材、叶云腾学历待考。还有准尉司书储纲、少尉股员钱时望是教职人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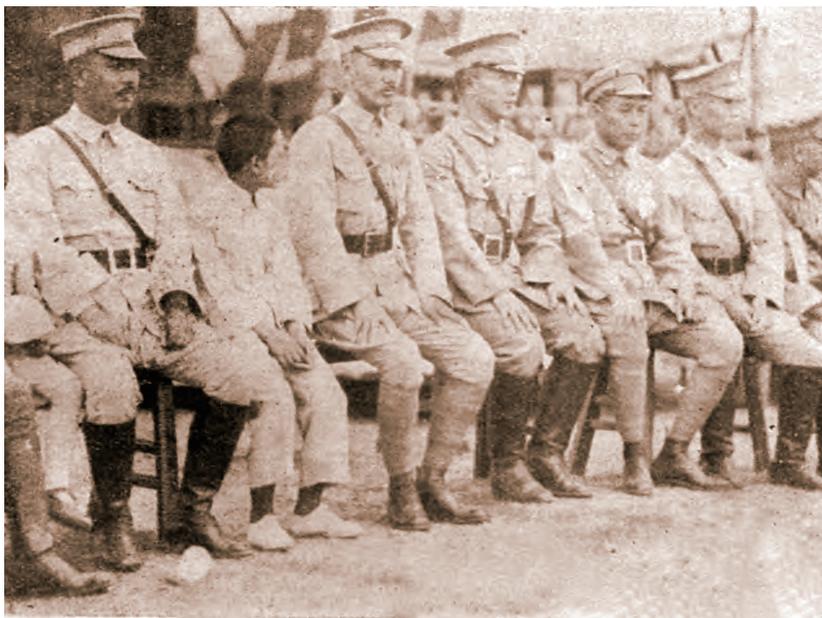
军官团的毕业

军官团名为收容，实为补课。

黄埔前几期学生因授课时间短，一般才几个月，普遍军事素养有限，指挥、参谋作业能力均有欠缺，学生靠悟性、运气在实战中成长，成与不成，多赖运数。故而军官团罗致国内兵学专家百余人为学员讲解高深新颖之军学，每星期授业时间 42 小时，外加自习。

军官团的军事学科课目有战术学、军制学、兵器学、地形学、筑城学、交通学、战史、参谋、勤务、海战学、兵棋马学、经理学等 17 门。军事训练课目分野外演习、射击、马术、劈刺术、体操等 7 门。

二次北伐胜利时，军官团学员警卫校长蒋介石北上，赴北平西山碧云寺祭奠孙中山总理。但凡沿途停留半天以上的，学员就



蒋介石(左三)在军官团毕业式上。

要上课。因此警卫团的官佐中比其他部队多一批教官，学员除武器外多带一些教科书。

甚至在毕业后，蒋介石以该团学员毕业后所负责任繁重，恐平时训练有未尽处，特令政训处再施行一周的小组训练，并敦请胡汉民、戴季陶、邵力子、谭延闿、蔡元培、周鲠生、吴稚晖、冯玉祥、酆悌等名人为军官团讲演，讲演内容有民众运动问题、国防问题、国际问题、黄埔同学在国民革命中的使命问题、唯生史观与唯物史观唯心史观的比较等等。

其中，蔡元培在1929年1月25日为军官团讲演唯生史观。他在唯心唯物之外提出了自认为符合中国国情的唯生主义历史观，宣讲以民生为本的国力发展

之道，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并重的建设之道，“精神与物质二者是合而为一的，要同时并进的”。

据上尉文书股员蒋授谦回忆，在欢迎冯玉祥来团训话时，团部下令不准任何人请假。军官团高级军官佐还在大门列队欢迎，军官在左，军佐在右。当时军官带头站班的是何应钦，军佐领头的是程天放。冯玉祥来时，在离军官团相当远的地方就下车了，蒋介石陪着，慢慢地步行，一边看沿途欢迎他的标语。

1929年2月10日，军官团举行毕业典礼，蒋介石亲临训话。

军官团学员最终毕业897人，主要分发各军任连排长，骑兵队学生大部分到了李家鼎的骑兵旅工作。当时军官团还送方

兴本等38位毕业学员到财政部，分赴各处缉私局候用。军官团的职员、教官予以他调、分发和遣散。

1928年年底，国民政府开始聘请德国军事顾问，首先训练警卫师，这个师的中下级干部100余人，都是从军官团毕业学员中选拔出来的优秀军官，先由德国顾问授以基本的德国式操练，翻译官是骑兵队第1连毕业学生邱儒林。

还有如骑兵队学生蔡仁清毕业后考选留法，入了法国骚姆机械化骑兵专门学校当学员。

军官团严格执行黄埔军校一贯的严格纪律。毕业后，军官团主任冯轶裴报请军政部发函（衡字第1529号），令知其他学校或部队等单位，不得录用军官团开革的数十名学生。学员开革原因有不守团规、品行卑劣、久假不归、辱骂攻击长官，等等。军官团开除学籍或会籍的学员生姓名被清册公布。

真假“失业”者

在当时，黄埔生的身份真金锻造，尤其是黄埔1到6期，将官如云，怎么会失业，找不到工作呢？

他们是真的失业了吗？

中央军校校史稿和国民革命军军官团同学录的记载与收容失业生的说法恰恰相反。校史稿

关于军官团有专门记载，军官团亦出过同学录。两份官方史料一方面明确了军官团学员的身份是黄埔各期毕业生，另一方面记载了军官团的设立初衷。

官方史料是这么记载的：为增进黄埔各期毕业生之军事知识及政治能力，因内难将平、外忧方始，必须再造军事干部人才，以与帝国主义者相周旋，故特设国民革命军军官团，是故所选之学员为黄埔毕业诸同学。

这样的记载根本看不出是因失业而被收容的样子。

另有三份史料，可助于了解“失业”的说法。

一是蒋授谦的回忆文章。其中写道：

除骑兵队有一部分黄埔6期入伍生和一部分招考的学生外，均为黄埔毕业的学生。从第1期到第5期在南京没有工作的，由蒋介石批准，或黄埔同学会的证明，即可向团部报到入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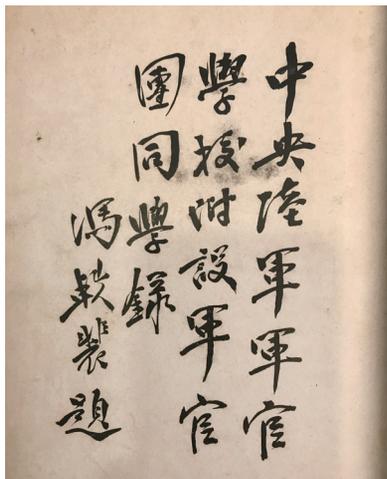
蒋授谦的表述是“没有工作”。

二是蒋介石在军官团和南京中央军校开学典礼上的讲话。他如此说道：

我们设立军官团和军官学校，并不是因为军官太多，要另外办一个机关，来收容一般失业



/ 军官团同学录封面。



/ 军官团同学录封二。

的军官。

对于军官团和军官学校，本没有什么分别，大家统在革命的团体里生活，生命是一样的，生活是共同的，主义是整个的。不过因为军官学校已经筹备完全，不能再增加人数，而教授的方法也略有不同，所以另外组织这个军官团。

军官团的学生，皆是曾在黄埔毕业的，受过相当的革命教育，现在要再纠正从前黄埔学生的幼

稚举动，改革从前不好的习惯，严格的重新训练，确确实实的做成一个有牺牲精神的模范革命军人。

在蒋介石口中，提到了“失业”的字眼。还有一点，蒋介石为何说军官团的黄埔生们“幼稚”，还有“不好的习惯”？

三是1928年1月27日江西省政府的布告（文字第七〇三号）：“准国民革命军军官团有电，为收容改造黄埔各期毕业生无工作者，仰迅速前往检试由。”该布告详细内容如下：

国民革命军军官团蒋团长黄副团长有电开，本团为收容改造黄埔各期毕业生及各分校毕业生之无工作者而设立，现在南京小营炮标开始办公检查试验，定于一月二十六日起开始报名，至二月八日截止，希设法布告各生，以便依期赶到……此布。

这份布告，对军官团的设立原因、学员资历讲得非常明白，军官团是为了收容黄埔各期毕业生及各分校毕业生中的无工作者。

一切豁然开朗。其实最准确的说法，应该是无工作，而非失业。无工作是一种客观状态的描述，无工作是有很多原因的。

军官团学员是黄埔各期毕业生和分校毕业生，亦属无疑。

“失业”的原因

其实“失业”也没什么，蒋介石本人也被“失业”过，而且下野了三次，何况他的学生们！

其实，军官团学员无工作跟蒋介石下野有一定关系。

蒋介石第一次下野在1927年。1927年，正值第一次大革命时期末尾，当时国民革命军北伐统一长江流域，南服底定，奠都金陵，民国由此进入南京国民政府时期。

而此时，国民党经历了国共合作破裂、宁汉分裂又复合。清党的同时，蒋介石、汪精卫、李宗仁等国民党内部派系斗争激烈。斗争的结果，蒋介石下野，然后和宋美龄结婚。

1927年，黄埔军校亦筹迁南京，改名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但因蒋介石下野，南京中央军校筹备了大半年都不能开学上课。

以上事件不断地改变着历史的走向，这一年里国内形势急剧变化，直到1928年元月蒋介石复出，才逐渐明朗。中央军校亦直到蒋介石复出后才与军官团一起开学。

年轻的黄埔学生们被裹挟其中，犹如漩涡中的小水滴，对于形势难以分辨，根本就不由自主。在年轻的黄埔学生心里，北

伐已成，军阀已倒，何去何从，是很迷惑的。

这大概就是蒋介石眼中的“幼稚举动”和“坏习惯”了。

黄埔学生们前途迥异，甚至不乏“失业”的、另择前途的。当时黄埔1到5期已毕业，6期还在学习中。因此除了毕业生“失业”外，6期生也同时失学，有留黄埔的，有去武汉的，有往南京的，队伍乱得很。

1927年11月“张黄事变”后，6期同学纷纷离粤北上。6期骑兵营开抵苏州时，正值蒋校长下野，无人照顾，经费无着。一日三餐，须营长沈振亚自行张罗，沈营长夫人甚至变卖首饰，以充菜金。最终骑兵营被并入军官团。

如此看来，“无工作”确实可以理解。

北伐时跟随蒋介石来南京的黄埔军校学生中，很多人没有了工作，蒋介石下令成立国民革命军军官团，接收这1000多名失业军官。据蒋授谦的回忆，军官团的学员由蒋介石批准或黄埔同学会的证明，即可向团部报到入学。

开办军官团是蒋介石在1928年复出后做的第一件事，他主持了军官团和军校6期的开学典礼。这群无工作的黄埔学生，虽然资历尚浅，普遍为中下级军官，但终于得到了应有的重

视。

重视的原因跟蒋介石第一次下野后的反思有关系。当时，蒋介石曾反思自己有三缺：一缺队伍，二缺干部，三缺情报。军官团的学员一有学历，二有经验，三有北伐劳绩，这些人都是队伍和干部的骨干。

这些黄埔生在军官团毕业后，日经锤炼，最后亦普遍成长为国之干城。比如在抗日战争南京保卫战中壮烈牺牲的少将旅长易安华，就出自军官团，他是黄埔2期宪兵科的学生。

军官团学员的“失业”，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当初1到5期的黄埔军校学生毕业后，很多分发回原籍开展兵运工作，但因地方派系利益而被排斥；又因中央军军官编制不够，故黄埔学生难以尽数安排工作，致使他们一度无工作可干。最终由国民革命军军官团收容再造。

黄埔军校是一个时代的记忆，黄埔学生更是一个时代的缩影。

在那个时代，他们作出了适应那个时代的努力，为自己，亦为国家。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个人的伟大，在历史面前始终是渺小的，惟有那人身上闪现的人性光辉，哪怕是一瞬间的，都值得我们纪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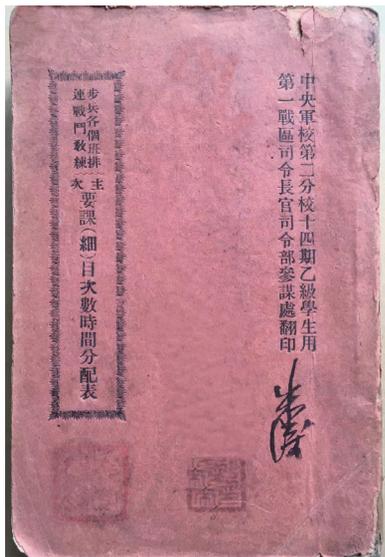
（作者杨灵统为黄埔4期秦友庸外孙）

我珍藏的武冈军分校石印教材

□ 单补生

中国的石印技术来自西方国家。1832年，广州出现第一家中国人开办的石印铺。1876年，上海设立点石斋石印书局，专办一切石印经史子集，以及中外舆图、西文书籍、名人碑帖、画谱、楹联、册页，花色齐全。石印技术成本低，周期短，利润高，比木刻更易于保持字画原貌，细若牛毛，明如犀角。这些优点促使石印业迅速崛起，取代了雕版印刷的主导地位，经营石印者如雨后春笋，终成席卷全国之势。武冈古称都梁，地处湘西南边陲。当地的书籍生产，在清末主要依靠雕版或木活字印刷，直至民国成立才开始有了石印，先后设立专务印刷的石印局，有泰山石印局、文雅石印局、湘汉印刷社等。还有从事产销兼营的书店，如：老经华堂、大同书局、光华书店、湖南文化书社武冈分社、新民印务公司等。

抗战军兴，1938年2月，中央军校第二分校从武汉迁到武冈，设印刷厂于民生工厂（后迁东山村白齐庙），添置铅印机。从此，武冈印刷由木刻石印发展到了铅印，印刷工人也由十几



中央军校第二分校铅印教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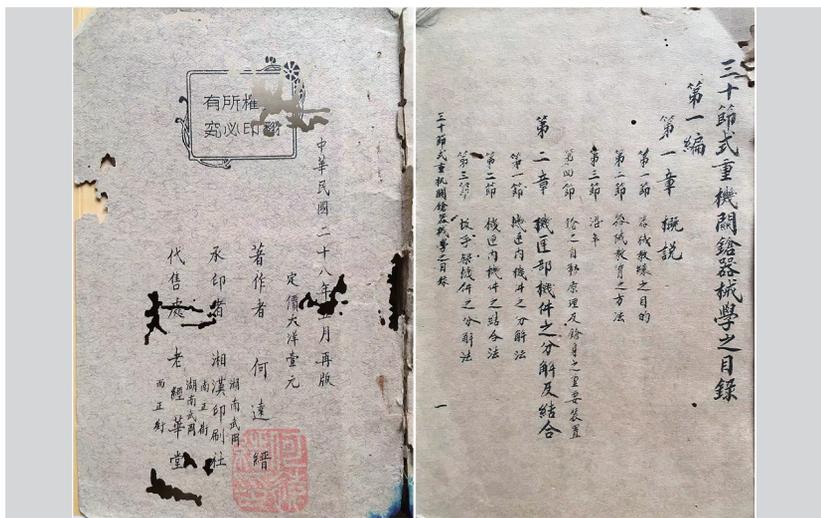
名增加到百余人，给武冈印刷业带来了繁荣。二分校印行铅版校刊《战斗日报》，是武冈出版报纸的开端。据原政治部主任沈沛霖回忆：“该报为四开四版，设有抗战论坛、敌情研究、政训研究、国际问题、照妖镜、人物素描及战地通讯、抗战新歌曲、东南半壁等多种专栏，是一份颇具影响的报纸。总编辑刘尚均，原任二分校大队指导员，与周恩来系天津南开中学同学，参加过北伐战争。其主编《人物素描》专栏期间，撰有《关于周恩来》一文，回顾与周同学历程，发表于1939年12月某日《战斗

日报》上，文中有‘讲到交朋友，或周君的办事情神，却亦不可多得也’等语。1941年2月，该报奉命易名《党军日报》武冈版。”1945年7月，二分校奉令裁撤后，铅印机便留在了武冈，印行《武冈民报》。

武冈军分校从1938年2月开办到1945年10月裁撤，由14期到19期，计办12个学生总队，各期军官训练班队共毕业学员生23000余人。学员生总队的学科教育课目20余种，有步兵操典、射击教范、阵中军务令、野外勤务、筑城教练、兵器学、测图学、日语、三民主义、总理遗嘱等。印制教材数量达几十万册，纸张主要来源于武冈土纸；这是以竹子作原料的土法造纸，始于明朝末年，到了民国年间，得到蓬勃发展，土纸产量兴盛之年可达7万余担，远销平津、沪汉6万余担。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造纸业受到很大的影响，许多造纸户停业。1938年至1945年，因洋纸来源断绝，军校印刷教材，则采购大量土纸，使武冈土纸业又转枯为荣。20世纪20年代，当胶印术兴起后，石印即逐步衰退，到了50年代基本上已



/ 中央军校兵学教官何远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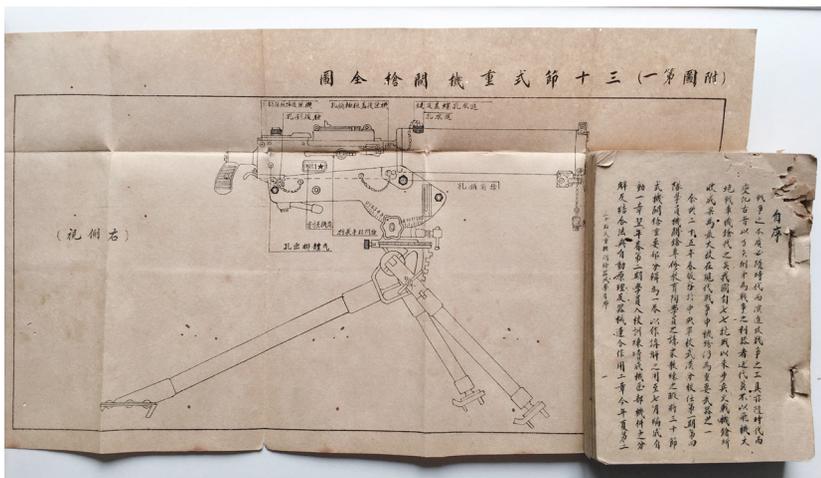
被淘汰。随之，石印书籍受到了收藏者的青睐，尤其稀少版本，如黄埔军校书籍，倍受追捧，笔者亦以淘到两本武冈军分校石印教材为幸。

石印本《三十节式重机关枪器械学》

《三十节式重机关枪器械学》土纸石印，64开，152页，附图15张，1939年11月再版，承印者为湘汉印刷社，由武冈老经华堂代售，定价大洋壹元。

著作者何远缙，别号金甫，湖南郴县人，黄埔6期步科毕业。自序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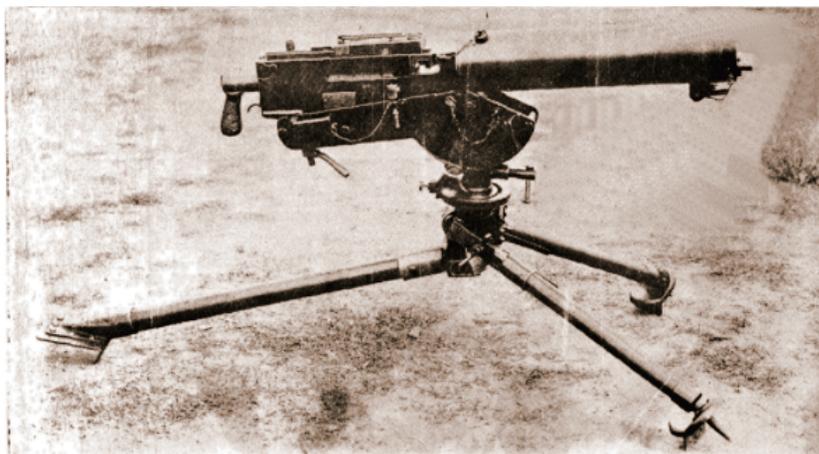
战争之本质必随时代而演进，故战争之工具亦随时代而变化，古昔以万矢剑矛为战争之利器者，近代莫不以飞机、大炮、战车、机枪代之矣！我国自七七抗战以来，步兵火战机枪所



/ 《三十节式重机关枪器械学》书影。

收成果为最大，故在现代战争中机枪仍为重要武器之一。余于二十五年春，服务于中央军校武汉分校，任军士教导总队第一期学员机关枪专修教育；徇学员之请，乘教练之暇，将三十节式机关枪重要部分辑为一卷，以作讲解之用；至七月编成“自动”一章。翌年春，第二期学员入校训练，续成“机匣部件之分解”，及“结合法与自动原理”，及“器械连合作用”二章。今年（1938）

夏，第二分校（原武汉分校所改）十四期乙级学生有机枪专修队之成立，先后任二、五两队机枪专修教职，遂作成“概说”“瞄准”“送弹”“放热”四章，全书至是方告成事。际此敌寇侵略益急，战区愈形扩大，深感是书益觉重要，更以二、五两队学生离校在即，渠等亟愿付梓以为他日教练之参考，余徇其情而喜其志，爰不揣简陋，以全稿付之。惟此书于敌寇侵略中完成参



/ 三十节式重机关枪。



/ 抗战时期，三十节式重机关枪成为战场上压制日军机枪火力的重要武器，发挥了巨大作用。

考材料，不易搜求；加之行动无定，编制内容缺点错误，实所难免；尚希读者加以指正，俾期再版时，得有修正之机会，则幸甚焉！

民国廿七年十一月十八日

何远缙序于湖南武冈军分校。

序中所讲专修教育就是集中学习某种课业。二分校 17 期杨泽涵回忆：

重机关枪与迫击炮为当年步兵营之火力骨干，故在军官教育阶段中，有此二者专修教育。每大队以三个队习重机关枪，一个队习迫击炮。习重机关枪者，使用德造马克沁式或汉造三十节式。由脚架、枪管组合而成，相当笨重。行军操作，不堪其苦。从兵器教育中了解其构造、特性、分解、结合。盲目拆卸乃故障排除重要之一环，在比赛中，个个

动作迅速，干脆利落，限时（约百秒）完成。射击教练是重点课目，包括瞄准（直接间接）、射击（水平、超越）、变换、阵地进入、射界清扫、弹药装填、（弹带）补充、故障排除等。校方要求，射击只能点放，不能连发，是以扣扳机，必须苦练，始能得心应手。

至于该枪名称“三十节式”之由来，还要先从汉阳兵工厂总办杨文恺说起。

杨文恺（1883—1965），字建章，河北永清人，清末秀才，保定陆军速成学堂、日本陆军士官学校 6 期毕业。在日本留学时，与同学孙传芳、卢香亭、周荫人结为金兰之交。杨年长为大哥，孙传芳为二哥，周荫人行三，卢香亭最小。他在革命党人的影响下，加入了中国同盟会。回国后，曾任直隶都督府军务课长，湖北督署军务课长兼汉阳兵工厂总办，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部总参议，北洋政府农商总长。

1921 年 8 月，新任两湖巡阅使吴佩孚批给汉阳兵工厂总办杨文恺 25 万元（吴与杨为保定陆军学堂校友），命其准备步枪 5000 支、马克沁机关枪 100 挺、自来得手枪 200 支及大量弹药，一并送往洛阳。数日后，杨文恺送枪弹于洛阳，适有一名

美国军火商人带来水放热勃朗宁机关枪样品，原枪已拆成零件，此人想把枪密售给当时中国的大军阀，发一笔大财，所以标价很高，要若干万元。吴佩孚征询杨文恺意见，杨文恺说：“可找咱厂的技工把枪样画下来自己仿造，原枪退还给他，再给他点路费，咱就不用买了。”吴佩孚很赞成，于是杨文恺就电令厂内精干技工速来洛阳画图样。这时吴佩孚以私人盗卖军火违反国际法为借口，将美国人拘留在招待所，等技工们将枪样画完，那美国人才获释出境，杨文恺亦率技工等回厂赶造。10月10日这天，吴佩孚到厂视察，适逢仿造的水放热机关枪已制成4挺。吴佩孚当即亲自射击，结果打靶试验效能良好，甚满意，当时就将这种机关枪命名为“三十节式”（取“民国十年十月十日”之意）。又命杨文恺每月制造100挺，分配给直系各军。

三十节式重机枪在仿造美国勃朗宁重机枪基础上，还采用了与德造马克沁重机枪一样的枪管短、后坐自动方式，由于其水冷套由黄铜打造，故又被戏称为“老黄牛”。该枪又改为发射德式毛瑟子弹，在当时属于相当精良的武器。初造时月产量只有几挺，后来随技术改进及工人增加，月产量达百余挺，至1945年抗战胜利前，年产达千

余挺。该机枪口径为7.92毫米，射速每分钟600发，最大射程2000米，采用250发的弹带供弹。该枪既可平射又可对空射击，相比马克沁有减轻重量、增大射角方向角、添设弹带箱等改良，但坚牢之程度，不如马克沁。在抗战时期，它成为战场上压制日军机枪火力的重要武器，发挥了巨大作用。

石印本《日本基本发音法》

《日本基本发音法》土纸石印，64开，132页，附录“中日两国陆军大学历届入学日文试题解答”，及广明日语丛书《怎样审讯俘虏》《战时应用日语》《日语方法授解》《日语文法表解》《假名字典》《日语基本教育挂图》价目表。1941年5月由武冈大同书局印刷，光华书店发行，定价七角。编述者韩广明在“编者的话”中说：

余任职军校，在公余之暇，编辑日语基本教育一书，适授十七期七总队日语课程，即以此为教材，内容纯以日语基本发音及音韵变化为中心，故取名为《日语基本发音法》，其进度由浅入深，由易而难，章节分明，文意清晰，初学颇易领会，兹应多数同学之要求，将讲稿付梓，因时空关系，未克详加编纂，致挂一漏万，在所难免，尚希读者不

吝赐教为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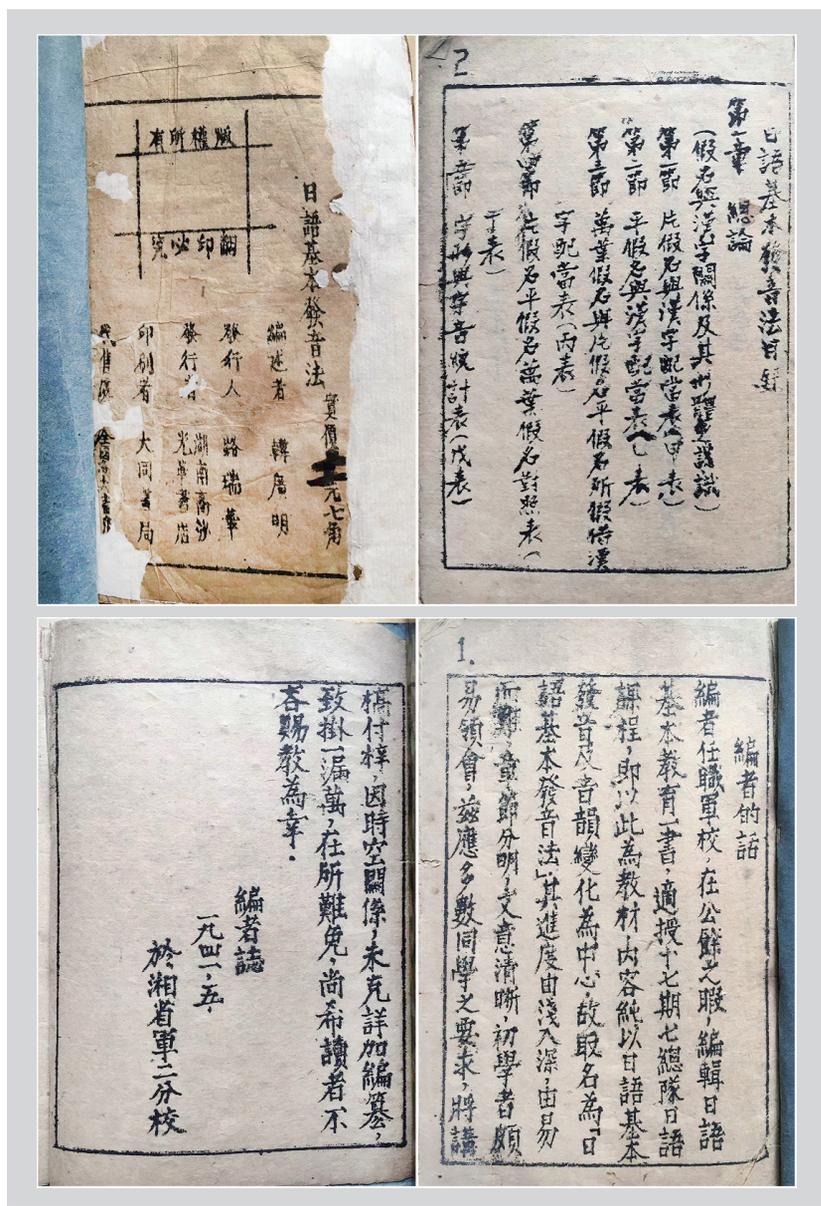
编者志

一九四一年五月于湘省军二分校。

据二分校17期张丕声回忆：

1941年7月，我被分发到上饶第三战区司令长官司令部，在政治部第二科承办人事工作。当时，有一个韩国、台湾义勇总队，驻汪家园（政治部）旁边，约几十人。总队长李承晚（朝鲜人，后任南朝鲜总统），队员中有朝鲜、台湾籍，还有福建籍的旅日归侨，大都精通日语。他们受重庆总政治部领导，在第三战区配合政治部搞抗战日语宣传，还经常组织分队和小组上前线进行日语宣传活动。我与他们接触时，常用日语对话，借以练习提高日语水平，一是为了与日军作战时能派上用场，二是准备投考军官外语班。

军官外语班原为1935年军委会训练总监部为培养军事上的外语人才，在南京开办的军官外国语文补习所。所长吴光杰（1886—1970），字霖泉，安徽肥东人，保定陆军速成学堂、德国柏林工科大学及陆军炮工大学毕业，谙熟德语。第1、2期学员在南京入学。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该所奉命先迁江西



/ 《日本基本发音法》书影。

星子县，后往湖南长沙，改称军官外国语文补习班（简称军官外语班）。1938年迁往广西阳朔。1939年迁至贵州遵义。直至1945年抗战胜利，于同年冬奉令停办。该班10年间，共办6期，计毕业学员400余人。四任班主任均为少将军衔，先后

为吴光杰；咸壮韬，号叔武，河北人；刘震清（步校教育长代），号静轩，河北人；萧仁源，号睿诚，湖南浏阳人。

军官外语班旨在为现役校尉级军官补习外国语文和数理化等课程，提高外语和科技文化水平，培养笔译军事外文书籍及

会话口译能力，并为投考陆军大学及选拔出国留学军事人才做准备，进而从军籍留学生中选派驻外武官或军事代表。入学资格定以曾在各军事学校毕业而充任现职军官者为限。到外语班学习的学员多数是黄埔军校9期以后的毕业生，大部分都是尉官。根据军训部的要求，学员由各部队推荐，然后通过考试择优录取。考试的科目是语文、政治、外语、数理化、史地等。

该班设有英文、日文、德文、法文、俄文5个语种，学制两年，无寒暑假，这是指第4期才开始的学制（外语班迁遵义时，第3期学员尚未毕业），本期自1939年7月入学至1941年7月毕业。在此之前各期学制不尽相同，如第1期有英、法、德3个语科，自1935年11月入学至1936年11月毕业，学制为1年；第2期有英、德、俄3个语种，1937年1月入学至1938年2月毕业，受训时间为1年零1个月；第3期有英、法、德、俄4个语种，自1938年4月入学至1939年7月毕业，受训1年零3个月。受训期间学员带薪带薪，另发伙食费和书籍文具费。

外语班师资力量雄厚，教官以中国人为主，担任讲课的校级教官大多曾留学国外，部分聘自陆军大学或黄埔军校。迁遵义后，又聘请各大学教授为兼

任教官。此外还聘有十几名外籍教师，主要担任会话课，这对外语教学无疑是极为重要的。

开设课程以外语为主，每周授课36课时，进度从字母学起，逐渐从中文授课转为原文授课。内容包括语法、读本、会话、选材及军语等。为了提高学员的学习效果及口语能力，还经常举办外语讲演会，李四光、竺可桢均到班作过演讲。学员中成绩好的，学习半年即可与外国人交谈。此外还开设数理化及战术兵学等课程。1943年增设政训室，推行“军事学校的政治训练”，“使学员信仰三民主义，具备高尚品德与牺牲奋斗精神，成为革命军队之优秀干部”。政训室实施的基本课程有：总理遗教、总裁言行、历史地理、国际政治。补充课程有：外交礼节、国际公法等。

班本部对学员倡导自律管理宽松，是因为学员都是经过严格的军事教育和训练，堂堂正正，而且又在部队服务多年，克己奉公，自知军法无情。学员毕业后一般回原部队，但亦有少数报考陆军大学，或分派驻外使馆当语言军官。时人喻言：“外语班是陆军大学的预备班。”

附：军官外语班教官名录

一、英语教官16名

李今英（女，广东中山人，

美国哈佛女子学院文学硕士，上校主任教官）、陈永清（广东琼山人，美国加州大学文科学士，上校主任教官）、胡正渠（广东人，留美，上校教官）、陈国平（广东人）、周明衡（浙江宁波人）、胡守仁（安徽人）、何问天（福建人）、刘德桢（山东人）、李宝荣。

兼任教官：余坤珊（南京人，美国波士顿大学毕业）、谢文通（广东人，美国加州大学硕士）、黄翼（福建人，美国耶鲁大学博士）。

外籍教官：计报慈（英国籍，神学院毕业，兼任教官）、何佳轍（英国籍，神学院毕业，兼任教官）、聂兰生（美国籍）、刘德兰（美国籍）。

二、法语教官9名

谢修五（四川人）、汪均（安徽人）、许英杰（江苏无锡人）、吴炎。

兼任教官：黄尊生（广东番禺人，法国里昂大学文学博士）、张君川（山东惠民人，清华大学研究院，日本帝大研究院）、方兴国（安徽人，法国密鲁司大学毕业）。

外籍教官：张纳维（法国籍）、谢若芬（比利时籍）。

三、德语教官13名

周则孟（湖南益阳人，德国柏林艺术学院毕业，上校主任教官）、崔凤池（河北人，湖北

方言学堂毕业，上校教官）、李国斌（安徽人）、张传普（浙江人）、李裕之（福建人）、张伟（江苏人）、王位中（福建人）、朱永坤（上海人）。

兼任教官：汤元吉（江苏南通人，德国拜耳大学毕业）、田德望（河北完县人，意大利佛罗伦萨大学文学博士，哥廷根大学研究院）。

外籍教官：德梦铁（拉脱维亚人，里加大学毕业）、雅基（德国籍）、亚龙（俄国籍）。

四、俄语教官11名

林承辉（福建闽侯人，莫斯科第一国立大学毕业，上校教官）、孙祥铎（辽宁人）、向毅安、安世英（辽宁人）、程道济（江苏人）、邓君儒（辽宁人）、何文声（辽宁人）、马吉城（辽宁人）。

俄国籍教官：多马夫人、周玛丽、柏尔泰谷、斯莫甫。

五、日语教官6名（无日籍教官）

陈应庄（湖南耒阳人，日本帝国大学毕业，上校主任教官）、文圣举（四川人，日本帝国大学毕业，上校教官）、傅在源（浙江镇海人，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中校教官）、黄仲图（福建人）、郑雪梅（福建人）。

兼任教官：淳于昌（山东黄县人，日本士官学校步兵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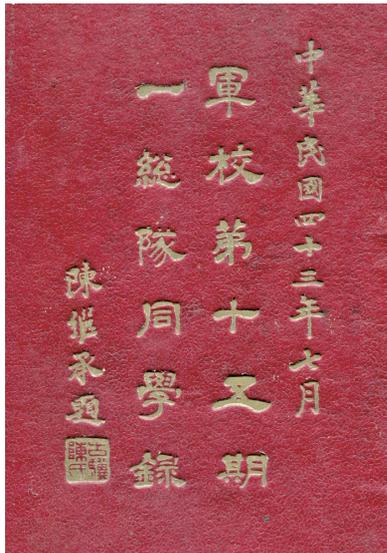
黄埔军校 15 期 1 总队中鲜为人知的空军同学

□于岳

一册“特殊”的黄埔同学录

我收藏有一册《军校第十五期一总队同学录》，它是在 1954 年编印的。这本同学录是台湾版本，收录有去台的 300 余位同学照片。当时我还没有本总队的资料，便随手买了下来。我翻读前言，里面写道：“我总队同学毕业于国步维艰之时，对于足以维系我同学精神上团结之纪念物——同学录，竟告难产，而成为我同学十余年来亘亘难忘之憾事。此其间，唯一足资联系之通讯录……尚能保存者，亦已寥寥无几，于是重印同学录之期望，愈益迫切。”

这段话清楚交代了该总队去台同学编印此录的原委，其中也透露了一个细节：即 15 期 1 总队 1940 年毕业时并没有编印同学录！不过他们也并不是全无文献留存，而是编印了一册通讯录。这有什么不同呢？简单来说，通讯录可以看作同学录的精简版，即不带照片的同学录。因为刊印照片，对于印刷设备和经费的要求高很多，抗战时期（尤其是地处偏僻的各分校）往往因陋就简，于是通讯录开始常见。当然，总会有在编印时把“通讯



/ 黄埔 15 期 1 总队同学录。

录”叫成“同学录”的情况，但从上面那段话也可看出，二者在人们心里还是有着明显区别的。

在此有必要简单叙述一下 15 期 1 总队的大致历程。淞沪会战爆发后，首都南京形势吃紧，黄埔军校奉令西迁。1937 年秋于武汉招收 15 期 1 总队入伍生。1938 年 1 月 1 日正式入伍报到。由于日军兵锋逼近，该总队于 3 月继续溯江西迁，途经宜昌、重庆、璧山（其间在 6 月 6 日正式开始入伍生教育），最终在 10 月 10 日抵达成都。1939 年 1 月 1 日，15 期 1 总队升学，开始分科教育，1940 年 7 月 21 日毕业。

与之有相似经历的 14 期 1、2 总队，以及之后本校 16-19 期各总队均编印有同学录。而 15 期 1 总队迁到成都并稳定下来有近两年时光，却似成为本校中未能成书的唯一一例，这难免让人有些纳闷。我想，抗战进入最为艰苦的相持阶段的“国步维艰”，恐怕就是关键原因所在了。

二百多个被“埋没”的名字

近期，我据这本同学录及湖南省档案馆出版的《黄埔军校同学录》（以下简称湖南版），开始了对本总队官佐、同学姓名的重校工作。在校对完步兵第 1、2 大队的 6 个中队后，我发现下一个队和同学姓名与湖南版对应不上。

这部分同学番号为第 3 大队（下辖 7、8、9 中队），我将湖南版 15 期内容仔细翻阅了一遍，确定其中未收录第 3 大队的信息，也无相关说明。

我随即开始核对统计第 3 大队同学姓名，发现人数总计 272 人。此前，我有数年时间关注空军抗战历史，在整理第 3 大队同学录过程中，我注意到有些名字与黄埔代训的空军入伍生



/ 15期1总队在成都时期的训练照。



/ 蒋介石、何应钦检阅15期1总队。



一致，这让我明白了——第3大队同学就是黄埔代训的空军入伍生！

查考黄埔校史，对代训空军入伍生仅有一条简略记载：1939年夏，本校代训空、交、辘入伍生团之升学教育，计学生293名，编为步兵第3大队。另有一张毕业人数统计表则显示本大队人数为272人，这倒是与我整理统计出的数字完全吻合。

略谈空军入伍生

校史中的记载实在有些“犹抱琵琶半遮面”，为了深入探究这段历史，我耗时一周时间，围绕这200余个名字，把能搜集到的资料尽皆搜集梳理。这番苦功也算是没白费，许多历史脉络与细节逐渐在脑海中清晰、连贯了起来。

先来说说这个空交辘入伍

生团。目前我所见亲历者的回忆中，确有人提到这个名称，但更多则说是代训空军入伍生，此团学生以空军入伍生为主体是毫无疑问（交辘二科学生应该很少，如有，很可能就是上文中两个数字的差额，升学或提前离校后则未再计入）。该团的起源应是1934年于中央陆军军官学校附设的空军入伍生营。中央航空学校自第6期开始，招生后统一先送到南京，在空军入伍生营完成这一阶段入伍训练，然后再到航校学习飞行科目。对此，黄埔收藏家单补生先生在《我珍藏的〈中央陆军军官学校豫籍同学通讯录〉》一文中曾有较详细的叙述。

空军入伍生营亦有自己的期别，如航校第6期入伍生为第1期。但因为入伍只是军校教育的第一个阶段，并非完整的陆军军官教育，这个期别与黄埔、航校的期别都不是一回事。空军入伍生营大概办到第6期（对应航校6—11期入伍生），似在1937年两校西迁后无形终结，具体时间我一时也查不到明确的记载。此后局势愈发动荡，两校越迁越远，这种代训关系虽一度还存在，但模式或说番号却有所变化。

不过无论其他怎么变，有一点是不曾变的，即空军入伍生始终是由中央航校（1938年改称



/ 空官同学在美国受训。

空军军官学校，以下简称空官）自主招收的。以15期1总队第3大队的代训空军入伍生来说，当时招生便是用空官12期的名义。另由于空军招收飞行生对于身体条件的要求极为严苛，往往是百里挑一，因此招生“网点”似也较多。如本期著名的空军英烈张大飞，是1937年11月先在武汉入的黄埔15期入伍生团，后因条件优秀再转入空军；如今仍健在的飞虎队老英雄陈炳靖回忆是在杭州报考的；曾驾机参加开国大典的邓仲卿是1937年底在成都报考，然后乘船出川；后来成为知名音乐家的向大勋，则是1937年8月在长沙报考（5000多人仅录取30多人）。最终，这些同学汇集于南昌黎家山——空交输入伍生团所在地，

正式开始入伍训练。

到了1938年，随着战局的变化，空交输入伍生团也被迫迁移，他们途经长沙、常德、重庆、新都，最后到达成都北较场。从轨迹上来看，该团在抵达成都前，与15期1总队并无交集。此时我国空军经过一年的血拼，家底已损失殆尽，由于飞机与汽油的严重短缺，训练很难正常开展，导致前面空官11期学长迟迟未能毕业。于是这些空官12期入伍生到成都后，只好先继续在黄埔接受步科训练，番号也改叙为黄埔15期1总队3大队。空官从黄埔生中直接招收学生很常见，但像这样整期整队同学同时拥有一个黄埔学籍，却是很罕见的一例。

因升学进度一拖再拖，空

官12期入伍生（即黄埔15期1总队3大队）在黄埔一待就是一年多。张义声是黄埔14期6总队毕业生，1939年1月就毕业了，毕业后正赶上空官招生，全总队几百人报名，最后只有三人通过体检，也成为空官12期的一员。由于他们已经在黄埔毕业，无需再次回炉，能做的就只有等待这些学弟们了。直到1939年6月，空官12期同学近300人（包括15期1总队3大队与张义声这些从另外渠道招收的），才从成都集合出发前往昆明的空军军官学校。

这里其实还有一个细节值得探讨。这些空军同学离开黄埔时，距15期1总队毕业尚有一年，他们所接受的陆军军官教育应该并不完整，此时应该也领不到黄埔毕业证。许多人回忆说是在1939年夏黄埔15期毕业后前往空官，这个说法就颇值得推敲。也许此处所指的毕业只是入伍生教育阶段的完结，而非黄埔15期正式的毕业，这可能也是湖南版同学录未将其收录的原因所在。但不管如何，他们有这一段黄埔受训经历是毫无疑问的，因此也都认可他们是黄埔15期生。

碧血长空

空军军官学校的飞行训练分为初、中、高级三个阶段。空

官 12 期同学在昆明报道后，随即马不停蹄继续西行 300 公里，抵达云南驿机场，正式开始了初级飞行训练。在这里，同学们的命运也开始发生转折，分别走向了不同的人生轨迹。

当时空官采用美式教练方法，要求非常严格，淘汰率也极高。至于学生淘汰与否，大权完全掌握在美国顾问手中，哪怕飞得很好但身体动作不够协调的也会被淘汰。待到初级训练结业时，近 300 位同学仅剩 120 余人能升入中级。从正面角度看待这件事，最终能够学成毕业的人都是“精英中的精英”（张义声语）。而若从反面角度来说，如此高的淘汰率和近乎生硬冷酷的教学方式，在当时也的确引起许多同学的不满。比如受地下党委派进入空官、后来成为解放军空军少将的吴恺，就因为同学打抱不平而停飞，最后愤然退学。而更多被淘汰的同学，要么转入空军诸如地勤、领航员、轰炸员等其他岗位，要么转行陆军，亦或干脆离开军队另谋发展。后来在中航飞越驼峰航线的飞行员中，也能见到他们的身影（陈达礼、邓重煌、梁汉华等人）。

1940 年，空官 12 期剩下的百余位同学转往昆明杨林机场继续中级飞行训练（空官校史一说中级训练在蒙自），年底结业后到巫家坝机场升入高级。然而

就在不久前的璧山空战，日本新研制出的零式战斗机投入战场，由于零式性能遥遥领先，我空军措手不及，被打得毫无还手之力，一战被击落 13 架，成为空军抗战史上最惨痛的一页。从这时开始直到飞虎队出现的一年多时间，制空权完全丧失，堪称中国空军最为黑暗的时刻。飞行员们能做的只有“跑警报”，即警报一响，赶紧驾机跑路避战，以保存所剩无几的微薄实力。当时的昆明是日机轰炸的重要目标之一，官校也自难幸免，飞行教育是很难正常开展了。

1941 年初，美国对同盟国的《租借法案》生效，空官同学得以前往美国接受飞行训练，12 期因此受惠，成为我国赴美受训的第一批空军飞行生（抗战时期赴美受训的空官同学共 7 批，1—3 批中均有 12 期同学）。只是他们本已在国内开始高级飞行训练，赴美后又得从初级学起。首批赴美飞行生于 1942 年 1 月毕业，此时距他们投考军校已足有 4 年！据目前所见资料，空官 12 期升入高级班者约 105 人，赴美受训者有 98 人（其中 5 人失事殉学，2 人被淘汰），最终毕业生应不足百人，而已知抗战时期殉国的有 30 余人。

这些空军健儿辗转回国后，立即投入对日作战，成为中国空军的生力军。曾代表我国参加

柏林奥运会的运动健将符保卢，1943 年在接受新机型训练时不幸殉职。身经百战的张大飞后来因功升至第 3 大队第 28 中队中尉分队长，1945 年 5 月，他仿佛在冥冥之中预见了自己的死亡，在平静地给齐振一（齐邦媛的兄长）写下一封诀别信后驾机出战，于河南信阳上空英勇牺牲。陈炳靖，与符保卢、张大飞都属于 12 期最早学成归国的一批学员，1943 年，他被秘密调往美国第 14 航空队（原飞虎队改编，陈纳德任司令）参加作战，同年 10 月在越南上空受伤跳伞，不幸被俘，在狱中度过了苦不堪言的 21 个月，直到抗战胜利后才重获自由，但由于受的伤未得到及时救治而成为永久性损伤，从此不能重返蓝天。另一条“战线”上，未能在空军一展长才的邓重煌，后来成为中国航空公司的一名飞行员，他夜以继日地往返飞越驼峰航线，冒着随时要牺牲生命的危险，为国家运输急需的战略物资，每一次出发，都有可能是最后的任务……

另外还有太多的名字：陈鸿铨、邢海帆、邓仲卿、黄煦、冷培澍、陈达礼等等，这些功勋卓越的飞行员的事迹不及再此详述。名单中的每一位，都是慷慨赴国难的热血男儿，都是抗战之脊梁！看完这一段段血泪史，发黄的故纸中这一张张年

轻的面容，仿佛全都鲜活了起来。掩卷长思，我不禁心潮澎湃。

（附录）黄埔军校 15 期 1 总队代训空军军官学校 12 期入伍生名录：

第 7 队：92 人

任重远（辽宁庄河）孔宪邦（云南保山）史美宗（江苏溧阳）齐书剑（河北蠡县）

陈达礼（广东东莞）黄震中（河南杞县）孙明远（河北吴桥）罗世钊（贵州贵阳）

陈烈浩（广东揭阳）叶吉兰（广东合浦）陈焕昀（贵州大定）戴华（四川古蔺）

王启元（湖南醴陵）赵松岩（河北蠡县）郭继仪（云南昆明）朱登谦（湖南慈利）

张亚岗（浙江萧山）蔡以煦（湖南湘潭）陈鼎（湖南长沙）马承绪（安徽怀远）

余绳楨（安徽休宁）郑朝楠（四川资阳）赵圣题（河南西平）王德敏（河北天津）

许应蛟（浙江萧山）杜文琪（山东荣成）黄干存（广东廉江）张家骅（江苏南京）

毛昭品（浙江奉化）谭兆明（广东开平）林金玉（广东中山）万禄（江西余江）

杨枢（河北武清）朱文华（江苏上海）赵凭顺（江苏铜山）刘超（江苏靖江）

苏英海（广东博罗）刘树钊（广东中山）刘继荣（云南祥云）张天佶（湖北云梦）

李光华（浙江镇海）黎诗和（广东梅县）阳名湘（湖南醴陵）李鸿龄（广东新会）

魏华忠（湖北孝感）唐机（广西桂平）萧道敏（湖北武昌）黄继志（广东新会）

李保刚（河北束鹿）钟卓群（广东龙川）张经耀（广东番禺）陈鸿钧（河北天津）

梁汉华（广东番禺）周天民（河北安新）王秉琳（山东安丘）孙焕明（浙江杭县）

叶火生（广东合浦）黄受勋（广东台山）杨希平（浙江嘉兴）郑之良（江苏上海）

卢培元（贵州贵阳）吴琴书（江苏铜山）刘冠臣（河北束鹿）黄寿仁（广东博罗）

刘世锴（云南宣威）缪蔚和（云南宣威）李洪范（河南镇平）杨基昊（湖北松滋）

刘寿廷（湖南新化）蔡长安（广东顺德）江汉荫（湖北汉川）萧传贤（湖南醴陵）

赵之骏（云南弥勒）蒋景福（河南商丘）莫仲荣（广东番禺）冷培澍（山东临朐）

黄晋（湖南郴县）杨端孙（湖南长沙）丁朴（云南楚雄）杨秀峰（贵州思南）

杨应求（广东潮安）邓季栋（湖北黄陂）吴恺（河北北平）胡

曦光（湖北武昌）

陈士群（广东五华）汪梦泉（四川简阳）毛友桂（云南个旧）符保卢（哈尔滨）

钟洪九（福建古田）李承武（云南昆明）张秉康（广东梅县）徐作诘（浙江鄞县）

注：许应蛟后更名为许志飞、刘超后更名为刘磬超、陈鸿钧后更名为陈鸿铨

第 8 队：89 人

许玉昆（山东定陶）吴克成（江苏武进）郭英祥（广东番禺）江汉（湖南安化）

李正杞（四川开江）王柏梁（浙江奉化）金守信（河北东明）刘纯溪（河南湘阴）

张家冀（湖南醴陵）史葳林（湖南长沙）向一学（湖南平江）黄伯英（河南陈留）

李荫阶（辽宁海城）韦国恩（广西都安）罗理纯（湖南长沙）秦玉昶（山东济南）

魏祖圣（江苏吴县）冀延庆（辽宁沈阳）操廉（安徽怀宁）刘子中（湖北黄梅）

屈用超（四川仁寿）林世庆（广东梅县）梁建中（河南新蔡）张由桐（江苏江阴）

杨金海（广东中山）陈炳靖（福建莆田）陈炳炽（广东新会）赵和桐（山东泰安）

汤关振（广东新会）何国端（广东顺德）江道汉（江西余干）张云祥（上海市）

杨彬扬(河南宁陵) 江慰曾
(江苏南通) 阎钦藻(河南项城)
宋锡斌(南京市)

宋维泰(河南沁阳) 陶友槐
(江西南昌) 曹福林(湖南长沙)
朱鸿英(江苏吴县)

张颖生(广东五华) 余耀湘
(湖南长沙) 史同心(陕西华阳)
李志远(江西余干)

乐以本(四川芦山) 邓仲卿
(四川合川) 邓继华(湖南汉寿)
段克恢(湖南益阳)

雷启荣(四川潼南) 赵森岭
(河南新乡) 吕云华(四川宜宾)
萧立言(四川乐至)

梁志骅(广东三水) 邓重煌
(广东番禺) 陆国忠(广东鹤山)
黄宜德(广东新会)

欧阳伟(湖南安仁) 李宪东
(四川邛崃) 刘景春(湖南醴陵)
陈德毓(湖北黄陂)

杨树勋(湖南长沙) 杨明忍
(河北通县) 汪永昌(安徽盱眙)
钟克超(湖南桃源)

万克庄(湖南浏阳) 罗坚榆
(湖南浏阳) 柳述之(湖南长沙)
董志先(湖南湘潭)

邱公适(四川巴县) 李实芳
(湖南平江) 钟柱石(广东海丰)
冯诒戡(广东鹤山)

蒋传琛(广西修仁) 孙祖耀
(江西崇仁) 林尚谭(广东潮州)
冯德镛(湖北应城)

唐崇杰(江苏吴县) 杨少华
(福建闽侯) 段先元(江西永新)

雷震阳(湖北应山)
周裁浚(广东琼山) 梁深
(广东信宜) 董汝泉(广东番禺)

彭凌(湖南长沙)
袁天成(广东东莞) 韦寿铭
(广东中山) 戴维椿(安徽无为)

张长源(安徽怀宁)
朱振武(四川资阳)
注: 操廉应为操式鹏

第9队: 91人

蒋彤(山东曲阜) 谢云鹏
(江苏江宁) 顾乃润(江苏镇江)
方谷(云南昆明)

詹子潭(湖南益阳) 周育毅
(湖南长沙) 王梧岗(河南陈留)
田金(云南昆明)

周颀(江苏涟水) 黄鹏生
(湖北汉川) 袁豪(湖北黄陂) 郑
宏济(江苏上海)

曾子澄(广东南海) 沈昌德
(江苏嘉定) 李竞仲(湖南湘乡)
陈文轩(浙江婺州)

刘琪(福建闽侯) 张金辂
(河南安阳) 李立勋(云南鹤庆)
陈锡铭(广东高要)

刘家骐(安徽桐城) 许仁宏
(云南弥渡) 龙显华(云南石屏)
周励松(广东开平)

谭哲(广东阳江) 张永康
(广西桂林) 黄迅强(广东广州)
李锦章(河南巩县)

彭忠岳(湖南蓝山) 卜宗锡
(湖南安乡) 陈芳镠(湖南醴陵)
郑兆民(广东中山)

刘树声(吉林宾县) 孙冠民

(云南石屏) 张邦俊(云南思茅)
刘启琅(湖南安化)

张雨田(河北丰润) 朱松根
(广东台山) 向大勋(湖南芷江)
刘立乾(湖南衡山)

张时中(云南澄江) 丁敦炯
(湖北孝感) 李廷选(河南温县)
钱定渭(贵州贵阳)

唐绍晋(云南景东) 凌鼎勋
(江苏吴江) 丁武康(浙江杭州)
诸尚维(江苏上海)

陈星奎(湖南桂东) 赵光斗
(云南东川) 林国球(广东梅县)
周兆麟(广东南海)

王仁元(湖南慈利) 黄柱芳
(广西容县) 杨华生(湖南黔阳)
郭鹤翔(河北宁晋)

谭显章(广东英德) 张治平
(云南西畴) 李永康(广东南海)
周盛霖(云南巧家)

吴刚(安徽) 朱启利(浙江
平湖) 王伯瑜(浙江杭州) 郑宗
悟(福建安溪)

萧佑之(广东新会) 廖潭清
(广东惠州) 张大飞(辽宁营口)
秦传家(浙江绍兴)

杨兴泉(湖北钟祥) 唐克斐
(广东兴宁) 黄炳训(福建厦门)
吴耀焜(河南固始)

蔡以坚(浙江诸暨) 吴文英
(甘肃凉州) 董中达(辽宁营口)
陈云程(河南西平)

黄崇庚(云南建水) 陈地塔
(福建同安) 王金笃(陕西西安)
张松龄(广西桂林)



1926年4月14日,恽代英到黄埔军校发表题为《革命之障碍》讲演

□ 贾晓明

1926年4月14日,恽代英到黄埔军校发表题为《革命之障碍》讲演,认为主观障碍是革命党员自己的缺点,觉悟程度、组织程度和团结等方面问题,客观方面是反革命势力利用各种手段进行破坏和迫害。先要改正自己的错误,然后才能扫除客观障碍。恽代英的讲演,得到黄埔师生的广泛好评。

恽代英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青年运动领导人之一,在黄埔军校任政治教官期间,他继承和发展了周恩来的军队政治思想工作,先后编写、撰写了大批教材、论文阐发军队建设等问题,对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论述尤为突出,其思想政治工作理论为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工作理论的形成和创建人民军队的思想政治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关于恽代英与黄埔军校的事迹在《黄埔》杂志已有详细研究,在这里不再赘述,现仅将恽代英参与的重大历史事件,略摘几则以记之。

早年创建互助社

1913年,恽代英入武昌中华大学预科班学习,1915年进入该校文科中国哲学系学习。这一年,陈独秀创办了《新青年》,受其影响,恽代英积极在武汉地区传播新思想、新文化。

恽代英十分重视社团在新思想传播中的作用。1917年10月8日,恽代英和梁绍文、冼震、黄负生开会,决定成立一个以“砥砺品行、帮助学业、群策群力、自助助人”为宗旨的小团体——互助社。这是“湖北武汉地区第一个进步团体,它既是一个青年思想修养的团体,也是一个学习和传播新文化新思想的团体”。该社主张“本牺牲精神,尽天赋之本能,合群策群力拒社会之恶,倡社会之善,则庶几乎社会日进于改善矣”,把“伺候国家,伺候社会”作为互助社发展的目标和任务,不久便吸引了一批思想活跃、要求进步

的中学生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早期活动人物林育南、刘仁静等人也是该组织成员。

恽代英要求互助社成员加强自我教育,培养集体精神,为社员们制订了严格的自修和服务制度,其中包括不谈人过失、不失信、不恶待人、不作无益事、不浪费、不轻狂、不染恶嗜好、不骄矜的“戒约八则”。互助社每天开会,社友自我反省,检查自己是否做到不嫖、不赌、不吸烟、不饮酒、不谎言、不夹带等。

在恽代英的带领下,互助社成员每天下午放学后开半小时(后来延长至一小时)的会。会议开始时朗诵《互励文》(大意是说军阀横行,社会腐败,我们应该进德修业,力图挽救才好)。会议开始后,每位社员报告自己的“一日经过”——自己在这一天里做了些什么好事情,做了些什么不好的事情,说过一些什么不好的话,思想上有做些什么样的活动,

周钦德(浙江上虞) 荆好玉(山西平陆) 徐滚(辽宁海城) 冯献辉(四川成都)

曲士杰(山东德县) 李霖章(广东梅县) 徐岳(湖南新宁) 何光汉(广东番禺)

吴权(江西永新) 张之宜(河南新乡) 刘春荣(湖南长沙)



等等；然后互相提提意见，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

互助社还提出“交朋友，帮助朋友”的口号，以助人为乐。恽代英以身作则，如社员中只要有人提出需要补习功课的，他有求必应。因为互助社提倡助人为乐，所以社员常给人解释结社的益处，在开会时也欢迎社员以外人士参观。一些人参观后，看到了立会的益处，因而提出要求加入互助社。

恽代英极力反对学生闭门读书，不关心国家大事，互助社经常利用星期天、假日组织大家到城外游览、旅行和参观，大家在恽代英的带领下，一起爬山，登高远眺，舒展胸怀，锻炼身体和意志。

1918年6月，恽代英在中华大学毕业后应聘担任中华大学附中教务主任。在恽代英的倡导下，互助社在中华大学门口办起了“启智图书室”，许多青年学生来这里借阅宣传新思想的刊物。恽代英为了让青年学生了解世界最新政治潮流、思想潮流，在启智图书馆的基础上又组织了书报代售部，向武汉地区广大青年推销进步书刊。恽代英还定期和社员研讨国事，如中国的出路、社会的改造、知识分子的出路和青年学生的前途等问题，对社员进行新道德的教育。在恽代英的谆谆

教诲下，到五四运动前夕，“多数社员已经有了改造社会，建立新国家的伟大抱负”。

1918年，为反对北洋政府和日本帝国主义签订丧权辱国的《共同防敌军事协定》，恽代英和互助社社员立即行动起来，油印传单，举行抗议活动，揭露帝国主义侵略罪行和反动军阀卖国的勾当，呼吁民众奋起反抗。互助社迅速成为武汉地区反帝爱国的骨干力量，其活动产生了很大影响，也吸引了更多追求真理的青年加入进来。在互助社成员的努力下，武汉学生中的进步小团体也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

五四运动期间，恽代英着手创办新的社团，以适应日益变化的社会局势。1919年12月，恽代英受中华大学附中创办的书报代售部的启发，同互助社的朋友们商量后，决定把互相社、辅仁社、黄社、仁社、日新社、健学会等进步团体组织起来，组成一个新的联合社团。1920年，恽代英辞去中华大学附中部主任的职务，和林育南等互助社社员筹办利群书社。

1920年2月，利群书社正式营业。不久，互助社还出版了小册子《互助》。《互助》刊载了恽代英写的《未来之梦》《共同生活的社会服务》两篇文章以及社员们试验新生活和开展“社会大辩论”的通信，对互助社的工作

进行了总结。该刊物共印刷1000册，被社员带到全国各地传播，引起很大反响。

1920年夏天，互助社根据恽代英的指示正式解散，其大部分成员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

在广州黄埔主抓政治教育

1925年年底，恽代英从上海来到广州，参加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1926年1月，在国民党“二大”上，恽代英和李大钊、林伯渠等7名共产党员一起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5月，中国共产党为加强在黄埔军校中的领导力量，派恽代英担任该校的政治主任教官兼中共党团书记，“督同各教官负有实施政治教育全部大权”。军校中许多来自四川、湖北、湖南、河南、上海等地的青年，有的以前直接受过恽代英的教育，有的受过其主编的《中国青年》的影响，所以恽代英一进军校，就无形中扩大了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的力量。

恽代英继承和发展了周恩来的军队政治思想工作思想，他在黄埔军校期间先后编写、撰写了《政治学概论》《国民革命》《国民党重要宣言训令之研究》《军队中政治工作的方法》等教材、论文，就军队的建设问题等进行了重要论述。其中由他起草刊载在《黄埔日刊》上的《修正中央军事政

治学校政治教育大纲草案》(以下简称《大纲》)一文对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论述尤为突出。在《大纲》的总纲中,恽代英认为军队的学生应该依据十个条件来计划施行政治训练,这些训练方法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服从党、服从领袖、服从党章和军纪。

在恽代英等的努力下,黄埔军校特设政治科,以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为政治教官,由恽代英主抓这个科的工作。政治科的教员和学生多数是共产党员和团员,学生毕业之后大多担任军中各级党代表。经恽代英的努力,军校形成了较完整的政治教育体系。此外,他还负责入伍生部的政治教育工作,以及步、炮、工、辎四科的政治课程和政治教育工作。为了进一步加强政治教育工作,恽代英还积极支持学员举办“政治讲座会”,和萧楚女、张秋人等政治教官经常参加学员讨论会。会上,学员可以自由讨论、自由发表意见,或提出疑问互答,或请政治教官解答。对学员提出的问题,恽代英或立即解答,或在课堂上解答,或在《黄埔日刊》等校刊上解答。后来军校将讨论会的问答编成《政治问答集》,长达十余万言,在军校师生中影响很大。

恽代英的教学方式灵活,不仅可使学员较为快速地理解和接受科学知识,提升政治素养,更

使得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方针得以进一步传播。恽代英讲的课很受军校学生欢迎,听者如潮。由于听者太多,他讲课经常不在教室里讲,而是在操场上讲。中间放一张桌子,学生在四边围着,军官喊一声坐下,大家都安静地坐下来,恽代英就登上桌子开讲。恽代英声音洪亮,但口音很重,为了把话讲清楚,在讲课时常常不厌其烦地重复说话,这样一讲就是几个钟头。他的讲话“旁征博引而又深入浅出,使人感到通俗易懂、生动活泼、幽默风趣,确有真知灼见”,学生们听得全神贯注,尽管操场上骄阳似火,但大家丝毫不觉得热。“偶尔军官忘了让大家坐下,学生们一站几个钟头,也都聚精会神地听完。”

恽代英在军校教的课程先后有《阶级斗争》《社会发展史》《帝国主义侵华史》《政治常识》《社会科学概论》等,这些课目都包含马克思主义的内容。当时正值中山舰事件发生后不久,蒋介石在军校加紧排挤共产党员。恽代英深知斗争必须讲究策略,于是与蒋介石等进行了有理、有节的斗争——将课程换了名称——比如他讲《社会科学概论》,实际上是历史唯物论与辩证唯物主义的综合科学;再如讲《政治常识》,课的名称对外叫“三民主义”,即把课程的重心放在对待

孙中山三大政策的态度问题上。这样,不仅共产党员拥护,国民党左派也支持,中间派也觉得有道理,搞得蒋介石一时也没有什么办法。

蒋介石知道恽代英是个人才,想拉拢他,经常派副官给恽代英送点好吃的,“以示关怀”,但发现恽代英生活十分简朴,且无任何不良嗜好。每月薪金的大部分会作为党费上交中共粤区区委,剩下的钱,在每次开完学委会后,就用于请参会者吃饭。同时,他还搞“经济公开”——他的钱都放在抽屉里,也不上锁,别人有困难,可随时拉开抽屉自取。起初,恽代英对蒋介石送来的东西一概拒收,后来他见有的学生生活很艰苦,就把蒋介石送来的罐头、巧克力拿去送给学生。

11月26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二次临时会议决定国民政府暨国民党中央党部从广州迁往武汉。恽代英奉令到中央军校政治科担任领导工作。12月中旬,他将工作交给孙炳文后,便告别了黄埔军校,踏上了去武汉的路途。

参与领导广州起义

1927年10月15日,中共南方局与广东省委召开联席会议,改组广东省委,恽代英任南方局委员,当选为广东省委委员、常委,任宣传部长,主编省委机关

报《红旗》半周刊。11月17日，中央临时政治局通过了由苏兆征、张太雷起草的《中央对广东目前政治任务决议案》，恽代英在《红旗》上发表《冬防》，号召工农兵行动起来，在广州举行暴动。

11月26日，中共广东省委在广州召开常委会议，讨论中央《决议案》，决定立即举行暴动，成立以省委书记张太雷为总指挥的起义指挥部，并根据中共中央训令，于28日发表《中国共产党广东省委员会号召暴动宣言》。张太雷又即去函留在香港主持省委日常工作的恽代英等汇报起义准备情况，恽代英立即原文照录作为省委报告转报中央。

根据省委决定，恽代英于12月初从香港到广州，直接参加起义的组织发动工作。在此前后，正值广州爆发了国民党军阀的派系斗争——张发奎将部队主力用于和李济深、黄绍竑的战斗，广州兵力空虚。他害怕共产党人乘势起义，就多次派代表乞求共产党人和他合作，“保护广州”。恽代英毅然只身前往和张发奎见面，调查情况，却发现张发奎毫无合作诚意，“仍逮捕我们同志及工友”，于是正确判断“这只不过是他的缓兵诡计”，在将情况向组织汇报后，和同志们继续着手准备起义。

几天后，起义指挥部成员在广州召开秘密会议，讨论决定了

起义的力量部署和起义日期，提出了广州苏维埃组成人员名单等重要问题。“恽代英虽然深度近视，写字的时候几乎胸口顶住桌子，头和笔杆差不多挨着了，但是他写得非常快，而且流利。有时候他停下笔来，挪动一下眼镜，看看发言的人，也插几句。”恽代英宣读了事先草拟的政纲、宣言、告示，等等，由会议逐项研究通过。会后，恽代英随即安排文告付印，部署宣传工作。

12月11日凌晨，恽代英随同张太雷、叶挺等前往起义部队教导团做动员讲话。教导团是原武汉黄埔军校师生改编的，恽代英是该校政治总教官。当恽代英等突然出现时，教导团的干部战士为之振奋。在张太雷作了动员讲话后，恽代英接着说：“我们要坚决发扬中央独立师的战斗精神，摧毁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统治，建立自己的武装和工农兵政府。”3时30分，震撼中外的广州起义爆发了。起义军民经过4个多小时的战斗，消灭了珠江以北市区的国民党军、保安队和警察武装。

天一亮，恽代英来到被起义部队夺取的公安局，和起义领导者在大厅举行了广州市苏维埃政府成员和工农兵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讨论通过了广州一切政权属于工人、农民、兵士，以及建立工农红军等十项决议，并

决定发表《广州苏维埃政府告民众》《广州苏维埃宣言》等文告，公布革命政纲，宣告广州苏维埃政府正式成立，恽代英任苏维埃政府秘书长。

恽代英实际担负了苏维埃政府的一切具体工作。他组织由青年学生和妇女组成的宣传队，巡回各马路，高呼口号和散发传单……“永不感觉疲劳似地工作”。12日，敌援军从各地赶到，向起义军反扑。恽代英临危不惧，依然沉着镇静地指挥战斗。随着观音山阵地失陷、张太雷在前线牺牲，恽代英认识到起义部队无法再坚持下去了。为了保存革命火种，经他和其他起义指挥部成员研究决定，命战士们突围前往海陆丰，和彭湃指挥的革命军会合。直到深夜，恽代英等人才离开苏维埃政府办公大楼。13日上午，恽代英随最后撤退的起义军撤出广州。

在起义遭到严重失败的危急时刻，恽代英临危不惧，沉着从容，他向身边的同志说：“挫折是不可避免的，但要经得起挫折。古话说秀才造反，三年不成。我们下决心造30年反，决不会一事不成。我们下决心干30年革命，也还不过50岁。接着搞30年建设，也不过80岁。我们的希望，我们的理想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恐怕也实现了。那时世界多么美妙。”

震惊世界的莫斯科保卫战

□ 王晓平

1941年6月22日，纳粹德国撕毁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向苏联发动突然袭击。战争初期，在德军“闪电战”的打击下，苏军遭受巨大损失，到9月底，在苏德战场上，德军北方集团军群封锁了列宁格勒，南方集团军群攻占了基辅，中央集团军群占领了距莫斯科仅三四百公里的斯摩棱斯克，打开了通向莫斯科的大门。

莫斯科是苏联首都，全国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中心，也是铁路交通枢纽，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按照“巴巴罗莎”计划，德军最终目标是于1941年年底前攻占莫斯科，结束对苏战争。为此，德军统帅部发动了代号为“台风”的进攻战役，决定以装甲集群分别从杜霍夫希纳、罗斯拉夫尔、绍斯特卡地域向东和东北方向实施突击，割裂苏军防御，围歼苏军主力于维亚济马和布良斯克地区，尔后以快速集团从南北两面包围莫斯科，同时以步兵兵团从正面进攻，在冬季到来前攻占莫斯科。为此，德军统帅部投入了78个师，共180万人，各种火炮1.4万门，坦克1700辆，飞机1390架。希特勒狂妄地给德

军前线部队下达命令：拒绝来自莫斯科的投降，并扬言要于11月7日在莫斯科红场上检阅他的法西斯军队。苏军最高统帅部大本营判定莫斯科方向为德军主攻方向，决心保卫莫斯科。在战争初期，由于希特勒坚持中央集团军群在占领斯摩棱斯克后向北围攻列宁格勒，向南进攻乌克兰，导致了德军在中线停止了进攻，直到9月30日才将目标瞄准莫斯科，这实际上为苏联巩固莫斯科附近的防线赢得了宝贵时间。为此，苏军统帅部集中了全部作战兵力的30%以上，总兵力125万人，各种火炮7600门，坦克990辆，飞机677架。并先后在莫斯科以西建立了纵深300公里的3道防线。战役之前双方兵力对比，德军占有较大优势，其兵力为苏军的1.44倍，火炮为苏军的1.84倍，坦克为苏军的1.71倍，飞机为苏军的2倍多。

1941年9月30日，德军对莫斯科发动了大规模攻势。德军第2装甲集群在布良斯克方向，第3、第4装甲集群在维亚济马方向，相继开始了进攻。尽管苏联红军进行了顽强抵抗，德军主力还是从中部突破了苏军防线，到10月中旬的两周之内，德

军中央集团军群将苏军的西方面军和预备队方面军共4个集团军合围在维亚济马地区，将布良斯克方面军共3个集团军合围在布良斯克地区。苏军抵抗一直持续到10月下旬，德军在维亚济马—布良斯克战役中俘虏苏联红军66万多人。苏军只有8.5万人突出德军防线。在这万分危急关头，10月10日，斯大林任命朱可夫大将为西方和预备队方面军司令员。朱可夫迅速重建了4个集团军，同时，苏军统帅部从西北方面军和西南方面军抽调部分兵力，在莫斯科以西约80公里的莫日艾斯克组织了防线，阻止德军推进。10月中旬，在北、西、南通往莫斯科的所有重要地段上都展开了激烈的战斗。14日，德军攻占加里宁市。苏军依托纵深梯次配置的防御地区，拼死抵抗，阻止德军向莫斯科推进，大量杀伤德军，赢得时间，为反攻创造了条件。

10月15日，苏联政府的部分机构和外国使节迁往古比雪夫。斯大林留在莫斯科亲自指挥保卫战。10月19日，国防委员会宣布莫斯科戒严，号召首都人民誓死保卫莫斯科。莫斯科市民也被动员起来。三天之内，全市

组织了25个工人营，12万人的民兵师，169个巷战小组。共发动60万人围绕莫斯科城修筑起三道防御工事，其中妇女的数量占了四分之三。到10月末，仅妇女儿童就构筑了700公里反坦克堑壕，挖掘了300多万立方米的泥土，修筑了3800余个临时和固定火力点。处于防御状态的莫斯科城，被街垒、路垒、工事严密地封锁起来。前线军民英勇抗敌，浴血奋战，其间涌现出很多卫国英雄。在众多的英雄人物中，就有广为人知的女青年——卓娅·科斯莫杰扬斯卡娅。1941年6月，德国入侵苏联后，卓娅和一批热血青年加入了游击队，投入到反法西斯的斗争中。11月底，在莫斯科以西86公里的彼得里谢沃村焚烧德军马厩时不幸被捕，虽受尽折磨也不肯吐露半点秘密。11月29日被德军绞死。临刑前，18岁的卓娅对德国军人高喊：“你们可以把我绞死，我不是一个人，我们有两万万人，他们会为我报仇的！德军士兵们，趁现在还不晚，赶快投降。胜利是属于我们的！”她对村民们说：“永别了，同志们！为自己的人民而死，是幸福！”卓娅牺牲的消息传到了克里姆林宫，斯大林震怒，亲自下达一道命令：“苏联红军绝对不接受杀害卓娅的德军第197步兵师第332团任何官兵的

投降，一旦抓到该团士兵，就地枪毙！”

1941年11月7日是十月革命胜利24周年。当时德军已经抵达莫斯科城下。为了鼓舞苏联军民战胜法西斯的勇气和决心，向全世界展现苏联人民坚强不屈的国家意志，斯大林下令11月7日在莫斯科红场举行阅兵典礼。斯大林在典礼上发表了著名的演说。他说道：“我们的国家正在遭到入侵，全体苏维埃公民和军队都要不惜用尽每一滴鲜血来保卫苏维埃土地和村庄。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胜利一定属于我们！”当天，苏联所有广播站都播放了这次演讲。这次阅兵有力振奋了苏联军民的战斗意志，受阅部队在红场接受检阅后直接开赴前线，向全世界表明了战斗到底的决心。

11月15日，经过调整和补充后，德军集中了51个师，对莫斯科发动了第二次进攻，企图从南北两翼迂回莫斯科，在莫斯科以东汇合。11月23日，德军占领克林，27日，又占领了离莫斯科仅24公里的伊斯特腊和亚赫罗马。莫斯科处于德军大炮弹射程之内，德军用望远镜几乎可以看到克里姆林宫的尖顶。在这千钧一发之际，莫斯科军民誓死保卫首都。苏军第316步兵师（后改名为潘菲洛夫第8近卫师）的28名勇士，表现了苏军大无

畏的革命英雄气概，在阻击德军坦克通向莫斯科的杜波塞科沃要道上，持续战斗4个小时，击毁敌人18辆坦克，最后全部壮烈牺牲。12月3日，德军合围了图拉。在中央，德军于12月1日从纳罗福明斯克发动进攻。苏军奋勇抵抗，并以战略预备队实施有力的反突击，同时集中使用统帅部预备队航空兵直接支援步兵和坦克作战，终于粉碎了德军的进攻，歼灭了其大量有生力量，迫使德军转入防御。到12月初，德军已成强弩之末，在各个方向上的进攻都已被遏制，希特勒攻占莫斯科的最后企图彻底破产。仅11月16日到12月5日这段时间内，德军在莫斯科附近就死伤15.5万余人，损失坦克约800辆、火炮300门、飞机近1500架。

此时，苏联红军转入反攻并粉碎莫斯科城下德军的条件已经具备。12月初，莫斯科的气温已下降到零下20至30度，德军身着单衣，冻死冻伤10万余人，飞机和坦克的马达无法发动，坦克上的光学窥镜失去作用，进攻失利导致整个部队士气低落。而苏军却身着棉衣、皮靴和冬帽等冬装，战斗力不断增强，士气高昂。苏军最高统帅部利用德军惊慌失措和防寒准备差的有利时机，决定在西部、西北和西南三个战略方向立即

举行大反攻,以西部正面为主攻方向,消灭德军“中央”集团军群;同时在苏德战场南北两翼实施进攻,在南翼解放顿巴斯和克里木半岛,在北翼解除列宁格勒的封锁。双方力量对比:苏军总兵力110万人,7652门火炮,774辆坦克,1000余架飞机;德军共有170万人,13500门火炮,1170辆坦克,615架飞机。虽然德军兵力要多于苏军,但由于其战线过长,兵力分散,战线并不稳固。早在11月29日晚,斯大林就下达了反突击的命令。但这没有引起德国的注意。12月4日,德国中央集团军群根据所获情报得出结论:苏联没有能力发起一场大规模的反击行动。

12月5日拂晓,加里宁方面军率先开始进攻,揭开了苏联红军战略反攻的序幕。6日,西方面军和西南方面军发起反攻。苏德战场南北两翼苏军在

罗斯托夫和季赫温也配合反攻,展开积极行动。12月9日,苏联红军解放了罗加切沃;11日解放了伊斯特拉;12日解放了索尔涅奇诺戈尔斯克;15日解放了克林;16日解放了加里宁;20日解放了沃洛科拉姆斯克。面对苏军的强大反攻,希特勒气急败坏,于12月28日给德军下达不准撤退的命令,并急忙从西欧调来12个师的兵力加强东线。同时以作战不力为由,撤了陆军总司令布劳希奇、中央集团军群司令博克、古德里安上将等30多名高级将领的职务,并自任陆军总司令。到1942年1月初,苏军歼灭了大量德军,解除了图拉之围和德军对莫斯科的直接威胁,随后继续向西追击敌人。苏军的战略大反攻一直持续到4月20日,将德军向西击退了100至350公里,收复了莫斯科州、加里宁州、图拉州和梁赞州等地,

取得了莫斯科保卫战的胜利。但由于缺乏实施大规模进攻行动的经验以及缺少快速兵团,苏军歼灭德军“中央”集团军群的企图未能实现。在莫斯科会战中,德军损失50万人,其中损失坦克1300辆,火炮2500门,各种车辆1.5万辆。苏军付出了伤亡和被俘70多万人的重大代价,却取得了莫斯科保卫战的最后胜利。

德军在莫斯科战役中的失败,标志着希特勒闪电战的彻底破产,这是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第一次重大战略性失败。莫斯科保卫战的胜利打破了德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改变了苏德战场的形势,极大提升了苏联在军事、政治方面的国际地位,促进了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的形成,有力鼓舞了苏联人民和全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信心。



你不知道的台湾：两岸应知道的台湾历史故事 (五)

□熊子杰

第五章

三国卫温将军大闹台湾记

1900年前《三国志·吴主传》里有关卫温到夷洲的一段文字引起台湾学界的轩然大波。

有人说东吴卫温、诸葛直根本没来过台湾。

有人说隋朝陈稜没来过台湾。

有人说郑成功、清朝、国民政府都是外来的。

所以，台湾就像一颗形似番薯的巨大外太空陨石，1945年无声无息地落在中国大陆福建外海的太平洋上，于是这世上出现了一座岛被称为“台湾”，台湾开始有了历史。对这些想要隔绝中华历史的人而言，1945年前的台湾人都是外星人，1945年后来台的人都是“异形”（aliens），而他们如何面对台湾少数民族呢？无法解释，只好当他们不存在。

1900年前的《三国志·吴主传》提到公元230年孙权曾派遣卫温、诸葛直等到东海的夷洲去招番，这段史料约146字，有关夷洲叙述不过26字，

却引得今日台湾学者争论不休。有学者认为应将此段文字纳入台湾历史教科书中，以凸显两岸交流是从此时开始的；反对者认为不该纳入，因为无其他史料或文物可以佐证这“夷洲”就是今日的台湾。到底卫温、诸葛直等是否到过台湾？到底该不该放入历史教科书中？认为应将卫温等到台湾事迹放入台湾历史教科书中的学者批评台湾领导人不放入是姑息“台独”势力；不赞成将这段史料放入台湾教科书的学者也骂台湾领导人，认为是在搞急统。

事实上，争论此段历史实在无太大意义，如果不是因为有些台湾人有“恐中”的意识形态，谁会在乎这段历史，更不会管卫温、诸葛直有没有到过台湾。而且2010年台湾“中研院”权威学者已证实马祖的“亮岛人”9000多年前来自中国福建亮岛地区，6000年前左右再到台湾，卫温等到台湾是远在亮岛人之后的事。公元230年卫温、诸葛直是否到过台湾对两岸渊源已不是关键了，所以学者们实无须再争辩此段历史。

历史的解读可以因人而异，但史实是不容篡改及否定的，你可以说夷洲不是台湾，但请告诉世人，卫温到冲绳的史料、遗迹在哪？台湾没有、冲绳也没有。所以大家只能猜测、推论，但也不能排除是台湾。

如前所述，台湾少数民族源自中国大陆东南沿海。大陆汉人自有航海技术后就不断乘船到台湾经商、贸易、定居等，中华文化随着大陆汉人来台数量增加逐渐深入台湾，这是自然定律，所以台湾至今仍保有浓厚的台湾少数民族文化及中华文化也是不争的事实。两岸从台湾少数民族及汉人角度都是同文同种的族群关系，只是如今两岸的体制、生活环境有所不同而已。既然有人有不同的看法，笔者觉得有必要将卫温等到台湾这段历史争议厘清一下。

台湾“中研院”院士曹永和在1979年的著作《台湾早期历史研究》中指出：“隋书所记流求，其所指究为今日台湾，抑为今之琉球，数十年来中外学者聚讼纷纭，各持己见，至今仍时有争论。隋书所载流求人

习俗，显与《临海水土志》中的夷州多有吻合，亦大可与今日台湾土著民族古习俗相印证，因此学者对此虽有争论，而大多说隋代流求即今台湾。”曹永 and 说“夷洲为今台湾，殆为定案”（曹永和《台湾早期历史研究》，1979，台北联经）。

台湾“中研院”院士凌纯声根据民族学的研究和古代书籍的记载认为夷洲就是今日台湾（《评赖泽涵主编〈高中历史〉课本第一册〈草案〉》，《海峡评论》杂志社，第259期）。

“中研院”院士郭廷以指出：“除了台湾，没有第二个地方合乎这个条件，除了生番更无法在东南海上找到另一个民族具有这些风习。”郭廷以院士在所著《台湾史事概说》中引用《尚书》及沈莹《临海水土志》为例，认为夷洲就是台湾，中国经营台湾始自三国时代的吴国孙权（《驳周婉窈和“98课纲”》，《海峡评论》杂志社，第323期）。

日本历史学家田清博士经研究论定，公元230年（东吴黄龙二年）孙权遣将军卫温、诸葛直浮海进军夷洲，俘虏数千夷人，此夷洲即为今之台湾，是为汉人经营台湾之始。

日本人市村瓚次郎博士以《太平御览》卷七八〇所引《临海水土志》中之记事与《隋书·流求传》互相比，详细论断

认为夷洲即台湾。

综观上述中外学者，包括台湾“中研院”三大权威院士，甚至日本学者都认为公元230年卫温、诸葛直到的地方确实是台湾，但为何在台湾还有学者反对此论述呢？

我们先检视一下《三国志·卷四十七·吴书二·吴主传第二》：

……遣将军卫温、诸葛直将甲士万人浮海求夷洲及亶洲。亶洲在海中，长老传言秦始皇帝遣方士徐福将童男童女数千人入海求蓬莱神山及仙药……所在绝远，卒不可得至，但得夷洲数千人还。

短短一段话，真正与台湾有关的“遣将军卫温、诸葛直将甲士万人浮海求夷洲……但得夷洲数千人还”，才不过仅仅26个字，却造成台湾学者专家大论战。

《三国志·吴主传》载：

黄龙二年春正月，浮海求夷洲及亶洲（海南岛），军行经岁，士卒疾疫死者十之八九，但得夷洲数千人还。

有些人认为这些史料是中华民族第一次经营台湾的证据；

反对者认为根本没有史料及遗迹证明卫温、诸葛直等人到过台湾。无论台湾学者如何争辩，有趣的是日本专家学者却一致认为吴书所称的夷洲应为台湾。什么道理？是出于专业还是为了避免危及琉球（冲绳）的主权？

言归正传，夷洲是不是台湾，卫温、诸葛直等是否到过台湾，说实话，如笔者先前所述，台湾人对此没什么感觉。夷洲不是台湾又如何呢？也不会改变两岸自古血脉相连、同文同种的关系，尤其如今马祖“亮岛人”已被证实9000多年前源自中国；隋朝隋炀帝三次出兵台湾，是古今中外无争议的历史；陈稜到台湾，也是中华民族经略台湾的事实，已是不争的历史。然而一些希望台湾与中国大陆无任何渊源，或想抹除台湾与大陆文化交集的人，是不会承认这段历史的。

那么，卫温、诸葛直是否到过台湾？

笔者做大胆的假设，假设吴书根本是杜撰的，卫温、诸葛直没去夷洲！这说法似乎不太可能，因为《临海水土志》清楚描述一些岛上居民的生活习俗地理风情极似古代台湾，如果作者没有看过、读过或听过这些资讯，是不可能凭空捏造的。只是这些夷洲人所居住的岛是哪里？假设夷洲不是宝岛台

湾，那会是哪里？放眼天下没有任何地方或国家有史料、文献、遗迹等记载或证实卫温、诸葛直等到过该地，仅有新北市新店溪曾发现手印乌石，但也无法直接证明此乌石就是卫温、诸葛直等将其带到台湾的。所以全世界都一样，没一个地方有史料或遗迹能证实此事：卫温等“到此一游”。

笔者再大胆假设，不是台湾住民，是哪里的住民呢？一些人认为是冲绳，可是当地并没有《吴书》上所称夷洲人的习俗文化、生活形态等特征，所以夷洲应不可能是今日冲绳；而《吴书》所述与台湾当时住民却是极为类似，所以大多数学者还是主张夷洲应是台湾。

有些台湾学者引用《东夷传》的叙述，争执台湾的方位及距离与《吴书》所称的方位及距离不合，所以夷洲并非台湾。沈莹的《临海水土志》，在宋代的《太平御览》卷780《东夷传》有引述：

夷州在临海郡东南，去郡二千里。土地无霜雪，草木不死。四面是山，众山夷所居。山顶有越王射地正白，乃是石也。此夷各号为王，分划土地，人民各自别异，人皆髡头穿耳，女人不穿耳。作室居，种荆为蕃鄣。土地饶沃，既生五谷，又多鱼

肉。舅姑子父，男女卧息共一大床。交会之时，各不相避。能作细布，亦作斑文。布刻画，其内有文章，好以为饰也。

上述“夷州”应同于《三国志》的“夷洲”；上述“越王射地正白”的“越王”很可能就是春秋时期越王勾践的后裔，原散居在今日浙江省沿海，因战乱避难移居到夷州。

这些学者一直争论的其中一点是关于距离，古代的2000里约为今日800公里，而从谷歌地图上查看，从临海郡（今日浙江省台州市）到台北基隆直线距离才约393公里，所以从距离长度分析，认为夷洲不是台湾，若依距离来判断却像是冲绳，从台州到冲绳约为680公里。此论点有几个非常严重的错误：一、认定当时距离数据是非常精准，事实不然；二、主观认为卫温、诸葛直等是到了台北基隆或淡水，而事实上他们却不一定是从浙江台州到台北基隆或淡水，极可能是从台州到大员（今日台南），尤其隋朝时陈稜到台湾的上岸地点就是台南海岸；或许他们到了台湾东部宜兰县南澳（汉本遗址所在地）。台州到台南安平距离约600公里（谷歌地图上的直线距离为643公里），加上古代由于无度量衡，对距离及

数字概念不清，数字多会浮夸，航线又非直行，海上季风及洋流、船只的性能及大小等因素影响，所以“去郡二千里”大概实际上可能只有四五百公里长，就距离而言，“夷洲”指台湾绝对合理。反之，以距离短来认定“夷洲”非台湾才是对历史的偏颇认知。

另外有关航海技术及能力的限制，有些学者如梁嘉彬教授认为农历正月东海及台湾吹东北季风，所以以风为动力的船从台州出航是无法到达台湾的。然而在《中国古代造船与航海》中记载：三国东吴热衷于海洋贸易，当时东吴已有千吨级船舰，航迹遍及伊朗、印度、斯里兰卡（陈华胜《三国奇谈》，2011，实学社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大陆沿海南岛语族人用划桨都能到台湾，吴国巨舰当然也能到台湾，否则台湾十三行遗址及汉本遗址中的大陆汉文物难道从外星球来的吗？这些文物很清楚地否定吹东北季风无法到台湾的论点。

另一争论不休的是方位，有人认为台湾不是在“临海郡东南”的方位，而台湾本来就是在台州的东南方。若以吴国的整个版图位置来看，台湾更是在吴国的东南方，而且吴国的东南方最庞大的岛就是台湾岛，所以夷洲应该就是台湾。

有些学者仅从距离及方位就断定夷洲就是今日冲绳（以前的琉球群岛），然而就算距离及方位无争议，但以前及现在的冲绳原住民都看不出与《临海水土志》中夷人有任何生活习俗文化上的相似。《临海水土志》记载：

夷州在临海东南，去郡二千里，土地无霜雪，草木不死，四面是山……其地亦出铜铁，惟用鹿角予以战，磨砺青石以作矢、镞、刀、斧、铍、贯、珠、瑯……

冲绳并无鹿，而《临海水土志》的夷人却是以鹿角作器具，所以冲绳显然不会是夷洲。相反，台湾早在3000年前就有鹿，在台湾新石器时代的左镇文化、铁器时代的遗址中出土许多鹿骨骸化石，距今已超过2000年（何传坤《台湾中部铁器时代惠来遗址出土梅花鹿DNA研究》，2010，自然科学博物馆）。而且十三行文化及汉本文化遗迹也证明台湾早在1800年前就有冶铁的技术及产品，这与《临海水土志》的夷州有铜铁相符，显示三国东吴已有冶铁能力又与《临海水土志》叙述相符。所以，以生活习俗及文化来推论，毫无疑问台湾应是夷洲。

因此，如从文化、习俗、气候、地理、距离、方位等角度来看，夷洲为台湾是极合理的，是毋庸置疑的，而且至今再没有任何人提出一个更符合前述条件的地方、文化及民族。

另外《隋书·流求传》所描述流求岛上原住民的文化及习俗与《临海水土志》中的夷州人也极为相似，因此，更加强夷洲与台湾关系之事实证据。

台湾近百年发现超过千个古代遗址，其中新北市八里的十三行遗址及宜兰县南澳的汉本遗址皆为1800多年前三国时期的遗迹。台湾考古学者认为十三行遗址曾经先后有三群人居住过：一、“圆山文化人”（在2000多年前）；二、凯达格兰人的祖先“十三行文化人”（约在1800年前）；三、汉人移民（约清朝中期）。十三行遗址出土的文物丰富，大多数是“十三行文化人”所遗留的，包含大量陶器、铁器、玛瑙珠、玻璃饰品、玻璃珠、金饰、银饰、青铜器、铜器、铜币等文物。由于这些文物有些是来自台湾其他的族群，有些则来自大陆汉人及南洋人，因此可推论在1800年前左右，恰好就是三国时期，汉人就已频繁乘船来台进行贸易，而十三行遗址（台州到新北市八里直线距离约383公里）就是当时主要

交易地点之一。

另外，2012年在台湾宜兰县南澳和平段发现汉本遗址，汉本原为泰雅语“Blihun”，是“门户”的意思。2015年6月，研究员发现第二个汉本文化层遗址距今约1650—1800年前的古迹，挖出青铜器、玉器、陶器、石器、金箔、玛瑙、骨角器、玻璃器等文物。遗址文物中有许多是汉文物，再次可证当时大陆汉人与台湾少数民族的双边贸易相当频繁，从台湾头的八里十三行遗址，绕过台湾东北海岸到达宜兰县南澳的汉本遗址（浙江台州到宜兰南澳直线距离约468公里）。“中央研究院”研究员刘益昌形容汉本人为“最早台商”，可见当时台湾少数民族也去了大陆经商或贸易。

从航海技术及时间上看，公元230年东吴卫温所率领的军队应该是到了台湾；此行之后，许多随军征台的汉人又频繁乘船渡海往来海峡两岸，与台湾少数民族和谐地从事商业贸易活动，因此留下了十三行遗址、汉本遗址等历史文化遗迹。

遗憾的是，至今台湾还未发掘到有关卫温及诸葛直等“到此一游”的直接文物或遗迹，希望这段历史的争论在马祖“亮岛人”、十三行遗址及汉本遗址等文物陆续出现后，能慢慢平息吧。



欢迎订阅

《黄埔》杂志增刊

《黄埔女兵》

中国现代军校招收女生始于黄埔军校。女生队的出现，在中国妇女运动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对于中国近现代军事、政治、人文、社会诸方面，都有着值得评述的历史作用与影响。黄埔女兵在中华民族生死攸关的时刻前仆后继、救亡图存，在国民革命、北伐战争、抗日战争及军事、政治、社会诸多方面留下各自不同的轨迹，为记忆与传颂她们在中国历史画卷中谱写的壮丽诗篇，宣传“爱国、革命”的黄埔精神，《黄埔》杂志社编辑出版了增刊《黄埔女兵》。

精装彩印，定价 258 元，2019 年 10 月出版。欢迎广大读者订阅。

【汇款方式】

邮局汇款地址：北京市丰台区南三环中路赵公口 20 号
邮政编码：100075
收款人：《黄埔》杂志社
银行汇款开户银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东铁匠营支行
开户户名：《黄埔》杂志社
账号：0200000409200014061

【注意事项】

为避免差错，望订户在汇款时注意：
一、订户姓名、地址、邮编、联系电话必须详细，书写工整，字迹清楚。
二、在汇款单上须注明所订增刊书名、数量。
三、由经办人（汇款人）代多人征订并需要本社直接寄给订户时，请在汇款时另函告订户姓名、详细通信地址、邮编、联系电话。
四、个人订户最好邮局汇款，并写清姓名、联系电话、通信地址、邮编。

【《黄埔》杂志社发行部】

电话：010-58336326 58336357
传真：010-58336326
联系人：常红、李希光

欢迎订阅

《黄埔》杂志增刊 —— 《黄埔军校分校史料汇编》



在黄埔军校的发展历程中,基于形势发展和革命斗争的需要,先后开办了多所分校。这些分校培养了大批学生、学员,他们奔赴东征、北伐和抗日战场,前仆后继,浴血奋战,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建立了不朽功勋。为了保存黄埔军校史料,使黄埔精神得到传承,并为黄埔后人及广大读者了解黄埔先辈提供平台,本刊在特别策划栏目黄埔军校分校概览的基础上,聘请资深黄埔研究专家,对黄埔军校分校史料做了系统整理,予以完善,现推出增刊《黄埔军校分校史料汇编》,展示黄埔军校分校发展历程,为全面、系统、深入研究黄埔军校分校历史奠定基础,为读者深入了解黄埔军校分校提供资料。



《黄埔军校分校史料汇编》16开,精装,定价298元,随刊赠送纪念章3枚,2017年8月出版。欢迎各界踊跃订阅。

汇款方式

邮局汇款

地址:北京市丰台区南三环中路赵公口小区20号

邮政编码:100075

收款人:《黄埔》杂志社

银行汇款

开户银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东铁匠营支行

开户户名:《黄埔》杂志社

帐号:0200000409200014061

注意事项

为避免差错,望订户在汇款时注意:

一、订户姓名、地址、邮编、联系电话必须详细,书写工整,字迹清楚。

二、在汇款单上须注明所订增刊书名、数量。

三、由经办人(汇款人)代多人征订并需要本社直接寄给订户时,请在汇款时另函告订户姓名、详细通信地址、邮编、联系电话。

四、个人订户最好邮局汇款,并写清姓名、通信地址、邮编。

《黄埔》杂志社发行部

电话:010-58336326、58336357

传真:010-58336326

联系人:常红、李希光



欢迎订阅

《黄埔》杂志增刊

《黄埔师生与两次东征》

1925年，在国共两党的紧密合作下，广州革命政府对盘踞东江地区的军阀陈炯明部发起的两次东征均取得了完全胜利，为出兵北伐奠定了基础。这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重大政治、军事事件。两次东征中，由黄埔师生组成的黄埔校军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决定胜负的关键因素。黄埔校军自身也从军校教导团扩编成党军，为建立革命武装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今年是两次东征胜利95周年，为了更好地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弘扬“爱国革命”的黄埔精神，《黄埔》杂志社编辑出版了增刊《黄埔师生与两次东征》，欢迎广大读者订阅。

精装彩印，定价258元，2020年9月出版。欢迎广大读者订阅。

【汇款方式】

邮局汇款地址：北京市丰台区南三环中路赵公口20号

邮政编码：100075

收款人：《黄埔》杂志社

银行汇款开户银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东铁匠营支行

开户户名：《黄埔》杂志社

账号：0200000409200014061

【注意事项】

为避免差错，望订户在汇款时注意：

- 一、订户姓名、地址、邮编、联系电话务必详细，书写工整，字迹清楚。
- 二、在汇款单上须注明所订增刊书名、数量。
- 三、由经办人（汇款人）代多人征订并需要本社直接寄给订户时，请在汇款时另函告订户姓名、详细通信地址、邮编、联系电话。
- 四、个人订户最好邮局汇款，并写清姓名、联系电话、通信地址、邮编。

【《黄埔》杂志社发行部】

电话：010-58336326 58336357

传真：010-58336326

联系人：常红、李希光